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HT260/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丁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5号)

长沙潇湘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

198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0千字 印张：7.9

印数：1—5,000 定价：1.25元

目 录

清末湖南三书院.....	雷 恺(1)
前清湖南贡院和省考内容.....	韦伯翰(4)
清末湖南官办初级教育的雏形.....	陈浴新(11)
清末湖南的师范教育.....	谭绍黄(19)
清末湖南教育琐闻.....	王祖歧(23)
湖南大学早期史料一页.....	唐伯球 黄士衡(26)
回忆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俞 城(32)
湖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概况.....	王 毅(35)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略述.....	曹鼎球(43)
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沿革.....	左宗濂(48)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简述.....	甘 融(52)
湖南优级师范概述.....	屈子健(58)
我所知道的克强学院.....	曹伯贤(66)
湖南中路师范史略.....	方克刚(73)
✓ 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实录.....	刘定仪(78)
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建设历程及其演变	
.....何 镛 李大梁(87)	
关于省立第九师范学校.....	马文义(93)
湖南省立工业教育沿革.....	周邦柱(96)
回忆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	雷天一(100)
湖南省立高级农业职校沿革.....	杨惠南(111)

明德中学的五个时期.....	唐耀章(116)
胡元陔侧记.....	陈楚涛(136)
朱剑凡和周南女校.....	杨 澍(154)
我所知道的岳云中学.....	刘伯勳(166)
何炳麟传.....	衡山县政协(169)
省立第一中学创办概况.....	甘 融(175)
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	吴 剑(178)
福湘女中片断.....	范 瑄(192)
我所知道的妙高峰中学与方克刚.....	马文义(195)
我所了解的曾宝荪.....	曾昭桓(199)
湖南最早的乡村女学堂.....	黄曹甫(202)
湖南省立男女中等学校沿革.....	吴 剑(204)
欧美各国教会在湘开办学校的概况.....	劳启祥(207)
创办修业学校的艰苦经历.....	何积燠(218)
陶龛学校和赖重先生.....	曾楚樵(225)
湖南省童子军训练的经过.....	江以南(233)

清末湖南三书院

雷 愷*

岳麓书院在岳麓山，清时以在籍之翰林有文学者，由巡抚聘为山长，每年束脩六百两。设监院，以长沙县学官兼之，由盐巡道下委札。斋长二人，以院中肄业生充之，管理院中书籍及一切杂事，督飭斋夫诸役。司杂役者有门斗、司阍。书办掌收发文卷及注籍。斋夫治诸生膳食。院中分斋而居：山长所居曰“半学斋”，诸生所居有“主敬”、“存诚”等斋名。每斋有房二十间，每间居二人，离斋半月则由他生入居。每斋有斋夫一人，司洒扫。每年春二月生徒陆续入院，由巡抚考试，谓之甄别。取录时有正课、副课、额外之分。正课给膏火银四两，副课二两，额外则无，但以后如经取录，仍给膏火。列额外者下一次投考仍列额外，不能取正副课。取额外后，下次应课，方能得正副课，领膏火，例甚严也。膏火之支付，公家筹有常费。入院肄业者皆廪生、附生、监生，而童生不与焉。甄别后，巡抚送山长入学，率诸生谒圣、拜师，礼极隆重。旋由巡抚出题开课，案发亦分正副课及额外等若干名，照章给以膏火，前列者巡抚给奖，盐巡道陪奖。巡抚开课后，每月由藩、臬、粮、监道及学政、长沙知府各课一次，最后巡抚再课一次，谓之收课。膏火给奖陪奖皆与开课同。凡官课皆于盐道署写案，而张于书院壁间，惟巡抚甄别案则张抚署照墙。收课时

* 雷愷原系岳麓书院学生，书法家。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已秋末冬初，诸生归家，临院乃封闭斋门。亦有留学者，不过二三十人而已。每次官课，阅卷者为省中候补人员，择举人，五贡知文学者任之。官课之外，每月山长例课一次，谓之馆课。课分超、特、壹三等，超特等给奖亦甚微薄，款由院中每年常入款内支出。全院约可容三四百人，人满则居书院旁之道乡祠、屈子祠。

城南书院在南门外妙高峰下，院规、考课亦如岳麓，但不称山长。而曰院长。外间诸书院通称老师。院长束脩略少于岳麓。院长所居曰丽泽堂。肄业者分附生、监生、童生。官课亦同岳麓，童生膏火较附、监稍低。全院可容四百人。妙高峰、卷云亭内亦可容数十人。尚不敷时，间有争房闹事者。吴大澂抚湘，在大椿桥侧建新斋四，可容百人。斋前设祠，祀湘中名宦及前歿院长，名曰“名宦院长祠”。

求忠书院长在长沙城北荷花池侧，始于清咸丰年间。院侧有祠，祀塔齐布、李续宾等，求忠之名，意盖本此。规制与城南书院同，而肄业生较少，课额亦少，以院狭小，不足多人也。

此之谓“三书院”与长沙府学、长沙县学、善化县学“三学”相对。当时颇能主清议，官吏惮之。

此外尚有湘水校经堂，道光间吴荣光巡抚湖南创立也。校经堂在天心阁侧城南书院旧址，俗称“老城南书院”，由历任督学使主持。堂长由督学使聘请有学问者担任，不拘甲、乙科及官职。诸生学额届三年，由督学使以岁、科、试生员前列者补入名额二十四人。每年以十月计，每月人给膏火银八两。每年请巡抚课一次，督学使课一次，皆给予奖金，惟前列者有之。堂长每月课一次，亦给微奖。三年后由督学使定其去留。光绪时督学使张亨嘉广其额至四十名，于北城外建堂，老城南书院遂废为民居。

又有思贤讲舍，在东城内正街曾文正公祠内。经费由盐商拨票筹供。择湘绅主持，聘有科名文学者为师。考取诸生入舍，每月人给膏火银六两，亦三年定其去留。讲舍内设思贤书局，刻印书籍出售，费亦由盐商票内筹付。

前清湖南贡院和省考内容

丰伯翰*

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沿袭历代科举制度、改以考“八股”为主，以此羁縻知识分子，并从中选拔一批人充当它统治的工具。每三年在省的范围内举行一次考试，录取举人名曰乡试或大考。乡试的试场称为贡院。当时长沙一地，共有大小衙门（官署）四十八个，其中最严肃、最宽阔的则为贡院。

贡院院址在长沙城区之北（原属善化县境），门朝南向，在今中山东路百货公司地段。现在对面的路边花园，是其照墙后的院外杂屋。往日贡院以东，称贡院东街，西称贡院西街。院东沿水风井，院西沿又一村（原是一窄巷）迄赐闲湖（原名刺韩湖，传是汉长沙太守韩玄，被魏延追杀处）。沿贡院东西二街和水风井一带，临街宽不足十丈的边缘基地，租与人民作经商铺面。包括今日之百货公司，省人委会（今农业厅）一大片土地，全是贡院范围。院屋如此宽广，但只开一大门。

贡院的围墙、门闾高大，轿厅和两进大厅正屋，建筑坚固雄伟。门闾两边，各有门房（传达室）和差屋一排，入门经过大坪登三级（寓连中三元之吉兆）上轿厅。轿厅依门两边，各有内门房、差房一排。轿厅之上墙门内，由过庭到正屋大厅。大厅两边各有差房和通达东西两边的考棚的走廊，其厅名为

* 丰伯翰曾在湖南藩署学习刑民法例（称师爷），又曾随台司院办理供应事务，已故。

“至公堂”。至公堂的上进隔墙内厅屋，是主考与各考官阅卷起居厅室。除上述正屋以外，还分段建有大小厨房杂屋厕所若干。

贡院的试室（又称号子或考棚），每生一间，十间一弄，五十弄编一字，共有四千间之多。室顶用树皮竹木搭盖，每室纵横不及丈。室内设备，只一桌板，一坐板、一床板，如遇大雨，上漏下湿，有时地下积水数寸。每届考试，考生要在这狭窄简陋的污秽斗方棚内，撰文饮食起居九日，常有因之患病身死的。考生病死试场，不许由大门抬出。除大门外，又无第二门径，则用绳捆绑由院后围墙吊出，名叫“吊蛭蚌”。昔日对死在贡院的考生，不敢说是出于环境卫生不良所致，而说是死者“有亏阴德”的果报。

贡院无常驻主官，平时是藩署派四人看管房屋，有时看屋的人，不耐寂寞，住在家里，任其倾塌，荒草丛生，空旷冷漠，成为盗贼藏身之处。每遇考期，必须大事修理。

每届考试，在院人数约四千以上。为防止弊端，将头门封闭，与外隔绝。饮食的蔬菜和泉水，由靠巡道街的围墙上的一小洞输入。全部蔬菜和饮水，均由长沙府和长沙、善化二县署办差供应。办差的人员，因经费不多，经手人还要从中捞油水，于是买蔬菜给“官价”（随意给价），饮水则是在街头强拉民夫，在北门外彭家井义务挑送，为防挑夫开小差，竟用绳索系十人为一串，如囚犯一样，其状甚惨。挑夫不敢声张。

乡试每届取录举人四十名，副榜二十名。考试分三场，每场三日。例定考年的农历八月初八，试官考生同日入场，又称入闱，至十六考完，考生出场。如在先一日午前交卷的，可在十五日下午出场，归家度中秋。主考和阅卷官迟至十八发榜后才离贡院。

考试内容，第一场考“八股文”，第二场考“经义”，第

三场考“对策”和诗赋。考取后，成为举人，又称孝廉。取得举人身份，才能上京会试，会试获选称进士。进士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跪在御前撰写试卷的殿试。殿试取后称“翰林”。小考（府县考试），大考、会试都可以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惟殿试限只一次。凡参与省考的生员，规定要取得秀才或监生身份，才有资格应考。监生是在京城“国子监”（书院）学习的学生，清末时期，只要捐献清廷纹银二百两，即可取得监生身份。当时南方各省举行的省考，又叫南闈，同时在保定府举行的叫北闈。南闈只许本省籍秀才监生与考，北闈不限省籍，是集各省秀才和监生合并举行。

主持贡院大考的官，称主考，主考是具有翰林身份的不定官阶、无俸录的钦派大员。每任主考，如主持一届省考，实际任职时间，仅有两周。每届省考，钦派正副主考各一，他二人虽无官级，但因是钦派大员，比其他任何官员，显得更为尊贵。

当日正副主考，自京奉旨启程后，照例不离左右，表示密切合作，忠诚不二。所走行程，例由汉口乘官船南来，其船约在农历八月初五或初六行近离约长沙十里地，两主考舍舟登陆。两主考上岸，乘坐早为预备的八人大轿，鸣锣开道，旗伞执事，仪仗鼓乐护轿前。抬至近郊五里地，布置有黄色（黄色是清室规定御用彩色，人民不能采用）绸绫帐幔，地铺红毡，中设燃点龙烛焚烧檀香的长香条，下摆红绸拜垫的叩安亭。对面设接官亭，供迎接主考的抚藩道府县等官员们休息之用。两主考在两亭之间下轿，昂头进入叩安亭，分立香案之东西两端。早在接官亭候驾的官员们，由巡抚率领，整队进叩安亭，彼此不交一语。各官朝上虔行三跪九叩首礼后，排列肃立，巡抚开口恭称“臣××等，叩问圣体龙安！”正主考官答“圣躬安好”四字，各官又行三跪九叩首礼后，分两行列立，

二主考于礼炮声乐中出亭上轿。巡抚随至轿前，用盖有关防的“×年×月×日谨封”字样长条，贴封轿门。两主考自此迄考试结束，每次乘轿，或住厅院，均由巡抚亲封亲启门封，禁与任何人接触。各官必列立（称站班）恭送上轿后，乘轿赶到目的地，又站班恭迎。两主考轿前鸣锣开道，全副仪仗护行。每次除两主考乘轿外，地方官员，只一学台乘四人轿随行。学台是主持省以下府县小考的京派四品官，衔称提学使，又称学道，因他不属藩台委任的官员，故不随各官站班，而与主考同行。两主考轿至行署（又称行台衙门）在鱼塘街前照磨厅，是时，巡抚早已抢先赶到，下轿启开轿封，率站班各官，陪进内厅，彼此酬应数语，巡抚即率各官同出，将厅门封闭。饮食由高不及二尺、宽约一尺的一个墙洞递送。

农历八月初八，是主考与各工作人员及考生入“闈”日期。巡抚在其抚院大堂上，东设二客席，西设一主席，率领各官同至行署启封，邀请二主考，由学台陪同乘轿行往抚院饮宴。各官侍立，入座数语，举杯相敬，首饌甫陈，谢辞离席前往贡院。抚院（今青少年宫）与贡院同在一街，相隔咫尺。两主考大轿于礼炮乐声中进入贡院，巡抚与学道陪同其步至公堂，巡抚将站班的藩县道府县各官，和被选派帮助阅卷及办差人员一一介绍后，主考率各官进主院后围墙内的水池旁，举行祭池仪式（池即赐闲湖）。祭时，主考熬有介事地高声朗念，“有德报德，有怨报怨”等语。礼成后，两主考偕协助阅卷官，进入内厅（称内帘），巡抚率各官同入至公堂，将向内厅的门封闭。各考生（又称相公）也携带纸笔墨砚和日常生活用品与炊具等，依次入场。考生入场须先在至公堂让各官检查所带物件，如发现带有书籍或字纸（称夹带），立即逐出，不许参加考试。考生全部入场后，即将院门关闭。

主考的试题和考生的试卷，都由墙上一小眼传递。在内帘

里，只有两位主考和从备在职知县中选来的十二个协助阅卷的官员与勤杂人员。

发题收卷各事，由地方各官遴选的官员在至公堂办理（称外帘、外帘官）。在至公堂主持监考的是提学使。巡抚入闱，只在外帘通往至公堂外作指导，称为监临官。考生的每一试卷，都由专任誊写的外帘官一一誊写后，不具姓名，只编号码，转入内帘评审。采取这个办法，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试官勾结作弊，在试卷上作暗号，或认笔迹。誊录人员，除少数由各个衙门调来的外，其余都是从候差官员中调派的（称当差）。这些人当差一次，必给一个可以捞钱的短期差事作报酬。试卷转入内帘后，先分给协助阅卷的内帘官审阅（叫分房），认为可取的，方呈主考裁夺（称荐卷）。如卷中有措词失当或违反朝廷规律的“污点”，即由外帘官截留，待是场考毕，将考生姓名用蓝墨书榜悬挂院外（称挂蓝榜），不许继续考试。有时誊写人见文字好的试卷内，稍有差错，往往在誊写时代为改正，然后向考生索取报酬。考生如幸获选中，对两主考和荐卷的（称房师）须馈赠费敬，终身执弟子礼。主考虽是无俸禄职，例由藩署致送正主考“程仪”二千两，副主考千六百两。除此以外，正主考还可得考取的门生所送费敬约三、四万两之多。

八月十六，三场考毕，外帘结束，考生全部出闱，外帘各官，不再受门禁拘束。十八发榜的子夜，巡抚率各官同至贡院，于锣鼓礼炮乐声中，将内帘启封，大家欢欣鼓舞，请两主考出帘至公堂，十二帘官随出。

是时，至公堂灯烛辉煌，中设一个香案上点双龙烛，燃檀贡香，铺成红纸，备书名榜之用。厅上还摆有各官座位。司事将取录各生名单和试卷捧陈主考，递交巡抚转各官依序传观后，再交写榜人，写榜从第六名写起再回头写前五名。榜次头

名称“解元”，二、三、四、五名通称“经魁”（即俗说“五经魁首”之词源）。填写经魁名榜时，加炷灯烛，闾堂官员狂欢大笑，院内勤杂工人，各持一烛绕榜案环行，谓之闹魁。他们将闹魁烛高价出售，或赠与窗下书生，兆示吉祥。名榜写完，天尚未明，各官入后院门，仍然关闭。其时一帮争听捷报的人们（称报子），聚立院门外等候。每填写一名，院内勤杂立即抄录，自门隙传出，报子用红纸书写，敲锣打鼓送往新贵寓所报喜，索讨喜银。天明以后，将榜悬出。主考率各官主香案前，向北行三跪九叩首朝醮谢恩礼后，两主考仍乘大轿（不封），各官站班如仪，送往行署。至此，戏剧化的大考，宣告终结，两主考始有言行自由。主考进入行署，即有新贵门生到署请安叩谢恩师，馈赠赞敬。主考在行署稍留数日，各事酬应，即回京复命。

考试期前，邻近贡院的旅社客栈，全为考生住满，甚至有些住家户，也作短期经营的客栈。沿街一带摆满供考生采购的摊贩，陈列的商品，索价较平时昂贵。考生购物只要摊贩们的措词说得吉利，多出价钱也心甘情愿。但是有些穷秀才，在中选之后，常因报子索赏，备受困窘。

大考防止舞弊措施极为周密，但弊端仍难杜绝。有些经过几次考试不获取的“通达秀才”，自认“文星不透，禄命欠佳”，对考试持消极态度，每遇试期，报考入围，匆匆得试卷拟就交出，即代人捉刀（代做试卷，又叫杀枪，名为枪手），换取报酬，这种事情已成为考场积弊。

光绪年间，某届湖南大考，两江总督李星垣湘阴人之七子李佛翼，取得秀才身份后，准备参加大考时，闻得钦派湖南主考张某，是其先人契好，李佛翼为着争取高中，希望得到张某的照顾，先期往汉口谒见。张主考为避嫌疑，邀同副主考接见。张于闲话间问李“你常做诗么？”李答：“正在学做。”张

取水烟袋吸烟，手指水烟袋说：“这很好。”李会意点头，知是暗示他诗中可用“水烟袋”三字作为暗号，满以为已通“关节”，必中无疑，归家将经过详告其妻左氏。某日，左氏归宁，与弟妇闲谈，将水烟袋秘密告之。旋为即将应考的兄弟左生所知。左生又将此事转告将同时入闱的某生。张主考阅卷时，发现有“堤畔一带含烟柳，映入池中水色清。”“偏舟一叶虹如带，烟波万顷水天长。”和“春江水载倾云月，两岸山林一画图”三首诗皆含有“水烟袋”三字，便录取其中二卷。发榜时，左生与其友高中，李佛翼名落孙山。李见二生诗稿，皆含有“水烟袋”三字，询问究竟，始知不慎泄密所误，但事关刑律，不敢声张，忿而与左家诀别。此事说明，经管清廷对科场弊端有所防范，还是不能制止暗通关节。

再说主考官虽是“钦派”，也还是要通过关系，由大臣保举。若是没有途径的穷翰林，虽经殿试取录，在翰林苑任编修（无官阶俸禄的空衔）三年散馆后，欲求一外放七品知县，也不可。而出任主考者，不但名利双收，且其职级高于四品的提学使，无形中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光绪年间，长沙东乡萧荣爵传胪（殿试第四名翰林），因得权臣荣禄保举，获任广东主考，所得贽敬，除酬答荣禄和其他亲官巨款外，在家乡（甘草坑）还修建了大厦一栋，购置了良田千余亩。所谓“开科取士”，实际是为一些官僚们攫取利禄制造机会。

（余小石整理）

清末湖南官办初级教育的雏形

陈 浴 新*

从半日学堂办起

清末，湖南维新事业受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湘抚陈宝箴去职，时务学堂停办，新学萌芽，悉被摧毁。后来抚湘之人，迫于清廷功令，续办一所变相的求实书院。仍是承旧学之弊，以经史为重，略采课堂的形式，讲习英算。陈天华、李燮和、李云龙、仇鳌等便是该院的学生。当时统治者只图敷衍上令，究不知办学为何事。及至辱国丧权之“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假名辛丑变法，通会各省创立学堂，湘抚俞廉三于一九〇一年始选派俞诒庆等十二人游学日本，次年归来，开办师范馆于省会黄泥街。一九〇二年赵尔巽接任湘抚，奏催张鹤龄（清翰林，时任京师大学总教习）来湘，主持湖南省学务处，决定在省会首先举办半日学堂十二所。委俞诒庆为监督，招收家贫不能就读的子弟，半日读书，半日佣生。指拨常年经费缗钱四千余串，每所每月约五十串，每学生一人，日给津贴缗钱十文，合计每年共津贴缗钱二千余串。兹将一九〇三年八月湘抚赵尔巽开办半日学堂告示照录于次：

“为晓谕事：照得民智不开，由于读书识字者少，由于贫民之无力者多，古者八岁入小学，各国既设幼稚园，又设徒弟育哑贫民各学校，所以全国人民无一不识字，法至善也。

* 陈浴新建国前系湖南省政府委员，建国后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已故。

我中国文化最先，教育未备，近日创兴各学校，大都便于优裕求名之士，而未计及贫苦食力之家。于是里巷儿童，随意嬉戏，字义不能识，礼法不能娴，其佳者小贤膏生，往往智慧不开，昧于远计，其劣者日流非僻，甘陷刑章，种种败德，罔不由之。本部院轸念民依，倡捐款项，现仿天津办法，先于省会创办半日学堂十所。开办后，逐渐加增，并推至外府厅州各乡村普遍设立，此举专为贫家幼童无力读书者而设。凡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幼童，准由保人送至提调办公处报名，听候择期开学。每日入学半日，认字习算并及应对进退各礼节，择其优者送入蒙小学堂，余则听其谋生，勉为良善。惟贫民不知就学益处，各绅商人等务必勉力广劝，令其就学，庶几人人识字，人人知礼，教育普及之法，其基本于此乎。除札行学务处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城乡内外各处人等知悉，如有贫家子弟无力就学者，即劝令赶紧报名，听候挑选入学，毋违特示。”

此时，顽固守旧的官僚地主，仍然是迷恋科举，对其子弟，延师在家授读，而且极端仇视学堂，其稍之开明的士绅，则认为过了海的是神仙，又以资送子弟出洋为荣。赵尔巽首先着手于贫民启蒙教育，树之风声，这是有道理的

一九〇五年春，赵（尔巽）去端（方）来，令改半日学堂为初等小学，并添筹经费，合计共设小学堂四十所，委俞浩茂为四十所初小总监督，将犁头街旧学舍改为总监督办公处。

附录湖南学务处转飭筹办初小札文：

“为札飭筹办事，案奉抚部院札开：照得立国之本，在于教育，开化之基，基始蒙养。湘省学界，经历任抚部院设法提倡，士气发扬，规模粗备，国势艰危，则利在速获，法制更变，则首育成才，今高等小学以上学堂，皆已次第兴办，而于初级教育未能次第扩充，良由才难款绌，未暇兼顾也。今高等、师范、中学亦既略植基础矣、苟非多建初级小学，则升选

无济，根基不立，欲教育之普及，其道无由。本部院究心学务，知非探本穷源，断无实效。前者兼施楚北，移抚姑苏，暂摄兼圻，席不暇暖，而于推广教育之怀，未尝少弛。计在鄂垣创设初等小学六十所，在苏垣创设四十所，在金陵创设四十所。今者忝抚熊湘，此事尤所注意。除暂发札定小学章程，飭令各属认真推广外，省会首善之区，四方俱瞻，必须首先普设初等小学堂，方足以资观感，至小学办法，道在造端简易，经费无多，方利推行，或就寺观建设，或提地方闲费，万不可空事铺张，虚糜巨款，致学堂不能多设，阻力因而横生，合亟札飭，札到该处即便筹议办法，预筹经费，即在城厢内外，相度地基，先行建设二十八所，布置疏密，务得其宜，所需教员即以官私学堂师范学生充当，每一学堂所费不得超过三百六十串，每堂开办经费不得超过三百串，并将所开半日学堂十二所，一律改为初等小学，合成四十所，务即迅速调查明确，开单详覆。切切。等因奉此合行札飭，札到该监督即便遵照妥速筹办，禀复核详，勿迟，切切，此札。

关于经费预算概况

每所教习二员，束修每员月计八千。

岁计共一百六十千。（分十个月摊送，年暑假两个月无给）教习火食二分。每分月计一千五百，岁计三十千。（每天饭三餐，每餐小菜二品，茶水在内）

灯油茶叶添菜二分。每分月计千二百，岁计二十四千。（分十个月，与月薪同发）

每所看厮二名。工食月计五千。

岁计六十千。（一识字者月三千，一力弱者月二千，因随时要一人到办公处领取需要，故用二名）

灯油烧茶煤火一分，每月一千岁计十千。（按十个月计）

每所学生四十人。操衣裤四十套。

岁计四十千。（每年每人发一套，每套一千）

书籍纸笔墨砚四十分，每名月计八十文，岁计三十二千。（以十个月计，每月三千二百文）

每所杂用项下：添置厨房器具岁计二千，修理房屋岁计一千。

总共每所每年共应额支三百六十串文。

各所小学分布地址

初小四十所地址，设于省会城厢内外者计二十有七所，离城不出五里以外。离城百二十里的第三十一所在北乡绵绣都荷塘寺，离城八十里的第三十三所在北乡淳化都青山市都天庙，离城八十里的第三十五所在北乡清泰都长沙庙，离城八十里的第三十所在西乡三邑卯江桥，离城七十里的第三十二所在东乡三都岳云寺，离城七十里的第三十七所在南乡五都兴隆寺，离城七十里的第三十八所在东乡河西都徐家桥，离城七十里的第四十所在西乡向家墩，离城五十里的第二十四所在南乡车马桥湖田冲，离城四十里的三十四所在东乡万寿都四甲大兴寺，离城十八里的第三十八所在东乡明道都马坡岭，离城十六里的第二十八所在东乡圭塘静善寺，离城十里的第二十九所在西乡望城坡蒋家坪公屋。

小学教习的关约

“今聘某君某某为湖南官立第某之学堂教习，兼任管理，议定关约条例于后：一主聘人接待受聘人，当礼意优渥，诚实无伪。一、受聘人应尽其所认教科管理之责任，并遵守学堂规则，一、除星期外，不得辍课，或有特别事故，可暂托妥人

代庖，惟必預告主聘人，一、全年薪水八十串文，作十个月分送，灯油茶叶添菜钱一串二百文，按月摺取，每月伙食钱一串五百文，由收支处按月给看厮承办，一、岁始开学及暑假年假节并万寿节至圣诞出馆到馆，均有定期，不得任意先后，一、教习不得私受学生馈赠，致有偏憎偏爱，一、教习招徕学生，不得以贫富为去取，并不宜专收聪颖而弃鲁钝，因材施教，均宜望其进步，一、教习有督责本堂看厮之权，功过可随时报告，有过不得徇隐，小故亦不必吹求，一、教习分任教科，宜互相纠正，以集众长而求进步，一、学生所领之书砚笔墨及操衣等件，宜谕令珍重爱惜，并当预为籍记，以免遗失，一、学堂制度及教授各法有当更改之处，可向主聘人随时商酌，学堂离办公处远者，可以片牍往复，一、此约受聘日起，有故辞退之日止，按月摊算，月望后作全月论，月望前作半月论，一、年假时可留聘，来年另换新约，一、此约系彼此公认，宜同遵守，缮立二纸，一存受聘人，一存主聘办公处。受聘人某君某某，主聘人初等小学堂办公处，保证人某君某某，光绪某年某月某日立。”

关于课程方面

清末，学部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功课，系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另习图画、手工为随意科。端方暂定初等小学堂学科为六目：一、修身及讲经；二、读经及国文（包括语言、作文、习字三项）；三、算术；四、体操（乐歌）；五、图画；六、手工。其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因教习难于觅聘，暂时不必专立一门，只于课本中兼教其大意。又国文一科先读读本（用无锡原刻之《蒙学读本七编》由教务处仿刻大本）俟文义明白，再读《孝经》《论语》（孝经用御注，论语用朱注）。修身用《蒙学经训修

身教科书》及《朱子小学》。学生上下午各授课三小时，上下课堂以鸣梆为号，习字则办公处刻有红模本、黑影本，月终汇订送办公处检查。

初步走向学堂制度的轨道

半日学生日给津贴缗钱十文的办法，始意在于开通兴办学堂的风气，行之日久，不仅得钱者没有把它作为小贸营生，而且因此肆其嬉游赌博之资，反引起社会进步人士的反感。认为予人以资财，不如教人以手艺，资财不过养生之一日，手艺则可贍之毕生。吾国之人现所苦者，无术谋生耳，来自国外之所习见小商品，类皆成本轻，获利厚，形成漏卮，为数甚巨，为能提倡仿造，亦属轻而易举之事。今以有用之金钱，掷诸虚费，殊不值得。于是，裁去半日学堂每日之津贴钱，划出七成，设立艺徒小学堂，以艺事为主课，教以金工为造画图器及虎钳之类。木工如造云板、三角板、丁字器、木哑铃之类，仍教以读书识字及应用之科学，即由各半日学堂中选拔年龄较长的学生得五十人，编为一班，办理两年，已有一些出品，另以所余三成，考取各堂学生之国文粗顺、算学已通除法者，得四十人，开办选升高等小学堂一所，聘任教习三人，一教修身、经学、国文；一教舆地、算学、体操；一教图画、乐歌。加丰束修，每年各人百二十串，学生不寄宿，只给以午餐，每年各发操衣裤两套。

到了一九〇五年终，湖南省会高、中、初三级各学堂计有：湖南游学预备科，正监督现任按察使张鹤龄兼，副监督兼教务长罗永绍，高等学校监督陈庆年，中路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监督马邻翼，求忠学堂监督俞蕃同，中医学堂张祖同，实业学堂监督王铭忠，副监督陆鸿逵，长沙附中学堂监督郭宗熙，长沙县师范学堂监督张祖同兼，善化县乡村师范学

堂监督许翔，经正中学堂、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宁乡中学堂监督齐璜，修业中学堂监督王植干，求是学堂监督唐济村，湘阴师范学堂监督仇道南，思益中学堂监督李克璜，长沙民立第一中学堂监督彭均，新化中学堂监督邹代藩，邵阳中学堂监督刘庚先，算学专科监督王叔义，此外有中路师范附属小学堂，长沙县高等小学堂，明德小学堂，湖南模范小学堂兼附属蒙养院、楚材小学堂、养正小学堂，选升高等小学堂，选升艺徒小学堂。外籍教员有日本籍的岩本周平，小林久平，关口壮吉，加知员一郎，福士末之助，荒木勉三郎，浅田忠顺，掘井觉太郎，永江正直，野崎崎治郎，关口觉太郎，阿布正治郎，中村良一郎等大都担任物理化学及博物学，还有三个女教员春山雪、佐田操、坤井里，担任蒙养院的幼师，今天硕果仅存的，只有当年在高等学堂以教务长兼舆地用器画的教师周震鳞了。我是当年游学预备科德文班的学生，解放以后，少年同学偶尔碰头的亦晨星寥落。有易鼎新、谭戒甫、梁应乾、曾芸阁、唐希沚、张秋尘、胡根甲，荆嗣佑、邓介松，胡庶华、李邵东，余已无从存问。附记于此，以志不忘。

俞浩庆其人

俞浩庆字教华，善化（今长沙县）人，以举人派赴日本，入速成师范，归国后充湖南学务处文案，后调办师范馆及省会小学教育。小有才，对人尖刻，而又不自检束，好冶游，各小学教员积怨最深。一九〇六年湖南民立学堂风起云涌，一时称盛。为会葬陈姚二烈士于岳麓山，他压制所属学生不准参加，并说：岳麓是官有地，今不问而葬，是侵夺所有权也。大清律：民地皆有禁步，不许进葬，官地加等。今不买而葬之，是盗葬也。已激起群众公愤。每逢学堂发生风潮，不管是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湘潭中学堂、经正学堂，或与办事人冲突，或

者是拒加学费，他总拿要出他的威风架子来，一定要该学堂斥退数人，甚至声言全堂解散，专与学生作对。他往往夸张自己是不顾一己之利害，惟求真理之是非，当时虽有异同，事后无不认输。一日俞设牌局于私妓家，为小学教员所侦悉，一声吆喝，从败席中揪出，扭至西长于周濂溪祠，召开群众大会，并促令他钻在私妓的胯下，摄取一极猥亵之影片，会场人声鼎沸，俞敕华挺立台上，肉袒反缚，左右缀以长绳，两学生牵之，割去的发辮，挂其裤带之上。有主张游街示众者，有主张痛加鞭撻者，有主张投之湘流者，情形甚为险恶。其亲属俞经贻（蕃同）在省办学，尚称积极，急走游学预备科向罗仪陆（永绍）求营救之策，罗遣苏鹏（时在科管理科学仪器）速往会场，相机解脱。苏鹏是由日本接获陈天华灵柩回湘之人，人皆周知，径自登台演说：首先痛斥俞敕华身为人师，不知自重，理应严惩；继以群众无法权判决人罪，张公筱圃（鹤龄，兼湖南学务处）为学界所共仰，俞敕华供职学务处，为其属僚，不如解送学务处，请其惩办，必有以慰群情。群众一致同意，始得脱离会场。临行，苏鹏还脱下自己所着的绸衫一件，与之遮羞，事后，敕华以怨报德，谓此事全然是苏鹏的革命阴谋，唆弄湘抚悬赏五百元缉苏。游学预备科也为清廷所忌，强制解散了。有把会葬与斗俞两事缀成联语，至今犹为人所传诵：“其死也荣，其生也哀，天华千古，敕华千古；载易之地，载寝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

到了辛亥革命，湖南宪友会既篡夺湖南革命政权，俞诰庆成了谭都督（廷闿）入幕之宾，唐乾一盛称都督府之有秩序，有条理，皆由彼与陈炳煥、俞诰庆组织之力。湖南封建绅权，黑漆一团，总是换汤不换药的。迨至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勃然兴起，俞诰庆始在教育会坪受到反豪劣运动大会的最后制裁。实湖南教育界之典型败类，特附誌之。

清末湖南的师范教育

谭绍黄*

清末维新运动，很多有识之士都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介绍西学。同时还强调学校师资的培养。梁启超一八九六年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有一节《论师范》，论述师资缺乏后果严重，必须重视师资培养，慎选师资。他陈述当时师资情况：“今天下之变日亟，教学之法亦日新，于是立为同文馆，水师学堂等，皆略效西制，思讲实学，然一切教习，多用西人。”并列举用西人充教习之弊端，以致“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粗极陋之西人。”又说：“夫以四万万之大众，方领成帷，缝掖如鲫，而才任教习者，乃至乏人。天下事之可伤可耻，孰过此关。”因此，他的结论是“欲革旧习，兴智学，必须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湖南当时是受变法维新思想影响较深的一个地区。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谭嗣同写信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痛陈时局危迫，非变法不可。提议先在家乡浏阳县设立算学格致馆，以开风气，培养人才。乃于浏阳文奎阁创办算学社。第二年，将算学社扩大，改称算学馆。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陈1895—1898年在湖南巡抚任内，慨然以湖南开化为

* 谭绍黄，建国前系湖南省教育厅中教科师范股长，建国后在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

已任，锐意整顿。与谭嗣同等倡办新政，为清末地方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者，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半年）梁启超在长沙时间虽不长，但通过教学活动，大力宣传变法理论，广泛地介绍西学，对封建旧学大加批驳和评击，影响很深。

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了维新运动；但她后来为了装饰门面，以欺骗世人，却不得不下诏“行宪”，施行其所谓的“新政”。

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巡抚俞廉三根据清政府的指令，决定在乡试没有中选的人员中，挑选年在三十岁以内，才学较好的一部分送京师大学堂学师范；一部分派赴日本学习师范；另一部分则进在省城开设的师范馆肄业。这年农历十二月初四日举行考试，计取录送京师大学堂的五名，送去留学的二十一名，调入省城师范馆肄业的四十名。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师范馆开学。租凭黄泥街余宅为馆址，延聘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为馆长，俞浩庆为监督，皮锡瑞为伦理学教习，黄山为史学教习，周震麟为地理教习，许兆魁为算学教习，单启鹏为物理化学教习，陶孝澄为外语兼理科教习，徐继焜为体操教习。学务处派委员胡珍协助馆长管财经、馆务。学生每月发给膏火银四两，肄业一年后成绩及格的发给文凭，准充任中小学堂教员。十一月巡抚赵尔巽以黄泥街馆舍窄隘，无法扩充学额，于是决定将馆址迁入城南书院（现在的书院路第一师范），改聘刘棣为监督，并扩充班次，连同原有学生共达一百余人。这个师范馆便是湖南办理正规师范教育的嚆矢。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分路办学之议起，湖南巡抚赵尔巽就城南师范馆改为中路师范学堂招收长沙、宝庆（现邵阳）、岳州等州、府属之学生；于常德创设西路师范学堂，招收常德、澧州、辰州、沅州、永顺、靖州等州、府属之学生；于衡阳创

设南路师范学堂（现在的第三师范），招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等州、府属之学生。

宁乡朱剑凡曾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将长沙泰安里私宅的半边园林，辟为校舍，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为免遭清政府查封，命名的周氏家塾（朱剑凡原名周家纯），实际上办有师范班，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一九〇七年清政府不许办女学的禁令稍有放松，于是学校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学堂，继续开办女子师范科。一九〇八年还设置了缝纫、体育、音乐等专修科，为湖南开展女子教育培训了大批师资。这时期，私人办的中学堂如明德、岳云等校都办有师范科。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湖南巡抚指令学务处将校士馆一律改为师范传习所。通令说：“本省各属中小蒙学业经次第设主，惟目前师资未善，课程不免纷歧，必以先办师范学堂为第一关键。现准学务大臣来咨会同湖广督部堂张奏定学堂章程，师范有优级，初级，传习所，旁听生之区别，自应分别造就，以期浅深缓急，咸于用适。章程内并无校士馆名目，亟应遵章将各校士馆悉行裁撤，分别省治、府治、县治厘定办法，通限三个月内办成省城师范学堂，优级初级两等师范。总校士馆改为师范传习所，以为各属标准。”其实，全省的校士馆为数并不多，这个文件中也已指出：“各属前禀校士馆情形不同，有业已改作小学堂，有附设小学堂内分途办理者，有特设一处尚未归并者，大率不外此三项，现既一律裁改，应明令章程”。当时，县办师范传习所或速成班的却不少。不过大多借助于省城长沙的设备和师资条件办“驻省师范”，如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

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办起了一所优级师范（相当于大专院校）。这所学校自一九〇七年开始在省城贡院地址（即现在的教育厅）兴筑校舍，至一九〇八年夏全部竣工。设

本科和预科。本科设理化、博物、数学三系，各设学额六十名，预科设学额六十名。全校共计二百四十名学生，于九月二十六日开学。

一九〇一年（宣统二年），为了培养职业学校教员，还举办了实业教员讲习所，不过这类讲习所不是单独设立的，而是学农业的附设于农业学堂，学工业的附设于工业学堂。

至此，清末湖南的师范教育，在学制上，从初级到高级勉强形成了一个体系。

清末湖南教育琐闻

王祖歧*

创办贫民小学

湖南教育，自一八九八年（清光绪廿四年）开办时务学堂，随新学风气的转变，开辟了学术维新的道路。到一九〇二年以后，学校渐具规模，随后日见进步，设立了小学中学师范各校，继又设有实业及中等、高等工业，逐年发展分科授学。教员有来自外国留学的。但各校所收的学生，大半都是官僚、地主及资本家的子侄，绝少工农和贫民子弟。直到一九〇一年先儒王葵园（先谦），建议于提学使吴庆坻，将自己任学务公所议长每月薪资银二百两，存储到一千四百两，备作开办简易小学堂之用，以为提倡。并具抚院呈文，略云：“各省官立民立学堂不一而足，而贫民小学弗及焉，虽有初等小学堂章程，顾以经费难筹，奉行率鲜。务其大而遗其小，似犹未尽国民要义。今拟请设立简易初等小学堂，用少数之经费，施切实之教法。先就省城试办，为之楷模。然后推及各属，使乡村僻壤，易于仿行。凡及岁儿童，皆令便宜就学。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艺初通。其优者递升高等小学，次亦可安分谋生，不至游荡无归。如蒙允准，职当联合同志，办理小学堂十数处，以为之倡。遵照公立小学章程，总期费少效多，大众闻风兴起，以渐达西人所称无人不读书识字之目的。是否有当，乞示遵

* 王祖歧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编辑员，交通史纂修，建国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行。”等语。旋经政府赞同后，又凑成二千多两经费，即于一九〇八年春，在长沙四城，开办十余处，校址租用四城祠宇及官署余屋，用单级教授。按初小课程，教以国文，算术、地理、常识等科。每堂约收学生多至八十人。到一两年后，有半数考入公立的高等小学，及工艺学堂。其不能升学的，各就本性，分学手工业。虽说初步业初，到后来培植成材的也为数不少。

日本西园寺公望参观湖南教育的意见

闻前辈传述：清光绪年间（述者忘记年岁，以张鹤龄署臬司时考之，约在清光绪三十年以前）日本前总理大臣候爵西园寺公望，解职后来湖南游历，署臬司张鹤龄延观学堂，问以办法何如？答曰未尽善也。鹤龄询其故，答曰：“敝国先用普通办法，数年之后，用模范办法，注重工艺实业，选派通晓西语西文聪颖笃实者二十余人，分任各门，遣赴西洋学习。昼则听讲，夜以所学，译成国文，交本国特派之邮政员，收受驰递，不许一日间断。并召其父兄，谕以该子弟川资家用，格外优厚，望其为国宣力。倘不如令，撤回追缴。派遣之后，通国预设学堂，以待译文一到，分校学习，转相传授，比户风行。其派遣之人，三年五年，毕业回国，得受官爵，而通国学成者，已数十万人矣。详其办法，分门派学，无许半途改习。遂日译寄，不令一得自私。数年之间，全国通晓艺术，用意周而收效捷，无过于此。”日本以贫寡之邦，派遣甚少，而成效大著，遂为富强基础。我国中学明达，兼晓西语西文，能直接听讲者，颇不乏人。诚宜及时仿办，精选多派，将来成效之大，岂不更甚于日本。西园寺又言：“日本初次派遣学铁道者六人，三年毕业，通铁道学著，已六万人。”又言：“贵国普通办法，可全改为模范办法。若不改图，虽万年亦无成效。”云云。据说当日关心教育的人士闻之，认为此种办法，收效甚多，中国

尽可仿办。嗣后事隔多年，闻由湘抚晋京入告，交“学部”知道。结果学部也未拟定甚么具体办法。满清政府，遇事敷衍不负责任，可想而知了。

湖南大学早期史料一页

唐伯球* 黄士衡**

湖南大学前身——湖南实业学堂创办于前清光绪年间。在辛亥革命前的一个时期里，该校监督是曹典球，校址在长沙落星田。学制是中等本科五年毕业，高等本科三年毕业。中等本科毕业后如愿意深造，可入高等本科。报考中等本科者，系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当时该校共有学生十个班，第一、第三班为采矿冶金科；第二班为土木科；第四班为土木建筑科；第五班的人数较多，按英文程度的高低分为甲乙两组：英文好者入甲组，学采矿冶金，次入乙组，为应用化学科；第六班为机械科，为便利实习，该班附设于铜元局（后改名造币厂，在长沙市南门外六铺街）；第七、第八两班为高中程度，并未分科。另有窑业科，系由醴陵窑业公司迁来。这是该校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概情况。

一九一二年建立民国后，监督曹典球离职去北京，湖南都督谭延闿，教育司司长吴景鸿委任陈鸿范为校长，并将实业学堂更名为高等工业学校。陈鸿范任职仅数月，即辞去，改由廖名缙继任校长。廖为湖南教育界有名人物，曾任各校教员及明德中学

* 唐伯球曾任工业专门学校职员、安江纺织厂厂长，建国后任湖南省参事室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已故。

** 黄士衡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已故。

教务长，颇得学生好感。一九一三年，原实业学堂的一、二、三、四、五班和窑业科，无论已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均参加了政府或工矿企业的工作，没有回校。只有六、七、八三班和四班一部分学生回校，继续学习。六班机械科仍在南门外铜元局上课。七、八两班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充了岳麓山高等学校停办后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学生和报考明德、经正、常德等中学毕业的一部分学生，合并成为采矿冶金科一、二两班，同时又补充了一部分当时高中毕业生，参加原有的土木建筑科。这期间，衡阳中学校有一个班学生毕业，全被保送到本校应用化学科。这是当时高等本科学生班次的概况。另外，由校招考预科三个班，规定在校读三年后升入本科，考生系高小毕业生或中学预科生。

校长廖名缙在湖南办教育多年，当时与胡子靖、曹典球齐名，他与湖南都督谭延闿交情甚厚。谭亦热心于教育，曾一次批准拨款三十万元，向德、英、美等国购买仪器（包括测量制图、物理、化学、冶金等项仪器），书籍、标本（包括各专业教课书，参考书和动、植、矿物的标本），化学、冶金、药品等。本校图书、仪器、标本以及化学冶金药品的充实，在国内各工业学校中是罕有的。惜廖去职后，学校发生风潮，多次更换校长，管理废弛，这些图书仪器遭到严重的损坏和散失。

廖校长是共和党人，办学有经验，学生对他很好。但教育司长吴景鸿是国民党人，他们不容许一个共和党人占据高等学校职位，使用诬陷的行为迫使廖弃职。教育司另派国民党人黎尚雯接替。黎在校时间很少，经常鼓吹革命，对教学管理很少注意，使学生养成一种骄傲和自由散漫的习气。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害，全国发生第二次革命，黎尚雯当选为参议员。去京前，由他宣布本校国文教员欧阳璈代理校长，因欧不孚众望，学生大闹风潮，近三个月始告平息。汤芑铭督湘后，政府中的国

民党人均去职，有的且遭到汤的屠杀。汤认为此校校风不良，便以整顿为名，派施文尧为校长。施来校后，用专制手段禁止学生自由集会，并且干涉学生的言论行动。全校学生在廖。黎两校长任期所养成的民主自由风气，被施文尧摧毁无余，并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化学实验课中，应用化学科的学生杨汉湘与教务长孙显惠因领取化学药品发生口角，当日被开除。该班同学多系衡阳学生，团结力很好，既恨施文尧的专制，又为杨被开除抱不平，当晚即联合各班同学起而反抗。其他班学生受到施的高压，不敢同情他们。该班学生便单独行动，于当晚布置，各将自己的行李搬往亲朋家中。次日上课时，该班有计划地在杨汉湘质问施文尧时，打了施一顿，随即离校。施向汤芑铭报告，汤即派一营兵包围学校和宿舍，搜捕未获。当即下令解散应用化学科，并开除全班学生的学籍，追缴该班学生每人二千元的教学损失费；除通辑杨汉湘及打人的学生外，还命令该班学生原籍各县向其家属勒缴教学损失费，闹得各学生家庭鸡犬不宁。而以杨汉湘家为最惨，军警搜索，家人四散逃匿，家产荡然无存。杨汉湘与一部分同学逃往广东、广西参加湘军。与此同时，施文尧又下令将预科三个班一并解散。迨至一九一六年，湘军驱走汤芑铭时，程潜的先遣部队首先进驻长沙，唐蟒担任长沙警备司令。杨汉湘和逃难的同学张光国等已在唐部任营长和参谋。他们一到长沙即禀请将施文尧逮捕并予枪决，宣布施的罪状是组织“十姊妹”小团体，勾结军阀把持湖南教育、残害学生等。

施文尧自解散应用化学科和三个预科班后，在校学生极为不满，教职员亦表示反对，加之湖南教育界一般公正人士啧有烦言，汤知道已非施之能力所摆布，不得已，乃将他调出，改派宾步程接任校长。宾曾留德学机械，一九一二年归国后，任南京兵工厂厂长，粤汉铁路机械工程师，勇于任事。接管该校

后，锐意革新，并呈请政府更校名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内除原有机械科、土木建筑科、采矿冶金科一、二两班外，另设教员养成所，招有机械班，应用化学班。原有的土木窑业两科因缺乏师资，该两班毕业后，停止招生。后来又附设金工科和附属中学。金工科设在长沙市北门外留芳岭湖南机械厂内（一九一六年湘人赶走汤芑铭时，军长曾继梧截获汤在湘贪污赃款十万元，全部向国外购买母机，成立湖南机械厂，开办数年后营业不振，后政府将该厂提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作实验工场），金工科招收的学生系高小毕业生，在校学习两年毕业。学校注重实习，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培养机械工人和工目。附属中学招收的学生也是高小毕业生，在校学习四年，考入本科以便本科招生及可安插一部分本科毕业生充当教员。本校学制定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招收中学毕业生或本校附属中学的毕业生。（那时湖南的学制是初小、高小、中学、专门学校或大学，本校预科专攻英文、大代数、解析几何及高等物理化学）。投考入学时即分科，不过读完预科后仍可按其学习情况和本人志愿准其改入别科。各专科所学的课程如后。

机械科课程：微积分、应用力学、水力学、应用化学大意，机械制造法、机械学、发动机关、机关车学、船用机械学、冶铁学、制造用机械、电气工学大意、计划及制图、工厂管理法，工业经济，工业簿记、实习（每逢暑假即赴国内各机械厂实习）。

采矿冶金科课程：微积分、测量学（地形、隧道）、分析化学（定性、定量），地质学（历史、经济），机械工学大意：电气工学大意，风管分析、矿物学、岩石学、采矿学、冶金学、冶铁学、选矿学、采煤法、实习。

土木科课程：微积分、测量学、地质学、力学、建筑工程学、材料强弱学、桥梁学、机械工学大意、电气工学大意、水

力学、计划及制图、实习。

学校配备有附属机械工场，铅印部，化验室、试金室、图书管理室、药品仪器管理室等，在当时国内各工业专门学校中是比较完善的。各专科课程大体比照外国工业专门学校和国内各大学工科课程。本科均系采用英文原版教本，学生可向图书室购买或借用，有的或由学校翻印发给，只有机械三个班系用德文教授，并采用德文原版教科书，该班学生在预科时即专习德文和数理。

本校落星田校址不大，各科班次逐年增加，教室宿舍均感不够。一九一七年，岳麓山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筹备处撤销，校址全部拨归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本校遂从落星田迁至岳麓山（即现在湖南大学校址），校舍宽敞，从此所有学生皆在校寄宿，管理亦称方便。

宾校长不惜重资选聘教员，从上海、广州各地聘请著名教授，各专科主任教员多系英美留学生或外国人。学生平时在本校工场及实验室实习，暑假或毕业前则由校派送省内外各大矿山、工厂实习。毕业后由校商请省实业行政主管部门介绍至各有关厂矿见习，期满后分配正式工作。有的即由本校直接介绍至各厂矿工作或在各学校任教课工作。宾为学生谋职业最为热心，学生对他亦有好感。

当时，国民党在湘虽曾设立支部，本校教职员和学生却很少参加，但体育文娱活动相当活跃，对各种爱国运动亦踊跃参加。全体学生都曾加入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五四、五七、五卅等纪念日游行示威，也大多参加，并曾组织爱国新剧团，于暑假期内下乡演出。一九一八年湖南各界人民代表组织请愿团赴衡阳向吴佩孚请愿，驱逐湘督张敬尧，本校学生亦曾派代表参加。

宾步程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主持本校将近十年，备

科先后毕业学生，设有机械一至七班，另电机一班，采矿冶金一至八班，土木建筑一班，应用化学一班（该班虽由施解散，后又授足课程，在宾任内呈请教育厅补发毕业证书）另教员养成所机械一、二班，应用化学一、二班，合计本科二十余班。又金工科一、二班。附属中学一至六班，学生共约六、七百人，散布在省内外各地工厂、矿山及工矿企业，行政机关工作，尤其是在湖南工矿业中如水口山铅锌矿务局、湖南炼锡厂、炼锌厂、临武香花岭锡矿局、醴陵煤矿局、金矿局、桃源金矿局、新化铋矿局、湖南公路局、湖南第一纺织厂、湖南机械厂、以及华昌炼铋公司、瑶岗仙的钨矿公司和公私所办的一些煤矿铋矿工作的，为数不少。

宾任职时期，正当军阀混战，湖南政局亦屡有变动。如驱汤（梦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战争频繁，学校因教育经费缩减受到摧残，本校历经变乱，尚能维持原状未受大影响，皆因宾本人未曾卷入政治漩涡，且与各方联系得力之故。可惜他后来热衷于利禄，以校长而兼任湖南造币厂厂长，影响校务，致使部分议员不满，校内学生亦因其久不到校，放弃责任，起而罢课驱宾，宾愤而辞职，政府改派杨茂杰氏接替。

唐伯球先生曾在工专学校充当职员。这篇史料（工业专门学校系湖大的前身之一部分）所述的事实确是宾步程在工专校长任内的真实事实。这篇遗稿是在伯球先生去世之前由他的爱人章淑明同志送来的，弥足珍贵。

黄士衡

1961. 4. 16.

回忆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俞 峻*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湖南法政学堂成立。分官、绅两部：属于官者曰官校，属于绅者曰绅校。校址均在长沙又一村贡院旧址。学堂内设正副监督各一人，并设教务、学监、庶务、会计、文牍、书记等员。正监督由湖南巡抚就候补道员中遴委，副监督则聘请湘乡胡子清充任之。官校肄业年限为一年半，由湖南巡抚令在省候差之知县佐杂人员入学肄业。绅校设别科（三年毕业）、讲习科（一年半毕业），招考举贡生监入学，讲习科仅办一二班即停止，以后专办别科。

法政学堂监督虽有正副之分，而正监督系一官场人物，向不与闻校内之事，故官校事多为教务人员主持。绅校事则由副监督全权办理。所聘教员多系留日毕业回国或湘教育界有声望者，如湘潭张人镜，临澧黄右昌，长沙王冕南、陈锡宇，湘阴任绍选，长沙杨树谷，湖北王鸿甫、曹子真，江西陈天欧，廖铭缙，湘阴陈凤岗，长沙谭传恺、陆运仪，湘潭杨钧，长沙俞峻等。

稍后于湖南法政学堂者，有湖南景贤法政学堂，监督为长沙彭清藜，亦由湖南巡抚聘任。校址设长沙新开旧址，[?]监督下设教务、学监、庶务、会计、文书等员，教员则多由湖南法

* 俞峻曾任湖南各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刑法学教员、湖大教授。建国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已故。

政学堂教员兼任。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不久湖南响应，时局动荡，湖南法政学堂因而停办，翌年恢复，学校迁往肇嘉坪新址。官校当然不复存在，绅校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称第一者，盖景贤法政学堂亦已于此时改为湖南第二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矣。第一法校首任校长仍为胡子清，继任者有湘潭宾玉瓚，醴陵肖跃鲸诸人；第二法校首任校长为岳阳李光第，继任者为临澧黄右昌。

辛亥革命后，武冈银文焕创办湖南私立法律学校，(后改为公立)，设有法律别科及监狱、指纹等班。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湖南公立第一、第二法政专门学校与公立法律学校合并成立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址设戡子桥，任校长者有湘潭吴汇宗，湘阴徐光谟，长沙张笃光，湘阴任绍选，永州李希贤诸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分政治、经济、法律及政经等科，三年毕业。初期，入本科者，须先入预科一年，后则专收中学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始选入本科肄业，教员由校长聘任，现能记忆者有邵阳赵恒，长沙何维道，湘潭陈世琪，平江李六如，长沙魏先璞，湘潭周寿衡，长沙金壮春，平江毛简卿，长沙丁思诚，长沙杨宣诚，长沙张光笃，江苏王凤苞，湘阴任凯南，岳阳阮湘，长沙刘天铎，江西陈天吹，衡阳王克家，邵阳栗威，醴陵宁协万、慈利康自由，邵阳李达，湘阴任绍选，长沙柳克准，宁乡成应琼，长沙王启湘，衡山王××，长沙俞峻诸人。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赵恒惕任湖南省长时，令湖南工法商三专门学校筹设大学。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湖大始正式成立，不设校长，由委员十人管治之。就原有省立工商法三专校分设理、工、法、商四科，法科仍设戡子桥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原址。各科设学长各一人，法科学长为永州李希

贤。李解职后，由浏阳罗介夫继任。法科分设政经系，法律系，政经系主任为岳阳阮湘，法律系主任为长沙俞峻，学监二人由湘乡王季范及祁阳李达充任。

一九二六年八月，湖大改委员制为校长制，由省府聘东安雷铸寰为校长。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发生，湖大停办…。

（俞峻口述 俞润泉记录）

赵 恒校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篇是俞峻（笏山）先生遗稿。

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也是湖南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可供研究湖南大学历史和湖南高等教育历史的参考。

黄 士 衡

一九六一，四，十六。

湖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概况

王 醇 古*

有清一代，各省总督、抚、司、道至府、厅、州、县各级衙门，皆系其主官与幕宾（一称幕友）、房科胥吏（如各府、厅、州、县衙门均设有吏、礼、刑、工、兵等房科，各房科胥吏之主其事者称吏目，其余称吏，总称之则为书办，均为终身职）、差役（就各府、厅、州、县衙门言，有三种差役，专办征粮与催粮事务者曰粮差。专办民刑诉讼案件传案捕人者曰民差。专办缉捕盗贼者曰快差，一称快班）三部分人组成之。专就各府、厅、州、县言，幕友有刑民（一称刑名）、钱谷、书启、帐房等等之别。其中以刑民师爷（师爷为对幕友之尊称）为最重要。因为府、厅、州、县以听诉讼决狱为第一要务，故主官必须延聘娴习律例，熟悉办案之专家为老夫子（老夫子亦系对幕友之尊称），以资请教。此辈刑民师爷，均有师承，大抵系就有名之幕友学习多年，而又随其老师经过几年之实践锻炼而后出师问世者。其中又以浙江省绍兴县之学[习]幕者最为著称，故有“绍兴师爷”之称，誉腾全国，迹遍各省。但就清季湖南情况而言，全省六十几个府、厅、州、县衙门之刑幕，为绍兴师爷占有者，为数极少，而百分之九十以上，尽为宜兴任子龄（字小堂，堂亦作棠）之学生们所盘据，根深蒂固，非可动摇

* 王醇古早期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建国前从事律师工作。已故。

（详见本文之附录）。辛亥革命后，旧制度更，各府（专指同于县之府）厅、州均改为县。县署称“××县知事公署”。所有原先衙门之幕友、书办、差役之制度均予废除之，而以设科（如第一科、第二科……）办事，置秘书、科长、科员、办事员等以代替之。县知事以不兼理司法为原则，另设法院办理民刑诉讼事件。其兼理司法之县知事公署，则设置承审员，听讼决狱。

在旧制根本改革，新制初步代替之时，人才缺乏，实为一大问题。虽原来之幕宾、书办等人，不谙新政，然在此过渡时期，既无新人可用，权衡事实，不得不让此辈抱残守拙之旧人暂供一时之驱遣，而培养新的政治、法律人才，遂为其时当务之急。于是在辛亥革命后之不久，主湘政者，乃有“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之设置焉（先设于省会肇嘉坪，后迁于戡子桥）。还拟继续设立第二、第三……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以广造就。徒以经费困绌，不克续办。然大局更新，旧人之新造者甚众，如旧时之候补官员、学幕之人、房科书办，以及续任新职之旧官吏、旧幕友、旧书办等等，均迫切渴望得入新的学校，获得新的政法知识，取得新的学笈，从事新的事业。于是，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应时而起，如群治、达材、爱国、会同等等同时成立，所招收的学生均多，报一时之盛。

根据当时之法令（辛亥革命后之初期，法律极不完备，多有以发布命令代替法律者），凡私立学校称为“财团法人”，必须有固定之基金，尤必须有固定之校舍，否则不合财团法人设立之规定，既不能向当地法院为财团法人登记，亦不能向教育部、厅申请立案，招生开学。当时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中，惟群治、达材两校，既有一定基金，复有自建之校舍，于是得以获准立案。其他爱国等校则以基金、校舍两皆缺乏之故，未能请求立案，仅如昙花一现，即消逝矣。

私立群治法政专门学校，系由罗傑、郑芳、栗戡时、曹孟其等人集资创建。首先购得长沙连升街旧长沙县衙门除马号、监狱以外之房屋基地（即现在之九如里）改建西式楼房以为校舍。罗、郑、栗三人更递为较长。达材法政专门学校，系由任绍选、马续常等人集资创设。首先购得长沙福星街基地，建筑新式楼房，以为校舍。任、马等人先后更递为校长。两校皆设有校董会，为推选校长，管理财产，稽核学校收支等项之机构。

群治、达材两校与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虽有公、私立之区别，此不过就其组织隶属而言，至于其中科系之区别，课程之编定，教员延聘等等，三校实有合一之步趋焉。三校均设置法律、政治、政治经济三系，而以法律系为经常之设置，政治及政治经济系之设置则有或断或续之时期。各系又分为本、别两科，本科四年毕业，别科三年毕业，均以中学毕业（旧制四年毕业之中学）或有中学同等程度者为报考之资格。各系之课程均依据当时北京教育部规定之标准。各学科之教员，大都担任三校同一之功课，如当时各教员中：赵恒之比较宪法、陈世琪之商事法规（包括商人通例、公司条例、商行为、海商法、保险法等等），俞峻之刑法总论及各论，黄右昌之罗马法，宁楚禅之国际公、私法，魏先璞之伦理学及心理学等，均系同时担任三校之同一功课。故三校学生之学识程度，大致无甚悬殊。

三校毕业学生之出途，以服务于旧法界，为各级法院推，检书记官者居多，当律师者次之，在旧政界任职者亦不少。亦有未涉足于旧政、法两界，别谋生活门径者。情况极不一致。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当湖南实施省宪之际，徐同初为湖南司法司长，于湖南普设地方、初级两审、检厅，所需厅长、庭长、推事、检查官、书记官长、书记官、典狱官，看守所长等，为数甚多，因此，三校学生之赋闲者，一时网罗殆尽，在

当时亦有相当之成效可觀焉。

当时社会人士对私立群治、达材两法校，颇有訾议：有谓该两校之创办人系籍办学图利者；有谓其“开学收学费，毕业送文凭”，不问成绩优劣，一视同仁者；有谓其不务实际，不重成绩，粗制滥造，贻害社会者；有谓其……种种攻击指责之辞，不一而足。究竟真相如何？得一为之论述。两校创建于民国初年，正新旧交替之际，招收之学生，大都为清朝之旧官吏、旧幕友、旧书办等人。其中有任新职者，如省会各级行政机关之各级职员，高、地两级审检厅之书记官等；有未任新职者。此辈皆系旧人物而求新造，多半年事已高，既有生事之关心，复多疾病之缠体，既未经过学校之生活，复多过去腐朽之习气，于此时也，麇集一堂，而作学生，整齐严肃之不足，请假缺课之层见，事诚有之。其中任有新职者，尚有职事之在身，且有兼在他校受课者，如在财政司供职之职员，有已在私立法校受课，忽因财政司创设，“湖南财政学堂（设于长沙肇嘉坪）”而被指定必须往财政学堂受课。于是以一职而兼为两个学校之学生，其请假缺课之事，更属频数。凡此情况，在当时不特为私立两法校如是，即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乃至湖南财政学堂，亦复如是。于此，可见当时办学制度之缺乏严密性，学校与机关，学校与学校之间之欠瞭解，缺乏联系性，以至对于此等问题未能作缜密之考虑，作出妥善之规定也。在此种情况之下，学生造诣之不深，成绩之不佳，自属意中之事。所谓不务实际，粗制滥造之咎，在该两私校办学者，固所难辞。至谓该私立两校之办学者，意在办学牟利，而有“开学收学费，毕业送文凭”之讥讽，此则殊非事实，过甚其词。如群治法校法律本科第五班，原只学生十二人，毕业时仅只七人，以四年毕业时间计其费用，则此几人之学费（每期十五元），何足以供应之，安有利之可牟哉？且此种情况，在民

国六、七年之后，即已不存在，因为一班旧人物，经过数年之时间，欲求新造者，皆已完毕，嗣后招收之学生，皆为中学毕业及有同等学力之青年，前此一切不良之现象一扫无余矣。故评论该两私立学校存在时期之整个情况者，应分别前后两个时期观之，不可执前而概其后也。

湖南大学成立后，即将湖南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撤销，并入湖大法学院学。群治、达材两私立法校亦停办。先是私立群治法校校长罗傑，于上海创立私立群治大学，而称湖南群治法校为湘校专门部。群治与达材同时停办后，群治创办人将连升街之群治校舍卖出，另于浏阳门外购地建屋，创设“群治农商学院”，数年之后，以经费困难而停办焉。

附录：

旧湖南劣幕任子龄(小堂)事略概述

任子龄字小堂，宜兴人，随其父宦游来湘。小堂（后以字行）少学幕，纳贤捐一候补道，并不作官，仍过其幕宾生涯，盖有胜于作官者也。湖南臬台，管全省刑狱，决秋囚，故号为秋官。臬台衙门设督审局，主办全省上诉案件。其案件较轻微者，则发交长沙府审理，长沙府则设发审局承办之。督审、发审两局，均各设置提调一人，委员数人，以资深而听断明白之候补州、县官充任之。该两局提调，委员之听讼决狱，乃至臬台及长沙知府之最后定讞，均须请教于各该衙门之刑民老夫子，故居该两衙门之刑幕者，实隐握全省刑狱之大权。而有清一代，又以刑狱为全省各府（同于县之府）、厅、州、县官之第一重要之职务，为考绩、黜陟之所凭。因此，全

省各府（同于县之府）、厅、州、县官对于臬台及长沙府两衙门及刑幕，无不竭诚趋奉，屈意交纳，以免发生挑剔阻拦等类情事，致影响自己之前途。小堂稔知个中情形，多方夤缘竟得该两衙门之刑幕兼而居乡多年，得快平生之意。

前清各省督、抚、司、道衙门之幕友，均有随带学生学幕之风气。湖南抚台衙门之邬小亭，藩台衙门之杨季猷，臬台衙门之潘季鲁，均当时名幕。且居各该衙门之幕甚久，亦各带有学生随幕学习，但各仅有三、五几人而已。惟小堂之学生众多。其学生有两类：一类是亲奉费敬（见面礼金），随幕学习；一类是已在其他处学过幕，仰慕小堂声势，自行束修（见面礼金），拜为门下，以冀叨其嘘植，获得幕席。此类学生为最多。凡候补官吏挂牌（清代候补官吏得府，包括知府与同县之府、厅、州、县缺者。由藩台衙门牌示，谓之挂牌），首先即须往拜小堂，请其介绍刑名老夫子。小堂之学生候得幕席者，小堂经常列为一表书于一个红帖之上，常塞于靴筒（有清官吏常着青缎长筒靴子，凡须随带之小文件，则纳入靴筒之中）之中，凡遇有新挂牌之官员来请其介绍幕友时，则于靴筒中取出红帖揭开，任指其上一人之姓名曰：“此人住某地，你可往访，并请其吃饭，谈谈。”此为小堂介绍幕友一定之方式，凡湖南之候补官员无不知之。新挂牌之官员得小堂之指示后，即须往访其所指定之人。此辈久候幕席之人，一旦有新官往请，当然一言即合，而为幕之宾矣。于是新官即须依照小堂之指示，设宴招待幕宾，并依照小堂固定之规律，请小堂首席，幕宾次座，另与小堂要好者几人作陪。酒席必须用上等鱼翅席，而由“梧莊”厨师承办。梧莊者，小堂之长沙塘湾（现已改名为堂皇里）住宅之题额也。所谓梧莊厨师者，即小堂雇用之厨师（确为当时长沙名厨，现已忘其姓名）也。若非如此，小堂不怪，或不赴宴，或赴宴而当众批评菜肴如何不佳，频数不

已，颇使作东之新官窘迫不堪，难以下台。如此情形，则新官必须用梧莊厨师再宴一次，始得无事，否则存此芥蒂，试能使其作官不顺利也。

全湘各府、厅、州、县官及小堂学生之居幕职者，于每年三节及小堂之生日，均有现金之馈遗，且有固定之数额，能多不能少。全湘各府，厅，州、县之刑幕，亦有小部分非出自小堂之介绍，亦非小堂之学生者。大抵各有大来头，或为新官熟识之京官（清代外官对于京官特别尊敬，尤其是任御史者）所推荐，或出自本省抚台或司、道所交用，或由于本省抚、藩、臬三司大幕友如邬、杨、潘等人各为其学生推毂，或经本身权绅巨室之介绍，此则非小堂所敢抗拒，但该新官、幕友对于小堂必须有所礼敬，否则小堂必于其任内公事中挑剔之。

小堂居臬幕及长沙府幕甚久，其学生经其介绍居各府、厅、州、县之刑幕者又甚多，各府、厅，州、县官之趋奉者亦甚殷勤，幕府声势，一时无两，劣迹彰著，亦莫与匹，当时湘人士颇憎恶之。江西义宁陈宝箴被简湖南巡抚，对小堂劣迹，先已略有风闻，及抵任，访查属实，深为愤慨，立即具奏，以“劣幕”揭参之。旋奉清廷军机处廷寄，奉旨将劣幕任子龄革职（革除候补道），由地方官将其驱逐出境。当时湘人闻之，于长沙通衢大道之墙壁上，遍贴“小堂歇业”之红纸小条，而小堂所住塘湾梧莊之门首则更大贴而特贴之。此“小堂歇业”四字，含有极深刻之双关意义：一则是“小堂”为其字，“歇业”指其被劾夺官去职也。此其意义尚极浅显。一则是湘人当时称娼寮妓馆为“堂班”，娼寮妓馆自称为“小堂”。凡娼寮妓馆之停止营业者，则于其门首贴一红纸小条，上书“小堂歇业”四字，以谢绝王孙公子走马章台者之赏临。此则遂以小堂之被劾夺官去职，同于娼寮妓馆之停业谢客等也。含义极微，盖亦见当时湘人士对小堂痛恨之深也。

小堂被劾夺官后，立即解除其所认为根深蒂固盘据极久之臬、府两幕职。因清廷旨内有“由地方官将其驱逐出境”一语，于是抚台衙门札飭善化县（清代湖南省垣设长沙、善化两县，小堂所住之塘湾属善化县管地）派遣胥役临门驱逐之出境，于是小堂乃即襁被离湘。

小堂离湘后，逗留汉皋，夤缘而入端方（字午桥，旗人）河臬之幕。因造河工报销，有功于午桥，午桥为之奏请开复原官（候补道）。后又因事忤午桥，午桥揭参之，复夺官。小堂离去午桥后，不知其又纳交权贵何人，得开复原官，遂回长沙，仍寓梧莊故居。

小堂被劾夺官去职离湘后，其所卵翼之学生为各府、厅、州、县之刑幕者，均仍居职如故。数年之后，小堂返湘，虽以在野之身，而于湖南各府、厅、州、县之刑幕，仍有其潜在势力。辛亥革命后，其学生之任各府、厅、州、县刑幕者，又多转就新职。其赋闲者，亦多入公、私立法政学校，学习三年而转入新的政法两界矣。小堂于辛亥革命后数年始去世。

旧时湘人士谓有清一代之湖南劣幕，以小堂为巨擘焉。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略述

曹典球*

一九〇三年（清光绪癸卯年），湖南巡抚赵尔巽从湘潭梁免奎之议，创建实业学堂。时科举已废，试士贡院无所用，乃就其厅事修葺之为校舍。任免奎主其事，免奎聘请福建海军学堂毕业生侯官人翁幼恭司教务。教学除国文历史外，皆主用英语原本，即初等算术，亦以英文本教之。招幼童四、五十人，名之曰预科生，俟毕业后，均用英文课本，讲授本科各门科学。次年又招学生一班，授法文，课本均用法文教授，其用意益以英美人长于采矿，而法国比国人长于修筑铁路，以此准备。将来即设置矿科及铁路科两个本科。

一九〇四年，因贡院太简陋，乃迁至小西门金线巷，校舍系赁民屋，略事修葺以充之。又招新生一班，以原在贡院所招之英文一班命曰甲班，法文一班命曰乙班，以新招之一班命曰丙班。一九〇六年春又迁至落星田故求贤馆旧址。求贤馆者，一八九五年前湖南巡抚吴大澂所创办，后改为求实学堂，旋停办者也。实业学堂迁入之后，仍其斋为讲堂，勉强敷用，是年又加招法文预科生一班，命之曰丁班。

清末学校校长，名称为监督，实业学堂设监督一人，副监督一人，监督以官吏充之，副监督则主持校事。初翁幼恭任副

* 曹典球曾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湖南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已故。

监督,翁去后,陆鸿逵继任,陆去后、彭施滌、廖名缙、王代恭,瞿方梅等相继任副监督(孰先孰后,余不复记忆),我于一九〇五年冬始至实业学堂任国文教员,一九〇六、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上学期)任国文兼历史教员,一九〇八年下学期始任副监督,一九〇九年,清政府不另设监督,即以副监督曹典球任监督。

先是一九〇七年招取学生一班,名曰戊班,作为矿科预科。

一九〇八年又续招取学生一班,名曰巳班,作为机械科预科。

一九〇九年春季,清农工商部委托该部商务议员熊希龄所办之醴陵磁业学堂停办,熊希龄请部核准,以所遗留之学生教员及仪器设备等,拨在实业学堂教学,学堂遂改名磁业为窑业科。原校学生、次第毕业往陶磁工场工作。

一九一〇年下学期又受湖南省政府委托,附设实业教员讲习所,加招学生一班,专习应用化学之分科设备的组织方法,未设专科。

一九一一年加招预科学生两班,即辛亥革命后改为高等工业学校之矿科预备学生。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冬季为止,实业学堂所聘用之教员,为地质实业家王宠佑、英国教员葛耐果礼,矿业家江顺德、蒋昌儒,美国矿学士贺非理,留德工学士宾步程,留美工学士颜连庆,美国工学士史密斯,日本工学士久保田正继,日本理学士小山十一郎,工学士深川保渊,留日矿科毕业学生余焕东(?),彭淡村,机械科学生何炳麟,刘成章,土木科学生龙铁英,龙铁原等。

一九〇八年下学期,曹典球建立矿路本科,将学堂前西杂屋拆掉,建筑三层校房一所,二层楼房一所,分置制图室、化学分析室、物理实验室以及仪器药品储藏室之类,作为本科教学之用,共买设备费省平银一万五千两,粗具科学研究之规

模，于是湖南学校始有物理试验器械，化学始有学生每人自做试验之器材，制图学生每人始有一付德国制的绘图器械，测绘始有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等器械，是时湖南尚无发电所，一九一〇年学堂自置小石油发动机一具，发出动力带动学习器械，以供学生实验，诚所谓“毕路蓝缕”。

一九一一年，为选矿实验在美国购置选矿台一具，在德国购置瓦斯发动机一台（二十四马力）。学校教学设备，大概如此。

一九一〇年时，湖南铜元局停办，厂房机器，搁置无用，曹典球请湖南提学使商之巡抚拨与学堂为实习工场，而藩司赵滨彦从中作梗，不许拨用，旋经北京湖南京官黄瑞麒，奏明清帝照准，湖南政府乃许借用一小部分，学堂乃招金工科学生一班，在铜元局教学，并设置模型房，翻砂厂，化铁炉，锻工房，钳工房等等，为金工科学生及新设机械科学生实习之场所。

湖南境内，是时尚无用机械开采之矿山，除由江顺德带领学生赴萍乡煤矿实习外，水口山铅矿刚设备机械吊车，亦由贺菲理，蒋昌儒等带领学生前往实习，其余土法开采之矿，如黄金洞、锡矿山等，均由各教员分班带往实习。

湖南筑路工程，是时尚未开始，因教员宾步程兼任长株铁道工程师，路科学生则由宾步程协同龙铁英等带往实习。

丁班路科学生，原拟习法文，曹典球因为习法文之土木科教员，难于聘到，遂将其改授英文，教学讲义，均由日本留学生，用中文编辑，以资应用。

实业学堂，有同盟会之秘密组织，如教务主任黎尚雯，教员仇毅，何炳麟，余焕东（？），刘邵生等皆是。

实业学堂之档案，今已荡然无存，兹凭我记忆所及者，现在生存的教员学生可资证明者，略述于此，希补正勘误。

《清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二，学校十九，考八七〇八》

“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煊奏高等实业学堂预科改办高，中两等路矿本科。”

又学部咨复湖南巡抚岑春煊，并札行湖南提学使吴庆坻，核准高等实业学堂开办中、高两等路矿本科，并限制预科学生不得改入他项学堂。略称：“查湘省矿产殷富，路工待兴，自应及时养成矿路人才，以备应用。奏定学堂章程，高等中等实业学堂，皆设有矿业一科；铁路学科性质与土木科相近，定章学务纲要载明：铁路矿务亦实业之一端，自应并准设立路科，专教建筑，亦属当务之急。甲、丙两班学生所习矿科用英文教授，与定章高等工业学堂应授英文办法相符。至路科因乙、丁两班学生素习法文，遂用法文教授，近于迁就。将来进行分科大学不免窒碍，惟既改经肄习在前，课程表并经声明兼习英文，应准变通办理。嗣后续招中等学生均应肄习英文，续办高等路科亦应改用英文教授，以归一律。其乙、丙、丁、戊各班学生既经分习路矿两科功课，将来毕业应照中等实业学堂奖励章程给奖，惟从前所习普通各科，毕业时仍当一律考试，续招乙班中等预科学生应将名册报部。表载各科课程及拟用书籍，均实妥排。中等矿科坑内实习矿山测量演习，据表称于暑假期内行之，尚属可行。丙班矿科于毕业后行之，虽与定章未符，该班学生毕业在即，自不得不变通办理。册开明量教员多系曾入科堂及游学毕业之员，亦属得人。该堂此次所筹办法，极有条理，文册亦甚详明，课程及拟用书籍，审配详填，足见实心整顿，用人得力，办理实业不可滥，亦不可惜费，用款既鉅，设备必甚完全，果能认真经理，宜有成效可期。至该堂甲班学生前据咨明一律就升学奖励应入高等本科，不得改入别项学堂，丙丁戊己各班生亦应备案学级递升，不得改入他项学堂，以资深造。”

梁奂奎著《青郊六十自定稿·实业学校赠监督曹籽谷诗》叙曰：光绪癸卯岁，余创建实业学校，初就贡院为之，旋复

再綻，未及一期，余嬰病去湘，逮今曹君构造宏善，效实渐举，属饮新堂，缅然有作。

诗云：“不泽膏血输，道路筋脉属。二要苟不存，九域缘兹盛。近者国枿替，厚实委他族。有识推患端，所惧才不足。救之靡有他，兴言及教育。昔我覩国旋，谬论偶见录。权舆进髦士，纲举未及目。节听喜周垣，移讲安巷曲。不谓灾眚缠，此志伤局促。群贤沐同趣，渗澹事赓续。披采淹历今，往往见珠玉。曹侯真健者，担荷解拘束。羣币集名师，诛茅筑精屋。旧苗尽吐花，新筠已成竹。今日展佳燕，衔觴胜游瞩。良材周世用，岁月待乔木。肆意欣则同，敛怀歉所独。

《答曹籽谷春寒见寄》诗曰：“老趣留湘绮，诗豪醉座添。（前日集饮山庄，湘绮翁在座，君最后列）浮云生石罅，凉雨落城尖。未忍青春负，聊为竟日淹。楼台看变化，金石见精严。（时学校议以铜元旧厂为化炼实习工场，与藩司方有争论）”。

严复《复曹典球托聘法文、算学教习缄》“猛有道……前承垂委延聘法文算学教习一节，去后即行细心延访，近已得之。其人名陈长龄字永年，闽县人，陈伯潜学士之宗也。在马江制造学堂肄业，中经挑选出洋游学法国三年，得制造师头等凭照，与敝友高子益（而谦）太守为同学，据云学诣塌实可靠，且法文算术（系高等者）而外，尚通物理化学机器制作诸科，作二百元月薪以待此才似为太少，固其人刻在粤东本有馆席，但与办事者颇不得调，思离其处，贵堂果欲得之，易二百元为二百两足矣。良师难得，执事不当惜此区区也。如合意望即电复诸字，敝处地址为新拉报桥严儿道也……。”学堂得严缄后，即已承诺以月薪二百两延聘，并将川资关约寄严君转交。不意陈长龄竟为粤东馆主挽留，不允应聘，严君即将川资关约，仍寄回。以此实业学堂，遂将法文班改授英文，亦可见当日延师之不惜重聘，而师资之难得，有如此者。

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沿革

左宗濂*

清末，始以立宪号召，缘和革命怒潮，于是变更学制，振兴实业，发展农商，分途并举。湖南承戊戌变法之后，开风气之先，成立学校，选育师资，开办工商企业，奖励生产，风起云涌。当时学校林立，士气激昂，为各省之冠。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武冈刘希刚归自日本东京商业学校，当局委其办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招收各县生员肄业，授以简单之商业学科，作为未来办理商业学校之师资。名额计八十名，由各县遴选保送，公家借付资本。各县所选保多为老年学究，从事于八股讲章之流，骤然肄习经济簿记一类学科，不仅闻所未闻，且有不屑之意，与教师尤多格格不入，名为讲习，实则滥竽，成绩甚渺。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草草毕业，并未继续招生，刘希刚亦另作他就。旋又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派陈光晋为校长（陈字儒字，长沙人，日本山口商业学校毕业。）招收学生一百二十名，成立两班，校址在三公祠。开办之初，师资缺乏，课本阙如，经费又不充裕，困难重重，陈氏几于束手无策。政府又以名义之未当也，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秦汉寿许庸继任校长。至一九一四年始定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

* 左宗濂早期毕业于商业专门学校，建国前系长沙县署高参，建国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已故。

校，派陈光烈为校长，校址迁至荷花池。除原有专科之两班外，复招收甲乙两班。教师多留日学生，功课整齐，秩序严肃。外文有英日两种，对学生要求殊严，故进步极速。汤芑铭奉袁世凯命来湘查办二次革命事件，旋即以靖武将军主持湘政，刘心源任巡按使，屠杀党人，屡兴大狱。湖南学生酝酿反袁，鼓动学潮，此落彼起。陈光烈以办学不善被撤，汤芑铭委省工业学校校长施文尧兼摄商校。施文尧者，固汤氏之爪牙，为虎作伥，教育界之败类也。商业学校经其摧残，仅存一息。一九一五年秋委宁乡王凤昌为校长。以前专科之两班学生，未届毕业，课程不齐，由省署咨送山东，合并于山东高等商业学校。后再招丙丁两班，一百二十名，全校共有甲乙丙丁四班，皆中等程度，依次肄业，皆四年制，终逐渐划一矣。一九一六年王凤昌辞职，继其任者为罗上宽（湘乡人，字伯苍，留日商科学生）。罗兼有湖南银行协理任务，两方往返，难以照顾。仅一期即改委汤松为校长（字寿军长沙人，美国密西比大学经济学博士）。汤到任后，首先呈请改名为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以原有之甲种学生，作附属甲种商业讲习科（原来之甲乙两班均已毕业，仅有丙丁戊三班），此湖南商业学校，成为高等学校之始。当时湖南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与商业专门学校，嗣后成立湖南大学，而以此三校为基础。人材辈出，汤校长之力也。一九一六年秋，招收专门部学生一百名，仍以荷花池为校址。教学程序及功课教材多效欧美，教师亦多自北京上海等处聘来。如经济财政保险银行货币等等科学，皆用原文书籍教授，学生须有外文之基础，故用功很深。知名教师，则有杨怀中、马寅初、王长平、吴晓芝、李肖聃、李六如、李青崖、陈铭恩、曹籽谷、蒋友文、陈友左、张麓村、何仲韩、孙子宪诸先生，硕彦鸿儒，极一时之选。附有荷花池商业银行，作为学生实习保险之用。采购财经商业一类书籍、报刊约数千册，充实图书室，以备浏

览。成立学生自治会、体育会、外语演讲会、国术研究会、国文会考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贫寒学生奖学金等等制度，办事民主。成立各种会议，学生可以参加，并能推举代表，审核学校经费，直至对学生一赏一罚，亦用公开会议裁断决定之。尤注意学生课外活动，游行演讲，悉听自由，师生融洽，最为活跃。而毕业学生亦概由学校介绍保送，各得就业。如哈尔滨贸易公司、上海国际贸易公司、汉口出产公司，江汉关、江海关、九江关、华实纺纱厂、大中华恒丰纱厂，多用聘之。一九一七年扩大校址迁移落心田原工业专校，即前请求实书院故址。后招收甲种部两班，全校计约五百余人，踴踴踴踴，极一时之盛。一九一八年北洋军阀，以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南北发生内战，教育经费每每积欠累月，而摧残民气，惨杀无辜，苛捐杂税，任意掊刻，湖南人士及学生界不甘压迫，奋起图存，始有学生联合会之组织。汤松校长尤极端赞同，阴为助力，开反对北洋军阀驱逐张敬尧之先声。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会长为彭璜，秘书长为易礼容，皆商专学生。每有运动，倡率游行，商专学生必在前列，精神激愤，见者感动。汤校长亦呼召奔走，不遗余力。遂为张敬尧所忌，欲置之死地而甘心，友人之关心者，咸劝汤远避，汤乃走上海、北京。集结湘人，组织湖南旅沪驱张救湘委员会（后改名湖南善后协会），创办《天问》刊物，揭发张敬尧祸湘罪行，呼吁全国，大力支援。北洋政府段祺瑞，方倚张为爪牙，欲借武力征服西南各省，扑灭革命火焰，对湘人呼吁，充耳无闻。汤知湖南之祸方兴未艾，而国事不可为也，愤而弃职。又以专门部之两班学生，末届毕业，弃之于湘，将不能毕其造就，乃商于上海复旦大学李登辉，将商专节约经费两万元移交复旦，委托代办（此两班学生在此毕业。）但复旦需六万元终允接收，汤先生四处筹措无此巨金，又商之于汉口明德大学胡子靖，终达成协议。汤本人遂赴欧洲

研究合作，此一九一九年间事也。商专因汤去后，一部份学生赴明大，一部份留湖南，一部份从事地下政治活动，参加长沙文化书社等组织。如李庠（曾被残杀）、金人骥、苏瑞璋、易礼容、刘大兴等。张敬尧使悉商专在汤松领导之下，反抗政府，日趋激烈，乃将汤撤职（其实汤已早去）。以孙孔厚（号子宪，常德人日本留学生），惟以湖南学生在大罢课下，商专学生星散四方，名义虽存，而弦诵实绝矣。一九二〇年革命军由粤北上，张敬尧溃败出湘。孙孔厚去职，教育厅委蒋国辅（字友文，零陵人，曾留学英国）继任。学生除留明德大学者外，陆续归来。学校虽渐复旧观，而元气已伤，教学精神已大逊于汤松校长时。蒋国辅聘宁乡喻杞生为教务主任。当时谭赵内哄，互相丑诋，而以制立省宪联省自治，作标榜。蒋、喻皆省议员，几以全力从事党争，所谓教育云者，不过其门面语而已。一九二二年蒋国辅以财政不甚公开，对学生施以专制，激起罢课风潮，迁延累月，遂被迫辞职。省府派任凯南先生继任。任为湘阴人，字悬忱，留英学生，他锐意改革，注意素质，所聘教师如皮宗石、杨端六、李剑农、黄剑平、张译、杨作新、董维键、向少轩、刘彦、肖亮如、鲁禹昌诸先生多学术精湛，斐声南北之有名学者，故商专在当时又渐复兴矣。一九二四年任因多病几殆，坚持辞职。继之者为黄土衡（字剑平，郴州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至一九二六年成立湖南太学。以三专门学校合并，于是湖南商专始告结束。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简述

甘 融*

开 办 沿 革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原称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系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湖南巡抚俞廉三遵照奏定学堂章程筹设的。校址是旧贡院改建的。（在今中山东路百货大楼省教育厅、省文化厅一带）。辛亥革命后，由旧岳麓书院改建的湖南省高等学堂，依照新学制停办，将优级师范改名高等师范，迁入旧岳麓书院。到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秋，北京教育部采用分区设立高等师范办法，湖南划在武昌范围之内，随将本省高师办完。那时高师的第二期本科和文史专修科，均于一九一七年暑假毕业，就遵照部令停办，不再招生。计自一九〇八年开始招收选科第一期起，到一九一七年暑假结束时止，共历十年之久，毕业学生约九百余人。学校的领导人，在前清时名叫监督，初任监督的是刘铸，辛亥革命后，改称校长，任过校长的有凤高翔、符定一、吴嘉瑞、刘宗向四人。高师停办后，省长公署划出东边一小部份房屋保存校具，为筹办大学之用，大部份均拨交工业专门学校，原设在市东区落星田的工专遂移设岳麓，后来大学筹备处撤销，校舍全部拨给工专使用。到一九二六年，省长公署将工专与原设市内的商业专校、法政专校、农业学校合并，改为湖南大学，从此岳麓书院校址，就确定为湖南大学的校址了。

* 甘融曾任含光女校校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学 制 和 班 次

高等师范这个学校的性质约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目的是培养中等学校的各科教员。依照前清的学堂章程，分本科、专修科两部。本科四年毕业，第一年习公共必修科（一称预科），第二年起，再按各人的兴趣和专长分科学习（如现在的科系）。专修科两年或一年毕业。原则上都要招收中学毕业生（旧制中学五年毕业），但在清末开办时，各府厅州县所设立的中学，都办得不久，没有中学毕业生可招。那时就呈经提学使司核准，先招选科，适应当时的迫切需要。定两年毕业，考选科举时代年轻的廪增附生和中学肄业的高材生。第一第二两期的优级选科，都办了数理、博物、史地三科，毕业学生共三百余人。到了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才正式招收本科生。本科也办了两期，每期都招了英语、数理、博物三科，毕业生二百余人。专修科办了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三年招有图画、手工科和音乐体操科，一年毕业；第二次是一九一五年招有国文科二班，历史科一班，两年毕业，合计专修科毕业的近三百人。为便于学生实习，附设有中学和小学，也毕业了一些班次。高师前后毕业学生大部份散布到本省各县市中等学校担任教课，或做教育行政、学校行政等工作，而以服务在长沙市的为最多。其中杰出的：如孔昭绶，除教课办学外，还兼任《长沙日报》主笔兼编辑，署名攘夷，后来当过省议会副议长。黎锦熙，民国初年，任宏文图书社编辑，后来专研语法，成为国内著名的汉语语法学者，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季范，任长郡中学校长多年，办学认真，卓有成绩，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参加革命的，有方维夏（竹雅），张维一，周勺泉等，均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现都已先后逝世。舒新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多年，对教育学理论有相当造诣，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已逝世。朱芳

國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字篇，殷史篇等，历任清华、河南各大学教授。彭翼研究文字音韵学，著有古声韵谱，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宋焕达历任省城各中等学校教授英语，后改研中医，在中医进修学校任课，参加中医药研究所工作，著述颇多，已逝世。参加革命的，还有主编《向导周刊》的蔡和森（在校名蔡林彬），致力工人运动。有编写中国职工运动史的邓中夏（在校名邓康），均为中共中央初期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李资特（字笃生，中共党员），大革命时任新化县农协委员长，潘昌江（字价棠，中共党员），大革命时任浏阳县农协委员长。他们或遭反动政府的囚禁屠杀，或因致力革命，积劳牺牲。

行政组织经费和学风

在清末优师时期，监督之下，分设有教务、斋务、庶务三处，主管的人都称为提调。教务提调之下，设有教务员、文牍员、图书管理员、仪器管理员等；斋务提调之下，设有学监、舍监等；庶务提调之下，设有庶务员、会计员、校医员等。民国成立，校名改称高师后，各提调分别改称教务长、斋务长、庶务长，后来又一律改称主任。学校经费，全部由省库发给。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高师改制以后，经费由教育部发给，预算都还宽裕。学生入学时，只缴保证金十元，毕业时退还。除由公家供给每餐三餐三素的伙食和书籍课本外，每年还发给单夹制服各一套和制帽皮鞋等。在前清时，因人数较少，蚊帐被絮均由校备。学生的享受，较其他学校为优，故规定毕业后，应在本省教育界服务至少三年以上，否则须追赔学膳费。学生如不遵守规则，闹风潮，致被开缺的，保证人应负追赔的连带责任。教育事业本是为政治服务的，当时的封建统制阶级，为了培训负实际

教育责任的师范生，对他们的思想意识教育和言行的管训采取严格的态度。除经学修身为必修科外，还掲举尊君尊孔两大宗旨。每逢初一、十五，监督率领教职员学生向皇帝万岁万万岁和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面前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还对学生将封建道德演述一遍。可还在政治腐败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一部份学生被革命思想所吸引，对维护封建僵尸的繁文缛节，大都嗤之以鼻。有一次在行礼中，竟有多人发出一片嘻笑声，学校当局认为大不敬，挂牌开除情节严重的八人，有一部分受记过处分。但革命的火焰是压制不了的，辛亥湖南光复时，仍有少数同学参加了革命工作，离校另图活动。一九一五年，前清翰林做过贵州兵备道的吴嘉瑞，与巡按使刘心源有同年之雅，刘聘他来当商师校长，受有整顿学风的使命。正值袁世凯准备帝制自为的时候，将军汤寿铭秉承意旨，大肆屠杀党人，对学校防范尤严。吴校长到校，即聘尊崇程、朱，善为桐城文的刘宗向当教务长，拿朱熹的白麓洞学规来训勉学生。以各中学国文历史两科师资缺乏，呈奉巡按使署核准，开办文史专修科，招收有国学根底的，除一部分是中学毕业和肄业生外，大部分是年长的私塾师生，中有十余名是前清的廪附生员。主要课程是经学史学文学小学。教此等课程都是有实学的前清举人进士，如刘人熙、吴骥、寅芥沧、袁淑瑜、成赞钧、孙文冕、孙文昱等，教其他英语数理博物等科的教员则大都为西洋留学生，也有少数外国教授。在各科教员中也有极少数思想进步的，如教哲学和西洋伦理学史的杨怀中老师，号召学生读书做人，打破升官发财的观念，介绍欧美民主自由及初期社会主义思想。那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他们创刊《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些打倒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的文章，解除青年思想上的束缚，指示了人生的正鹄。当时长沙还没有订阅《新青年》，《新青年》社就送给杨怀中先生一份，进步学生

纷纷向怀中先生借阅，也有个别直接汇款向北京订阅的。学校当局看见这份杂志，认为是异端邪说，公开批评，但无法阻止学生们的爱好追求。还有徐特立先生，教授教学法，他认真钻研，教学生动，生活朴素，待人诚恳，博得同学们的敬仰，高师同学如蔡和森和邓中夏、李资特等，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坚定不渝，这是与杨、徐两师的思想浸润和人格感召分不开的。

高师结束后的大学筹备

一九一七年秋季高师结束时，湖南教育界杨怀中，易寅村发起利用高师的仪器图书教具等设备，筹办湖南大学。由湖南省长程潜公署聘定易培基、刘宗向、胡子靖、朱剑凡、熊崇煦（时为教育科长）等为筹备委员，在犁头街八号建立大学筹备处，并由省长公署派我为湖南高等师范校具保管员，划定岳麓山高师校址及附近文庙一带，如半学斋，藏经阁等处房屋为高师校具保管处。我干了五个月，因事辞职，由高师同学刘之定继任。不久发生南北战争，北洋军阀傅良佐督湘，我即赴闽参加护法运动。一九一九年，易培基曾介绍毛泽东和蒋竹如、张国基、张祖义等，在保管处所管的半学斋，住过二三个月，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大学筹备处撤销，保留在高师的部份房屋和校具，统统移交给工专了。

高师孕育下的三个私立中学

五四运动以后，湖南的知识分子，多有救国之图存的自觉性。进步的一派，开始研究马列主义，认为组织革命武装，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才是出路。另一派改良主义者，则认为必须开通民智，主张教育救国。于是办私立学校的风起云涌，大都是备校的教职员，利用同学或同乡关系联合组织起来的。如高等学堂同学，组织有大麓中学；雅礼同学，即组织

有广雅、协均中学。以教育为职业的高师同学，自然不能例外。优师同学创办了育群中学，设在长沙市北门外平浪宫，抗战时期迁往宁远，胜利后仍回长沙原址，现为长沙市第八中学。高师同学办有衡湘中学和含光女子中学。衡湘中学设在长沙市韭菜园，抗战时期迁往姜畲、衡山等处，胜利后迁回原址，现改为长沙市第十二中学。含先女中设在长沙市宝南街，抗战时期迁往湘乡，胜利后回长沙，分设北门外丝茅冲与河西谷山冲两部，解放后合并，迁至稻谷仓，今改为长沙市第十三中学。这些私立中学对于提高国民文化，均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湖南优级师范概述

屈子健*

一、开办缘起年代

湖南优级师范是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办的。校舍系贡院（乡试举考场址）改建，规模甚大。包括现在的长沙中山路百货大楼、新华电影院、一师附小和教育厅全部地面。进前门为大厅，进二门为魁星阁和藏书楼，然后便是万岁亭，内设皇帝万岁牌位，再往里走为孔子庙，及普通大教室，可坐八百人。左廊有教室六间，自修室十二大间，管理室一大间，食堂一大间。自修室隔墙有寝室数十间，寝室外有大操场和花园。右廊为科学实验室若干间，教务长办公室、监督办公室、庶务长办公室，教员住室若干间，接连横贯，颇为宏伟。全校房舍均系新建。院落种有花木，古树颇多，环境优美，实为全省第一个新建规模较大的校舍。自修室每班四大间，学员每人有两抽屉书桌一张，靠椅一把，书柜一个。寝室每间有红漆木架床十个，每张身有新夏布蚊帐一床。理化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的仪器、标本、药品，均相当充足，其他设备亦属完善。

学制完全模仿日本，分为五级：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三年，大学四年。封建皇朝为了造就奴才，科举虽废，但仍沿用科名奖励，高等小学毕业生奖给

* 屈子健当时系湖南优级师范学生，建国后任湖南省政协常委，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已故。

秀才，中学毕业奖给贡生（拔贡、优贡、岁贡），高等学堂毕业生奖给举人，大学毕业生奖给进士；经过朝考，钦点翰林。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并列，毕业生奖给举人，尽满义务教育四年，可分任官职。

湖南优级师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在长沙举行了招生考试，主其事者为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因为这是全省各府、州、县，均先后开办中学，缺少师资，决定先办理化、博物、数学、史地选科四班，规定两年毕业。由提学使通令各府、州、县，保送成绩优良的中学毕业生来省应考。如无中学毕业生，可选送中学肄业生。但史地科先办预科一年，指令保送科考秀才，年不超过二十五岁者为限。我先祖和父亲都没有读书识字，穷困早亡。我由叔父（小商人）抚养，在私塾读过几年四书、五经，十六岁考入衡阳县高等小学第一班，完全公费（膳食书籍笔墨衣服鞋子均由校供给）。毕业后升入中学，还不满一年，即被保送到省应优师招生考试。全省应试生约为数千人。考试两天，第一天考经义、史论。经义题：“诗云：迨天之未阴雨，撤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曷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者，谁敢侮之。”史论题：“邓艾自阴平趋蜀，汉尼拔自阿尔卑斯山趋罗马论。”考生进场，吴提学使亲自坐堂点名，极为严肃。第二天考科学，考生报名时，自由选报理化、博物、数学、史地任何一科。我报理化科，有物理、化学、算术、代数若干试题。几天后放榜，加倍录取。复试又是两天。第一天经义题“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论题“文帝好清静，故不用贾谊；武帝好纷更，故不用汲黯论”。第二天复试科学，仍分四科命题，最后在优级师范照墙上，鸣炮贴出黄榜，理化、博物、数学、史地四科，各取中六十名。这几场的经义史论题目，系优师同学张照秋老先生回忆出的。观之，可见当时封建思想意识之浓厚。

二、行政组织与教学生活

· 优师行政组织，设监督一人，提学使司奏派刘鉅充任。刘为科考中式举人，做过京官，生活俭朴，规行矩步，系忠厚长者。吴庆坻提学使很尊重他，到校演说，常称监督刘先生。监督下设教务处长、斋务长、庶务长各一人，均由提学使司聘任。教务长专管教学上一切事宜；庶务长专管经费和供给一切事务；斋务长主持管理室一切事项。另设监学三人，专管早、晚点名，稽查教室上课人数和学员请假事宜。教务长彭施淦，在校一年，改为余焕东充任，斋务长王焘，庶务长黄俊，均任职到辛亥反正为止。

一九〇八年九月开学。理化、博物、数学选科各一班，史地预科各一班，共计学员二百四十人。一九一〇年，由中路师范转来博物、数学各科学员各一班，称为新博物科，新数学科，合计有学员六班，三百五、六十人。名为选科，所有各种课程都系固定，考入任何一科，都无自由选读的规定。实际上系理化、博物、数学、史地四种专修科。毕业年限虽定两年，初开办的理化、博物、数学三科，从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毕业，实际花了两年半，才把应修的课程学完。

除专修学科外，每周有伦理一小时，国文二小时，英语五小时，日语二小时，教育学、伦理、心理三小时，体操二小时。专修科目每周有二十几小时，每天的教学时间达七小时，学习颇紧张，学员们大都能循规蹈矩读死书、死读书，争取博得科名，加入统治阶级行列，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吴提学使到校训词，常说：“优师名高，师范贵重。”优师的学风是很纯良的。

数学教员许奎坦、地理教员王达、历史教员颜息藩，均系当时第一流名教授。理化教员原田长松，博物教员能势赖俊，

教育、伦理、心理教员白田寿惠吉等三人，均系从日本聘来，另有翻译三人。伦理教员成克襄，国文教员谢功肃，均宿儒，徒备一格，不为学员们所注重。体操每周二小时，仅教兵式体操而已。几何画教师何炳麟和教务长余焕东。

教员到校讲课，出入都坐三丁拐响轿。校内轿工很多，校工更多，自修室、寝室每班有校工二人，各种劳动都由他们分任其责。校工称学员为老爷。

学员待遇很高，每人发给兰布长衫一件，单棉操衣服各一套；所有书籍、课本、笔墨及绘图仪器，都由校供给；食堂吃饭，八人一桌，两荤四素。学校备有清朝礼服：红缨金顶帽子、马蹄长袍数百件，每逢庆典节日及每月初一日，学员各领帽子一顶，长袍一件，穿戴起来，鱼贯而入万岁亭、孔子庙，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仍缴还保管人收藏起来，下次再用。我忆得在优师学习三年，什么都好，独对这个三跪九叩首厌烦之至。曾记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死去，刘钺率全校教员学员哭灵三天，我跪得脚都麻了，心中很不高兴。但在封建专制之下，谁敢反对跪拜，谁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只好忍受。三个日本教员，穿着西装，也跟着跪拜几天，神态很不自然，倒是可笑！

三、毕业时期的幻梦

优师学员中，科考秀才颇多，也有到过日本留学一年或几个月的。入学年龄虽规定为二十五岁以下，实际三十几岁的亦多。大都饱受封建教育，擅长诗古文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莫不希图取举人头衔，混进仕途，炫耀乡里。因此，学员们都能循规蹈矩，勤奋学习，不过问政治。当时统治阶级称誉优师学风醇良，即此之故。

一九一〇年底，理化、博物、数学三科课程学完，举行几

天毕业考试。结业后，回籍等候通知。学部规定优级选科毕业成绩列最优等者，还须进京复试。复试及格，奖给举人，以部司任用。毕业成绩列在中等和优等者，须在地方服满义务教育四年，由提学使申报学部奖给举人，加中书衔。这时优师毕业生大多有一种幻梦，不要多久，就有官做了。我回乡等候至一九一一年春季，校工走马送到红纸印成的大捷报一张，上书：贵府某老爷考中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理化科以最优等毕业，奉湖南提学使吴详报学部奖给举人等语。我家除招待外，另赠该报喜工人光洋四元。我当即专程到省领到学部颁发的毕业文凭和提学使司扎飭各府、州、县派任教员的公文。我在衡阳与一部分同学，手持红贴到县、府、道衙门谒见那些官吏。门房索取红包，才允通报。见了面行跪拜礼，分在花厅坐下，照例寒暄几句，端茶送客，我们即兴辞而出。

旧时官场俗套，全是虚伪。当时在衡阳地方已经创办的中等学校，有道台管辖的南路师范学堂和南路实业学堂，知府管辖的衡州府中学堂，知县管辖的衡清中学堂。优师毕业生是指定充当中学教员的，但不尽如此。因为旧社会的门第观念是很严的。一些家世煊赫，原有科考功名的同学，一出校门，就充当了劝学所长或中学教员；若系贫寒出身，就不易找到工作。一九一一年，南路实业学堂正缺少理化教员，我经人介绍应聘，该校监督杨伯寿（曾做过知府）说我家世寒微，不够资格，竟不聘任。衡山、耒阳几个同学旅居衡阳，囊敝金尽，也无办法。大家在毕业时的幻梦破灭了。直到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我才应聘到衡州中学当教员。

四、优师在旧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辛亥反正之初，优师理化科一班，博物科二班，数学科二班，史地科一班，共计三百五、六十人，都已先后毕

业。新政府设立教育司，首任司长唐联璧，系日本留学生，对湖南教育多少有些改革。凡从北京优师毕业回来的人和湖南优师毕业的人，都是教育界的新兴力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教育司和各府、州、县当了教育行政人员，中等学校校长和教员（北京优师段廷珪，由教育司派任省立三师校长，湖南优师孔昭绶派任省立一师校长）。一九一二年，湖南优级师范改为湖南高等师范，校址迁往岳麓书院。多数中等学校的国文、理化、博物、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都由优师毕业的同学所担任，在教育界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优师毕业同学，出身贫素居多，富有者极少。可是自一九一二年起，他们多数在地方掌握了教育政权，有些当了劝学所长、教育科长、公立学校校长，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起了分化和变迁。革命进步的占极少数，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中间派占大多数，至于走顽固反动派的道路，始终做人民的敌人，也居少数。在清末参加革命同盟会者有谢晋、谢逸如、贺寅午等三人；到广州参加大革命者有谢晋、方维夏、蒋式嘉、刘健（劲先）屈子健等五人；大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者有谢晋、方维夏、蒋式嘉、张维一、刘健、谭俊、屈子健等七人，但刘健、谭俊、屈子健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脱离了关系。

优师同学，除大多数在本省各学校任教外，还有在国内大学担任教授的。如：梁锦熙在北京师大担任教授数十年。

“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湖南任教。罗容曾在湖南担任教授多年，解放后调至中南财政学院任教授。解放后人民政府工作者有张维一（国务院副秘书长，一九五五年病逝首都）、王季范（国务院参事）、刘健（衡阳市副市长）、许君臈、屈子健（均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煦秋（市一中高中教员）等六人。

优师在反动政府充任要职者有：陈容是反动“左社”的骨干，一贯反共反人民；赵恒惕是省宪议会议员，一九二八年，任省政府秘书长和薛岳的顾问。颜方珪也是省宪议会议员，一九二四年，是湖南教育司长，北伐胜利被赶走。王祺在优师毕业后，从没当过教员，一贯从事政客投机生涯。大革命失败后，钻充湖北农工厅长，旋即加入CC派，当国民党中委和监察院监察委员，两次到湖南主持省党部，扩张CC势力，煽起湖南甲乙派的斗争。此三人在抗战爆发不久，先后死去，在优师同学中起作用不大。此外如罗正纬、袁家元都当了国会议员，李佐周、赵果、谭奎炯、梁庆云、李国栋、罗骊等都当省议会议员，周瀛轩、陈祺、余寿湘、周先汉、朱德龙、黄钺、刘明斗等都当知事，其他钻充厘金局长，盐务局长亦有。至于历任教育司（厅）的科长、科员、督学者更多。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十五年内，教育厅长专管各公私学校经费的主要干部，都是优师同学担任。其中以罗传矩任职较久，省督学以梁铸球、姚孟宗的权威较高。他们左右厅内行政，各校造预算、领经费，无不仰其鼻息。

湖南教育界的派系，除优师外，还有北大派、师大派、高师派、武高派等等，但优师人数较多。各派系都想争夺省立学校校长，谁夺得了，便“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称职的教员都是没有保障的。“五四”前后，衡阳三师和常德二师是优师的地盘，省立三中是武高的地盘，省立一师和一中，是北大、高师的地盘。北伐胜利，革命势力高涨，地盘思想也被打破了。何键主湘，甲乙两派斗争激烈，优师操纵教育司的权力，也就消失了。

欧鸣高是优师一个突出的顽固人物，曾在教育司任科员几年。一九二四年调衡阳任省立三女师校长二年，他和王祺、梁铸球、罗传矩等都是马变后教育界反共的闯将，他们号召组织

湖南优师同学会，创办育群中学，强迫优师在各校任教的同
学，每人捐光洋五十元（教育厅发放经费时扣去）筹得万多
元，在长沙三角塘建筑新校舍，欧兼任校长。罗传矩兼任国民
党长沙市党部常务委员。他们配合反动政府，干反共反人民的
勾当。不久，王祺、罗传矩死去。抗战时期，欧鸣高将育群中
学迁至他的原籍宁远县城。利用学校名义，大做其投机倒把生
意。抗战八年，他大发国难财，买了五千亩田地，起了高楼大
厦，在宁远县当土皇帝。他克扣育群中学教员薪金，师生待遇
很差。曾在该校任教的优师同学黄衷，痛恨欧鸣高达到极点。
抗战胜利后，欧鸣高独占育群中学，不肯迁回长沙。经过优师
王季范、张煦秋等力争，始于一九四六年迁回，改为王季范任
校长。育群中学，解放后改为长沙市立八中。

总而言之，优师毕业学员三百数十人，经历了封建皇朝、
北洋军阀、蒋介石政府统治四五十年，在旧社会或多或少起了一些影响和作用。抗战胜利之时，他们老的老，死的死，尚存人间的也就不多了。

我很高兴地写这一篇回忆录——湖南优级师范概述，其中
或有不实不尽之处，希望老前辈补充指正是幸！

（欧阳义 整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

我所知道的克强学院

曾伯贤*

并校成院

一九四五年初，湖南省立农业、工业、商业三个专门学校的师生，为适应当时的需要，要求将三校改为独立学院。酝酿了一段时期之后，三专师生又联合请愿，经过当时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的头头几次磋商，又向教育部请示，同意把三个专业学校合并成立一个独立学院。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特把该院定名为“克强”。开始省厅请求教育部批准为国立，教育部不同意，后来才定为“湖南省立克强学院”。

并校成院的问题解决后，谁来当院长的问题，是有过争论和竞争的。原三专中有的想招出一人来克强任院长，CC系张炯，想排除地方势力，从CC系中物色；省府主席王东原和议长赵恒惕，坚持要从曾宝荪、曾约农两人中选择一个，而王东原尤属意曾约农。以“打仗”起家的王东原，最崇拜“曾文正公”，他附庸风雅，喜攀门阀，曾几次去巴结曾家，拜访过曾宝荪和曾约农。赵恒惕是曾宝荪的异母舅父，是曾约农的姻叔，他们之间感情颇厚。曾约农本有领袖欲，平时好活动，曾为蒋介石器重，并拉去庐山暑期军训团任过职。王东原、赵恒惕都称赞过曾约农有办事能力，学术资望，足以相附。结果，曾约农便出任克强学院第一任院长。

曾约农，湘乡（今双峰）县人，是曾国藩的曾孙，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学士，英国皇家学院采矿工程系毕业，历任中央政

*曾伯贤当时学系克强院学生，现在双峰县神冲中学任教。

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教授。他是个颇擅辞令、比较清廉，但封建官僚作风严重的人。当三专师生请来改院的时候，曾约农正在他的故乡，一个交通梗阻的山坳里清闲自在，忙于他的家谱的修纂和组织县乡积谷的清理。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曾约农接到省政府教育厅的电报，继又接到王东原的手信，要他去组织三专并院的筹备工作。曾约农因此把修谱事务托其堂弟曾昭权（原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改造时，在湖大跳楼自杀了）和曾伯贤，把积谷清追工作委托宁乡人陶某坐办。曾约农于五月底乘轿去湘潭，转乘轮船到了长沙。他去长沙经过一番接触和研究之后，假一家旅社开了一个筹备大会，在会上决定招收先修班，并决定将省拨定的衡阳江东岸盟军美国空军站的房子加以扩建，作为克强学院本院，同时租赁长沙市稻谷仓王先谦故居为克强学院分院。原农、商两校的学生在衡阳，工专学生在长沙分别上课。

二、教育行政组织和人事简况

院长：曾约农（许调履、陈时锦、康训矩代理）。

秘书：曾广载、陶伯闳（宁乡陶澍的后裔）。

人事主任：任承华（女，曾约农的学生）。

教务处教务长：陈时锦、康训矩。

教务组主任：周国梁（湘乡人）。

注册组主任：李进坤（安化人）。

总务处总务长：赵启源（教授）、刘建安（CC系，当过县长，湘潭人）。

庶务组主任：周禹臬、传中柱。

文书组主任：曾广载、陶伯闳、（均兼）。

出纳室主任：谢竺山（武冈书画家龚度的外甥）

训导处训导长：×××。训导员：李伟儒。

农场场长：刘达（教授兼）。

南岳分场技师：康维健。

图书馆主任：毛世锟（讲师）。

会计室主任：陶懋梁 王××。

教授：许调履、周声汉、刘达、陈时镍、孙子宽、荆顾新、曾子泉、肖杰五、姜运开、游廷鼎（犹太人）、李嘉猷、谭咏秋、孙世灏、庾训燊……

三、曾约农在克强

曾约农虽然当了三年院长，但是他一直住在长沙艺芳女校。院长一职，先后委托许调履、陈时镍、庾训燊代理，许、陈、庾都是保守派，无所作为。曾约农每年到克强本院不过一、二次。他每来之先，要拍电报，让院内、特别是总务处的人员煞有介事的忙子迎接院座大驾。曾约农一到院，就钻入三楼的特别房间，他只愿接见上层人员和教授，不愿接见一般职员和学生。他有时甚至贴出条谕：“凡学生有事须先通过系主任代为报告，不得迳自找来……”。他每次到院要召集学生训一次话。曾约农是亲美派。他起初几次对学生训话，总要大谈美援大有希望。他说，将来的克强，可得美援扩而大之，前途无量。后来，学生们听腻了，又因美援希望等于零，并在曾约农一次来院时，贴出了辛辣有味的“欢迎”标语：“欢迎曾院长这次又给我们带来了望远镜——望美援！”

曾约农虽未负院长实责，但是他在院内满布亲信。总务长赵启源，秘书曾广载、陶伯闳，人事室主任任承华、会计主任陶懋梁、出纳主任谢竺山等，都是曾约农最可信赖的骨干。总务长赵启源华而不实，在扩建院舍中，与太康营造厂刘经理勾

勾搭搭，有受贿贪污的行为，有人向曾约农反映了，曾约农却姑息了他们。秘书兼文书组主任曾广载因迎合人事主任任承华，任承华请求曾约农批准提升曾广载为副教授，遭了师生的反对，又有人反映给曾约农，曾约农不肯收回成命。

曾约农在院设一个了警务班，从掌班的（一个营长行伍出身的）到所有成员，都是曾约农家乡的亲信，枪枝也是从曾家拿来的。

四、王东原来到克强

一九四七年三月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率领一群僚属与侍从，突然来到了衡阳克强学院。他们从前门步入，都昂首阔步，济济跼跼。他们事先没有通告，又适逢星期天，留院师生员工寥寥无几。师生们照例不理达官贵人，这时虽有人遇到省府主席，都不过一顾即掉头走开了，只有庶务组的几个看家的却苦煞忙煞，王东原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去。他走出头门，碰到刘劲儒同学和我。我们两人本想避而远之，不料王东原斜出一步向我们问道：“你们是哪一系的同学？”刘劲儒回答：“农艺系”王东原装作满内行似的，笑咧着口，长下巴突出，说：“那好哇，多学点遗传学，在你们的农场里试出点名堂来看看……”王东原走出去了，我和刘劲儒走了进来，刘劲儒摇摇头说：“了不起，还晓得点名堂！”王东原这次去了南岳，他见圣庙后直通半山亭的公路，名叫“东原路”，忙叫南岳管理局的人换上“曾文正路”的牌子。他说：“曾文正是三湘古代以来唯一的豪杰”。他要把自己的名子让出来纪念这一位“三湘历史上的唯一豪杰”。这消息很快传到了曾约农那里，曾约农满口称赞：“王主席了不起！”

五、两院合并

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定打起内战之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形势一天天于国民党不利了。教育厅长王凤喈先后请示朱家骅、陈立夫，妄图把克强学院解散，但因朱、陈指示：“师出无名，众怒难犯。”就改换策略，亲自跑去局关祠找到曾约农，要曾约农把衡阳的本院搬到长沙合并起来，以便控制。曾约农也因“怕乱”，接受了王凤喈的而谕，决定并院，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元月，衡阳的克强学院全部搬到长沙稻谷仓与分院合并了。人事因此也稍有异动。

六、师生被捕杀

一九四八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人民解放军迅速扩大，九月至十一月打胜了辽沈战役之后，十一月又打胜了淮海战役。克强学院的进步师生，积极组织支援南下解放大军，并准备迎接新国家的成立。正在新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克强院内的斗争日益激化。学生会理事长肖继濂，眼镜长衫，慢条斯理，已不适应需要。中共地下党决定从南京金陵大学调高继清同志作为转学学生来到克强，高继清接替肖继濂，被定为学生理事会理事长。

高继清同学，清瘦尖脸，热情勇敢，很有活力，常穿一身黄色中山装。他一到院，就把学生理事会组织得很活跃，象一团烈火，越烧越旺。正在这时，高继清的得力助手刘劲儒（邵阳人号剑心）同学突然死去，这是个很大的损失。师生们忙于斗争的同时，又得忙于为刘劲儒同学治丧开追悼会。院长曾约农写了悲赞都未过分的“芬芳桃李萎先枝”的挽联。

在刘劲儒同学的追悼会举行的同时，淮海战役中被打死的国民党军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追悼会也在长沙教育会举行。国民党主持的黄伯韬追悼会是一悲到底的，会上有人半途溜出会场，会后又有不少的人溜去了香港。而刘劲儒同学的追悼会开后，大都化悲恸为力量，校内的应变运动，校外的驱王凤喈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愈来愈高涨。然而国民党特务，校内的勾结校外的也愈来愈多了。院内经常有便衣出入。一九四九年三月起，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控制长沙之后，他手下的爪牙和军统在湖南的毛健钧（稽查处长）的魔爪一齐伸进了克强。教授荆顾新忽然被抓走。全院师生愤怒起来了！事后查明，才知道荆教授犯有拿了四百元应变费之罪。他被关押在省监狱里。

荆顾新是个贫苦的老教授，全家人口常吃红薯饭度日，荆教授面黄饥瘦，仍艰苦坚持教学。在白色恐怖中，“贫穷艰苦，就是共产党。”何况荆教授还有“领应变费之罪”！“学生闹事，教授中有支持的”，何况荆教授的“罪证”确凿呢！所以荆教授锒铛入狱，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后来经过荆教授的老弟荆植新和曾约农等多人向程潜等人疏通，荆教授才获释放。

特务抓走荆教授，并不只是杀鸡吓猴，他们的毒手早已对准了学生会理事长高继清。高继清接着失踪了。

高继清的突然失踪，引起全院师生的极大怀疑和愤怒。接连几个日日夜夜，进步师生四去寻找打听；后来打听得知，在南门外杜家山上，有一个深夜开来一部卡车，活埋了一个人，这个被活埋的人，临死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经过挖掘查验，那具被活埋的尸体，正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高继清。

解放后，人民怀念高继清同志，在长沙市举行了追悼会。高继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七、“功课圆满了！”

克强学院的师生，从一九四七年起，对曾约农即失望、不满。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驱走王凤喈的同时，有意驱曾了。曾约农两次秘谒程潜，求得以先去职为荣。这时候民社党在湖南的首领王况裴（号绿野，衡阳渣江人）便乘机得势接管了克强学院。高继清被害时，曾约农的辞呈早已被批准，正在委托廖训渠办理移交。曾约农对活埋高继清表示愤慨不安，他当时写了“天风骄欲死，忽摧桃李正荣枝”的挽联，但有顾怨，未能送出悬挂。

王况裴一到院，就表示“要革除曾院长手里的一切陋习！”他换了一班人马，然而不料好景不长，湖南接近解放，克强并入湖大。王况裴在革除别人的“陋习”的同时，革掉了自己的乌纱帽。曾约农在王况裴下台，克强并入湖大的第三天，假长沙奇珍阁举行了一次宴会，招待了他在克强学院的亲信们。曾约农在宴会席间，洋洋得意，而实有隐忧地讲了一个“抬轿”的故事，他最后读了“各位息肩，我亦徒步快走了，功课圆满了！”

“功课圆满了！”一顿饱餐之后，各作鸟兽散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克强学院。

湖南中路师范史略

方克刚

一、中路师范名称之由来

我国创设师范教育，本始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上海南洋公学，当时因师资缺乏，特设师范院以应中下两院教员需要。次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亦分设师范斋，以大学堂前三级高材生入堂肄业。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伯熙奏定各省设置师范馆，其入学资格以举人贡生为限。湖南巡抚俞廉三热心新政，于一九〇三年正月，在长沙黄泥墩创设师范馆，以曾任祭酒之王先谦为馆长。王时任岳麓山长，乃辞山长委就之，多以颜昌晓代行其职责。所招学生，以壬寅乡闾房荐诸生为多。人数原只数十，欲增班次，限于房屋，不足以容多士。次年，赵尔巽巡抚湖南，百度维新，以长沙南门外城南书院原为全省公有产业，亦多年士子游息之所，乃定为师范学堂永久地址。改聘刘隶蔚为监督，扩充班次，合原有生徒共一百余人，分甲乙等班。刘辞职，乃改聘戴展诚为监督。时湘西到省不便，常德已有西路师范之组织，且各府县中送生徒，不无偏歧之处，路界问题由此而生。城南书院之师范学堂，遂定名为中路师范（以后衡州亦组南路师范），另聘湘阴郭立山为监督。此中路师范名称所由来，亦湖南路界之滥觞以后行政立法及筑路各事，均难免此畛域之见。

二、各种师范之设置

一九〇三年，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

● 方克刚系中路师范创办人，慈高峰中学校长，建国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已故。

程，颁布后，始有正式师范教育之创设。师范教育计划颇为周到，以其应用缓急，程度深浅而别，约有下列五种：（一）优级师范选科；（二）初级师范；（三）师范简易科或预备科；（四）师范讲习科；（五）师范速成科。以上各种师范，在中路师范创设之初，均经公私设置，其经过如下：

一九〇五年，师范馆甲班学生刘武等十一名送往日本留学，乙班学生刘通三等三十名送入游学预备科后，次年改中路师范，乃合本年新取之二百名，编为文科理科速成科四班入堂肄业。

同年六月，速成科第一班杨冕（即端六）等三十二名毕业。次年六月，速成科第二班罗元颢等三十八名毕业，七月简易科方维夏等八十六名毕业（由教职员捐俸设立，原在妙高峰上），一九〇七年速成科郑浚等六十八名毕业。一九〇八年，预科丙班依照新章编为博物数学两科（后均送归贡院优级师范）。一九〇九年六月，历史地理科（原为文科）李剑农等三十五名毕业，物理化学科（原为理科）廖载英等五十三名毕业。此中路师范各班毕业之情形。至于转送优级师范之博物科梁季良等五十人，数学科梁燊等三十八人，均由优级毕业。史地理化两科依章均作为师范科举人，列最优等者，以各部司务补用；列优等中等者，亦作举人，并奖中书科中书衔。史地科原有五十二人，以周监等七人因事退学，一九〇五年，乃考取汤骛、方克刚、翟芾等八人补入。

三、奏派监督之盛业

湖南自南学会后，风气日新，均知救国宜先图教育。当时西路如熊希龄、戴展诚，南路如曾熙，中路如谭延闿，均负一时之盛。陈树藩辞监督，乃由巡抚端方奉派谭延闿为中路师范监督，一时组织均负重望：如马麟翼（副监督）、陈嘉会（教务

长)、李元植(庶务长)、黎尚雯(斋务长)、教员如颜昌晓、石蕴山、胡景伊、言少舫、仇毅、吴继果、许奎元、美国盖保耐、日本掘井,均为名教授,而皮鹿门老师之经学,更为学子所崇敬。一九〇六年八月谭辞职后,以副监督员允昕代理。十月乃由刘人熙继任。时建筑新校舍,所有斋房,焕然一新,门首绕以铁栏,校后辟有操场,而南楼建筑尤为雄壮(当刻有碑,刘人熙作记,谭延闿书石)。一九〇八年,刘因赴桂辞职,以教务长瞿宗铎代理。次年七月,依照部章改为初级师范,以瞿宗铎为监督。次年饥民之变,全校被焚,停办数月。四月瞿监督又辞职,王达继任。因被毁校舍建筑未成,乃租衡清试馆为临时校舍。一九一一年正月,王监督辞职,由王凤昌继任,九月湘省反正,王辞职。至次年四月,改名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至此新校舍完工,全驻军队,职员率学生冒险迁返故址,而妙高峰上之简易师范及峰腰城南学社所设之图画手工养成所,均改为中学及中学宿舍舍矣。南北纷争,匪徒扰乱。抗战以后,此地虽为讲学之境,实日处忧患多难之中。可见不独创业之难,守成亦不易。

四、中路师范及第一师范仍在城南书院旧址的历年主管人之更迭

从师范馆起至第一师范学校迁入城内止,为时不过三十年,主管人变更甚多,兹特列表于后,以备参改。

职别	姓名	籍贯	任期	备考
馆长	王先谦	长沙	光绪二十九年	师范馆创立
监督	刘棣蔚	常德	光绪二十九年	
	戴展诚	常德	光绪三十年	
	郭立山	湘阴	光绪三十一年	中路师范
	陈树藩	湘阴	光绪三十二年	

校长	谭延闿	茶陵	光绪三十一年	(改为优师范
			光绪三十二年	选修科
	刘人熙	浏阳	光绪三十三年	
	瞿宗铎	湘阴	光绪三十四年	(改为初级
			宣统元年	师范
	王 达	长沙	宣统二年	
	王凤昌	宁乡	宣统三年	
	文启泉	醴陵	民国元年	(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成立)
	曾沛霖	武冈	民国二年	
	孔昭绶	浏阳	民国二年	
	朱振黄	长沙	民国三年	
	张 干	新化	民国二年	
			民国三年	
	彭正枢		民国六年	
	孔昭绶	浏阳	民国七年	
	文徽典	宁乡	民国八年	
	覃泽寰	宁乡	民国九年上学期	
	易培基	长沙	民国九年十一年	
			十二年	
	李济民	沅陵	民国十二年	
			民国十三年	
	彭一湖	岳阳	民国十三年	
			民国十四年	
	王凝度	衡阳	民国十五年	
	罗驭雄	安化	民国十六年	(改为省立
				高级中学)
	吴建真	湘阴	民国十七年	(改为省立

第一中學)

繆育南	長沙	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
余先礪	湘潭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
彭縉云	藍山	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吳相如	醴陵	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合并于 至二十七年 臨時中學）

至于謝真任校長之省立第一師範，已另建校舍，因未列入。

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实录

刘定仪*

一、创办事略

我国自甲午、庚子两役惨败之后，国势垂危，疮痍满目。忧时之士，金谓彼邦之所以富强，皆因政治修明，人才涌出；我国之所以贫弱，皆因政治腐败，人民昏愚。因此，大声疾呼，停科举，废八股，开学堂，求实学。当局知怒潮不可以遏也，乃顺应真情，明诏允准。然育人才，必先办学堂，办学堂，必先造师资，造师资则师范学堂为首务矣，此西路师范学堂之所以应运而生也。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赵尔巽来抚湖湘，奏准设立三路师范学堂，中路师范设长沙，南路师范设衡州(今衡阳)，西路师范设常德。西路师范则以黔阳黄忠浩(泽生)先生，凤凰熊希龄(秉三)先生，武陵(今常德)戴展诚(邃庵)先生董其事。并分令湘西三十州县各举开明绅士集议于常德，共负筹备之责。未几，黄戴两先生另有任用，各就职去。熊秉三先生因挂名戊戌党案，未便居首。遂以沅陵冯锡仁(莘槎)先生为第一位总理，秉三先生为佐办(时学堂组织章程未颁，一切名义皆由长吏权定)。

* 刘定仪毕业于西路师范学堂，后在北京大学毕业，他在西路师范学堂与林伯渠同志同学。早期任教于长沙南华中学，达特法政学校。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就常德城北门内石梁花街前任湘抚翟诰之私宅为堂址，并购置堂东近附民房若干栋，堂西北澧阳公寓全部连同毗连之民房若干栋，共约七八亩，逾年改建成。图书仪器标本用具粗购，教职人员亦分别聘委，教员有武陵（当时常德府首县）向尚文（蔚秋）先生授经学，同县裴芷卿先生授史学，慈利田金楠（春璞）先生、石门李执中（懋吾）先生授国文，长沙曹典球（穀谷）先生，邵阳李宝圭（璧城）先生授地理，邵阳刘庚先（树涛）先生授法制经济，江苏宝山张嘉森（君励）先生，上海平海澜先生，广东新宁李立夫先生授英文，皆积学之士也。又先后聘请日本教员四人，一为菅野新一郎先生授物理化学，一为田泽十四郎先生授算学，一为铃木直三郎先生授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一为那须省吾先生授论理学心理学教育史。

二、招收学生与分科事项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春，招收速成师范生八十名，修学六个月，肄习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体操五科。每日授课七小时，时无统一之教本，皆由授者逐日自编，谓之讲义，教材简陋，凌乱无序。来学者多系各县之塾师，年龄均在三十内外，毕业后，即分发各本籍，充任该县之小学堂教员。同时又招附属小学堂学生一百二十名。一九〇四年秋，速成师范停办，招收永久师范科甲班生六十名，次年春，续招乙班生六十名。时草创伊始，诸无定制，肄习科目，多仿日本师范学校之成规，参以当时之需要，意为拟定。师范班则有读经、英文、东文、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法制经济、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论理学、心理学、习字、音乐、体操等科。分班肄习，每日授课七小时，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小学堂则有读经、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算学、习字、音乐、体操等科。每日授课六、七

小时不等，时间起止与师范同。

当时科举未停，晋身之途不必定由学堂，又因戊戌党祸匪久，记忆犹新，人心多存观望。故每次招生，应考者极为寥寥，除常、澧两属交通便利之各县，尚称踊跃外，其他偏僻小县多未忘情于科举，有一县之大，全无一人报考者，甚至已入学堂之学生，阻于父母之命而退学者，人心之固陋可知矣。

一九〇六年春间所招丙班新生，报到者才五六十人，不足成班之数，当时选拔小学堂成绩优良之学生约五六十人，在开学之前，补习算学四周，升入永久师范科，是为丙班永久师范科，分为丙一、丙二两班。

三、增设理化专修科与算术夜班之效果

一九〇六年以后，湘西各县中小学堂，同时兴起，盛况如雨后春笋，需要师资，尤为迫急，仅仅三数班之初级师范生，实不足供三十州县广泛之征求。当事乃于永久师范科之外，另办理化专修科，招收成年学生两班，班各四十名。一年毕业。同时商得数学教员田泽十四郎之同意，开办数学夜班，招收成年学生八十名，半年毕业，来学之人（专指算学）有塾师、有店员、有居民，亦有西师本校之教职员。虽年限短促，而造成杰出之数学师资不少，对于湘西教育之发展，曾起有力之作用，而数学尤特出。

四、教本之歧异

当时之教本，无一致之体例，无明显之指归。教员之主张又各不同，用书亦异。如读经，或主礼记（熊秉三），或主毛诗（田金楠，李惠泉），或主春秋公羊传（周宣三素治今文经学又崇拜康梁故主公羊最力），或始主论语，后主春秋左氏传（向蔚秋），又如修身，则钞录先儒之语录讲章，东鳞西爪，

漫无条理。同一时期，同一科目，而歧异若此，真堪发噱！然所陈义理，或有独特之见解与发明，又有不容偏废者，盖诸贤皆以学问著闻者也。至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设立图书局，编辑各种教科书，当事人员不谙教育之原理，信笔杂凑，急遽成书，恶劣更甚于讲义，一时非难四起，停止颁行。不得已，仍由各教员赓续编辑，嗣后京沪书商延请留学东西各国之人士，选择彼邦通行之善本，翻译改编，始有精简扼要，脉络贯注之教科书，学者称便。

五、甲乙两班毕业之波折

先是学堂当事，以各县风气渐开，学堂日多，师资供不应求，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为尤甚。为解除当前困难计，将甲乙两班永久师范科，依照东京高等师范分年选科之制，改为优级师范选科。指定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为选修之目，各就资性之所近，选其二目或三目，专门肄习，以求深造。时两班学生，除国文、历史早在私塾期间各具不同程度之根底外，他如算学、英文、物理、化学各科，皆有长足之进步，而且程度整齐，相距甚近，分年选修，速达可必，又可适应各县之征求，意至善也。不意于毕业之前年，湖南提学司以前项优级师范选科，核与部颁学堂章程之规定，多有未合，尤于出身之阶，难以确定，令改为初级师范科。一时学生大哗，声言不达到优级师范选科之待遇，决不罢休。当时双方争执之焦点，司方则以章程规定，京外师范生之出身，将与京师大学堂之师范生相等，原系破格从优，以示鼓励。若学级混乱，违背定章，报部之后，必于驳诘。与其于部驳于日后，不如早正名于事先。学堂当事则已兴学伊始，师资奇缺；实于发展学务，大有滞碍。不得已为此权变之法，以应急需。视学生之成绩，核与定章之规定，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育才设为

奖励，但準才艺，才优优奖，才薄薄奖。于律令，于情理，有暗合，无违忤，殊属当之而无愧。且自此以后，一定永遵定章办理，似不妨原草创之变通，鼓学生之情绪等语，往复驳答，时亘半年，终因成绩优良，准照优级师范选科之例办理也。

六、学生之待遇

兴学伊始，人存观望，不能不从优待遇，以励来学。而师范生尤称最尊，不取学费，供给膳宿茶水膏火，寒热制服与靴帽、理发、洗衣、医药、图书（教科书暗射图小型标本图）、三角板、丁字规、绘图器、课本、纸张文具等等，一人一年之费，已有可观，全体合计，则为数不资矣，此物质之优待也。毕业之后，最优等奖举人，优等奖贡生，中等奖附生。而甲、乙两班，因努力上进之结果，成绩高出初级师范之上，準北京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例，提升一阶，最优等奖进士，准与科考取士一体殿试，优等奖举人，中等奖贡生，此出身之优待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诏停科举，自是学堂为唯一进身之途，昔之怀疑观望者，趋之若鹜矣。

七、西路师范学堂所及之领域与沿革

西路师范学堂所及之领域，有常德府属之武陵、桃源、龙阳（今汉寿）、沅江四县，澧州（今澧县，当时以直隶州兼县）所属之安福（今临澧）。安乡、石门、慈利、永定（今大庸）六县，辰州府属之沅陵、辰溪、溆浦、泸溪四县；沅州府属之芷江、黔阳三县；永顺府属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靖州（直隶州兼县）所属之会同、通道、绥宁四县。以上四府二直隶州共辖二十五县又直隶厅五——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晃州厅、南州厅，入民国改县合三十县。民国又以古文坪升县，自是西路师范之领域，都三十一县，三路师范之领域，以西师为最大，人口为最多，而文化为最落后（指沅河上游）。

其名称之沿革，则自一九〇二年_一起，至一九二二年止，皆名湖南西路师范学堂，以马锡仁、彭施涂，吴友炎等为监督。民国成立改为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先后以李正国、张伯良、贝允澂、吴廷梅、戴丹诚、张炯等为校长。自一九二七年起，高师部并入长师省立高中，初师部与常德省立二中初中部合并，改为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以胡佐武为校长，照新学制改组，内设高中科、师范科与初中科。初中科_二生毕业以后，愿入高中科者，坐升高中，愿学师范者坐入师范。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后改为湖南省立常德第一中学，相沿至今。

八、学 堂 之 经 费

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数达六百八十兆两之惊世巨额，合全国之税课，尚难足此一项之开支，遑论学费。当日官绅筹措三路师范之经常费款，曾熬费苦心。几经商议，始决定在湘岸盐税项下，每征税银一两，附加学款制钱一文，按月由督销局征拨。幸西师所及之领域大而人口多，故收支尚足相抵。辛亥民国建立，国家承丧乱之余，善后为急。中枢向英、美、德、法、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号为善后大借款。指定全国盐税为本息担保，一切收支，统由银团稽核监督，非经稽核核准，不得擅动。每月偿还本息以后之余额，则由银团拨交北京财政部指定之国立银行，全部为北京政府留用（此款并未用作善后，当时国民党要人宋教仁为袁世凯刺杀，南中兴兵声讨，袁不惜以极酷之条件借成此款，应付内战，每百镑实收只七十八镑云）。自是盐税附加，全部落空，学堂经费，改由省库给发。当时地方疆吏，以省库为外府，预取预携，漫无限制，全部库款均作养兵扩地之用，对于教育经费一概置之不理，积欠至三、五年之久，断炊绝饷，学潮迭起，不成景象矣。

九、西路师范学生对我国国家之贡献

湘西民风古朴，体质健美，实为国家优等之人民。惟生息于万山重叠之中，孤陋寡闻，文化落后，此困于地势，非资性顽鲁也。自西路师范开办后，师资涌出，分布各县，主持教育，为后学立深造之基，为文化开不绝之源，师弟传承，濡染不息。现在澧兰沅芷，已先后争妍竞秀于山河水际之间。其为国宣劳，宏济时艰者颇不乏人。兹举其特出之士：如蒋翊武、林伯渠、李华缙（现改名李烛尘，全国人大代表）、栗裕、辛树帜、滕代远诸贤，或为政府名流，或为干城上选，或为学术通博，其丰功伟烈，久为人所熟知，不必赘述。其他或主教育，或办实业，或躬耕垄亩，或献身戎行，其有造于国家社会者，正无穷尽也。

十、西路师范学生之进步思想与革命运动

甲辰（一九〇四年）前后，内忧外患，与年加深。救亡图存之论，刊布于报章，喧腾于社会。当时，西路师范学堂附近有启智书局者，专贩港沪出版之新书，播架甚富，任人取阅，业务之盛，颇为时人所注目。就中魔力最大者，首推梁启超撰之《中国魂》，以锐利之笔锋，浅显之文字，发为惊世之快论。学生来自田间，孤陋寡闻，忽睹梁氏警策透辟，振聋起聩之作自然，心醉神服。不独血气方刚之少年为然，即常德城之学究塾师，一阅此书，莫不拍案惊奇，赞不绝口而五体投地也。其他诸种有唤起种族之仇恨者，有启发爱国之热情者，有传布革命之言论者，有发挥民主之理论者，有暴露民贼独夫祸国殃民之罪恶者，有鼓舞人心与艰难困苦奋斗者，有描写堕落民族遭遇之痛苦者，有阐明最切实用之政治经济哲学之理者，每于课余之暇，囿集书局，口诵心维，耳濡目染，参透感悟之后，酝酿成为他日叱

咤风云之进步思想。

学堂之东北隅，幽深僻静，音乐室在焉。学生往往集合于其中，高谈时事，罔识忌讳。未几，为监学得知，严加禁止，并将各处讲堂空屋，概行上锁关闭，然此不足以遏止学生之活动也。石梁花街附近，有古刹祇园寺焉。地址幽曲，香火稀少，主持又为一烟癖深沉之老僧，最合秘密结社之用，彼等借读书为名，赁其空房两间，存放各种排满革命之书报，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洞庭波》、《浙江潮》等，分途密卖，有时常德之江湖草莽中人，亦渐次行走于其间。

其首要之人有武陵（今常德）刘全、刘复基（复基非西师学生，但与西师进步分子有深切之关系）。澧州（今澧县）蒋翔武、黄贞元、慈利朱昌燕、晃州翁家雍、黔阳杨晓东、通道黄承均等多人，由刘复基之联络，渐与沅河流域之哥弟会中人，如武陵之申汉丞、蔡良臣、鄢豪等频相往还。会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武陵县孙安漠、桃源覃道让（后改名覃振字理鸣，前众议院议员，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接到日本东京留学界寄来之传单若干张，题曰：“死里求生”，内言英、美、俄、德、法、日诸国，根据各国先后与清廷订立势力范围之条约，瓜分中国。声讨满州政府卖国之罪，并称：“非排满不能出汉族于水火，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于危亡”。请常德学界翻印散发，唤醒民众。孙、覃并附意见于文末，措词颇激烈。

适常德知府连丕基据密报，谓：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勾结匪类，图谋不轨，连氏立委武陵县某带领便衣差役多人，不动声色，前往搜捕。幸某氏系一科甲出身之循吏，颇同情于维新之运动，未予认真辨理，免兴大狱只销毁书报数种，传单若干，开除孙、覃二人，旋以“年少无知之生童，受传单之鼓惑发为，危言耸听之词，行虽悖谬，而情似可原。已将书报销毁，首事孙、覃两生开除，以儆效尤”等语，洋覆了事。将此满城风雨

之要案，轻轻数语而放过，连氏亦不深究也。

此案发生之后，启智书局亦因风声险恶而存戒心，立将违碍各书报，藏匿不售（有人谓藏沅河南岸之黄船庙，似系哥弟会机关）。同时西路师范之当事人承府县之授意，时刻注意学生之言行，视线咸集中于刘全、蒋翊武等人。双方（学生与监学）耳目密布，彼此探视，终因学生人多，消息灵通，监学人少，鞭长莫及，故祇园寺之秘密结社，始终未被发觉，然监学人员之疑窦仍不能释也。遂饰词加罪，将蒋翊武、朱昌燕、黄贞元、杨晓东、翁家雍等先后开除。刘全亦染肺病而亡故。当事以为首要尽去，可以高枕无忧，嗣后禁防疏弛，监学亦有所更易。于是学生又在刘复基之指导下，抱定不妄动、不喧嚣之宗旨，继续活动。

一九〇六年，浏阳起义失败，党人四散，官方受上级之密令，缉拿党人，并附“格杀勿论”之条。刘复基为嫌疑之首，闻警离去，从此西路师范学生之革命活动，亦因刘去而沉寂无闻。此西师进步分子革命思想之萌生与其动态之本末也。

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 建设历程及其演变

何 铨* 李大梁**

清末科举将废，学堂初兴，感觉师资缺乏。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秋，湖南提学使署，召集士绅，议设三路优级师范学堂，分办于湘中湘西湘南三路适当地点。湘中设于长沙，湘西设于常德，湘南设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学堂开办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初借衡州府中学新建校舍开学，次年于衡阳来雁塔对河江东岸新建的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落成，迁入本校，曾熙任学堂监督。

教务长：刘岳崱、刘去职后成凤韶接充。

斋务长：向乐谷。

庶务长：王秋夫。

监 学：刘次源、周笃生、姚鹏图。

检 查：曾星楼。

理化数学教员：日本人大窪敬治郎。

博物学教员：日本人生田洁、日本人原田爱之助。

* 何铨，毕业于南路优级师范学堂，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已故。

** 李大梁，毕业于南路优级师范学堂，建国前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庶务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与徐特立同志共事，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已故。

教育心理、论理、管理等科教员 日本人中村邓次郎。

英文教员：日本人中村邓次郎、赵运文、恽铁樵。

日文教员：成凤韶、姚鹏图。

历史兼伦理学教员：颜可铸。

地理教员：谭凤梧。

翻译员： 陈子祥、危道丰、成凤韶、郭先本、姚鹏图。

体操教员：余俊丞。

所招学生，多属廪生秀才，于文学及中外历史地理，各有研究，颇具相当基础，故未专设史地科，仅设理化博物两科。聘请日本人教授专科，兼讲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及各科教授法，管理法，和英文日文等。其他历史地理，亦聘有教授，就各生原有根底，重加整理研究。但理化科，仍先授以简要博物；博物科，仍先授以简要数学理化，以备专攻本科时，必要的基础知识。

清季开办学堂，均需另辟财源，或指定专款，本校经费，按中西两路优师例，在盐饷项下开支。学生学费膳食制服医药书籍课本笔墨等，概由学校供给。

理化博物两科学生有：

黄俊	曾恕	贺润	张琴	肖迁
肖柱	彭文祥	罗沅	左全耀	刘兆由
肖鸿祥	蒋鸿煥	刘汝翼	周子贤	康和声
廖重祺	黄周宇	欧阳润	文森	刘兆然
王光生	吴鸿鸾	吕望峙	陈越	尹桐阳
夏文康	刘韬	刘心斌	张炳彪	孟昭焕
孟守贞	罗俊奇	高炳垓	申登炳	荣瀚
柏超	黄璠	欧阳廉	何国玺	何国蕤
何国璘	唐炳英	蒋先觉	彭申伯	周锐棍
唐学	伍行敦	曹懋典	李衡	宾波千

周兴垣	吴兆熊	田铭鼎	潘贤录	黄 固
首元龙	陈治安	李大梁	彭焕庭	刘向葵
陈希藩	张之纲	段邦燊	薛永辉	吴 静
邝鸿钧	曾省身	曹猷春	欧阳杰	朱格非
黄应槐	朱兆鹏	祝尧臣	黄砚丞	郭向阳
何 镛	张化之	雷泽远	李在衡	何炳昊
彭作藩	邝书春	邓敦毅	陈应槐	陈校经
钟才谦	钟华绅	李驭丙	罗有幅	袁翥鹑
周南垣	邓 峰	等		

学制五年。一九〇九年提学使委吏部主事曾，率监考委员二人来校，主持毕业考试，所有两科各门试题，概由学校在省请外国专科教员拟定，分类密封，交主考委员带来。入场点名给卷毕，主考委员，当场拆封揭示。此外另有实习考试，各将实习所得列表，并考科学论文一篇。各科试卷，由主考委员收齐，汇交学署，请各出题委员评阅记分，造册呈部核复，再由学署发校榜示，手续极其严密慎重。毕业奖励，清廷仍用科举虚荣牢笼之术，一律奖给师范科举人，并加各部司务，或中书科中书等。

两科同学，多由各县府，从廪秀中择优申送而来，文学颇有根底，科学尤善研究。兼值科举将废，学校初兴之时，为思想改进一大转折点。特将原委分述于下：

湖南先儒王夫之先生，抗节拒清，著有船山遗书行世，公私多有购藏，民族思想，浸灌于学界脑海。况船山先生，生长湖南，凡与接为构者，均受其熏陶，历代递传，相习成风，此为思想转变之一主要原因。其次王湘绮先生，主讲东洲船山书院，特授春秋公羊学说，旨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同学中多有亲炙其教者，春秋大复仇之义，言传渐广，入人更深。彼时康有为的大同论，孔子改制考，梁启超主办时务学堂于长

沙，并组织南学会，种种革新议论，弥漫于全湘全国。兼之明末遗老所编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等痛史，同学等捐资翻印流传，更足以促进革命思潮，此又为思想转变之一助因。同学等，生当其时，既服膺先儒之名言大义，复习闻当时维新诸学说，新旧冶为一炉，信心愈坚，其思想自异寻常。此虽当日的狭隘民族心理，都是光复旧物的一种利器。

同学未入校以前，既受先知先觉之薰陶，入校后复有历史兼伦理学教员颜可铸，他在讲论理学时，引严复云，谓孔子宗法伦理学说，不合于现代生活，思有以易之，而新吾民之耳目。又引李贽云，自汉武帝表章六经，尊崇孔子以来，天下无真是非，而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取便于帝王之专制，阻碍吾族之进化。同学闻之，更加异常兴奋。事闻于提学，大为不满，示意曾监督，令其引退。全体同学，悲愤交集，排队送别，师生涕泪交流，痛恨言论不能自由。曾监督在旁戏言，你们如此难分难舍，只为追随往学等语，此事乃一时达官贵人，籍以密极邀宠，保存禄位之所为，更为同学所憎恶。自是以后，曾监督常以作文题测验同学思想，于是同学等，籍题发挥，各抒所见，畅所欲言，皆有关世道人心政治得失之作品。曾监督阅卷后，无瑕可指，惟有严其监视学生之言行，而同学已有不少渗入同盟组织，密信往来，幸未泄漏。但驻衡水师营，每于夜深，开船校前河边，登岸侦察，黎明仍返原防。当时同学，虽关心社会诸问题，而于科学仍极力钻研，穷原竟委，质疑问难，有时教师穷于应付，无以答问。各同学每于寒暑假回县时，对于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多所创导，于辛亥革命亦皆有多少贡献。

同学毕业回县后，或任中小学校长，或充教职员，或委为劝学所长，主持教育行政事宜，各于旧学既有根底，科学复有研究，新旧两方，皆乐与接近，诸事进行顺利，故县中教育，

推广较易。而发展教育，端在宽筹经费，和储备师资，当建议提充地方各项闲款及神会庙寺产业时，父老士绅，莫不乐予赞助，开办短期师资训练班时，则老师宿儒，多愿执弟子礼而来就学。设主持其事者，素不见信于人，何能如此踊跃附和。

在同学等未毕业以前，本校即已附设初级师范班，并附设小学，以资实习。反正后，改称为第三师范，两科同学毕业后，即择其品学均优者，聘任初级师范教师。次年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成立，其中校长教职员，亦多同学担任，前后蝉联多年。其学生蒋先云、黄静源、曾晋乾、李卜成、袁痴、曾亨灿、黄克诚、曾希圣、杜家俊、李君喜、贺辉庭、石守信、肖觉先、肖光镠、戴威、戴镠本、唐朝英、欧明彬、李杜新、贺恕、何激、杨呈详、赵精、陈芬、张际春、张经武、张平化、周礼、伍云甫、谷子元、吴汉杰等，富于革命思想，勇于任事的共产党员，均于此时，受马列主义熏陶，除少数幸免于难者，现仍为国尽力外，余多先后壮烈牺牲。

彼时湘南风气已开，求学者日众，在衡男女两师范招生有限，额满见遗者，约在两千内外，同学曾恕、何伯年、左苇客等，特邀集在衡同学及知交故旧，筹款组设私立道南中学，而成章中学相继成立，嗣由同学张琴创办女子中学，亦随而告成，于是男女学生投考中学者，均无向隅之忧。

一九二一年十月，在衡组织共产党机关时，同学中如何伯年、陈佐卿、袁翥鹑等，及男女两师范学生，为上述蒋先云等数十人，均先后入党。彼时党内宣传文件，及一切讲稿，多由何伯年主编，或修饰润色。所有各项运动，咸由三师师生起领导作用。嗣得毛泽东，常来第三师范，讲演马列主义，指示中国革命及工农运动之方针，并偕学生蒋先云等往来水口山安源等矿区，组织工会及工人俱乐部，代谋一切福利事业，党务进展，更有一日千里之势。

不料军阀何键，见共产党蒸蒸日上，对于贪污土劣，尽法惩治，恐于己不利，将密令许克祥在省反共。衡阳警备司令段珩，亦在衡捕杀共产党人。陈佐卿、袁翥鹄等，幸先避免。何伯年以在校讲社会问题诸课，视为策动革命最烈之人，逮捕受审，经其反复说明，证以搜去聘约，系国共合作时所编课本，始允许陪审员送其返校，严令不许离衡。同学吴鸿筹，在国共合作时，以共产党员，出任湖南高等审判厅长，惩治贪污土劣甚力，马日事变后，被逮捕下狱，嗣虽越狱逃避，因受刑致疾，不久即死。又同学潘贤录，在长衡任教职员多年，历职既久，阅人较多，党朝野上下，无可同谋革新者，乃翻然变计，辞职回郴，阳假经商之名，阴谋革命之实。于是开设味雅园黄岑书社，联络在郴地下党员，常在园社开会，策动一切。嗣为县长张翰仪侦悉，出票拘捕，幸闻风远飏，未受其害，而园社均被封闭。其侄开茨、开沛，受其薰陶，为党尽力不少，现均在京供职。此外同学邝书春，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反对最力，为军阀汤芑铭枪毙于长沙。

同学等从教育工作，虽于人民思想改进，无不直接间接影响，终觉力薄能鲜，对于空前未有的社会改革，不克奋起迈进，故于革命当中，愧少显著建树，而在当时当地起领导作用者，尚有张秋人、蒋啸青、刘健、吴鸣冈诸人。因为校史范围所限，概未叙及，竊当另编第三师范革命史，俾后人得窥全豹。

关于省立第九师范学校

马文义*

湖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设乾城所里镇（今吉首），校设对河（洞沙）高山上，背为沅溪书院。校内丹桂独秀，高约十丈，秋期花盛，香闻数里。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教育厅令派张庆梅创办特区师资训练所于乾城所里沅溪书院。一九三七年三月，第三区专署及湘西屯务处又提屯谷五千石，设湖南屯区各县联立初级中学于内，仍以陈兼任校长。计陆续招特师四班，初中二班。一九三八年八月又招简易乡村师范一班，并将校名改为湖南省立乾城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一九四〇年春，屯中独立设置。一九四一年本省分区设学，本校又改为湖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一九四二年八月，湖南省立所里师范并入本校，增设高师班次，调陈浚川任校长。一九四四年八月，陈浚川免职，马文义继任。一九四六年八月教育厅调马文义任十五中校长后，由杨慎宜继任。

一九四四年八月，长沙沦陷，耒阳告急，教育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迁桂东，一部分迁湘西。我时任一科科长，乃决定派我带大部分案卷、人员向湘西出发，又以省立九师一年以来无消息，故又派我接办九师，而以四科科长樊国延驻沅陵湘西行署任教育科长主持教育方面工作。

* 马文义建国前曾任第九师范学校校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我到九师，陈浚川感到突然。我将免职令面交，并言厅方因年余不得此校音信，究不知还存在否？陈系安徽人，时安徽教育界人士迁此地者颇多，均在国立八中和商学院等校，而九师亦有多人。后陈以湘西行署在沅陵，亦未便抗而不交。时会计主任梁某告诉我，陈以储谷三百余石在校预备开学，若不将此谷阻运出校，则本期无开学之望。因他将乾城之可拨动的分配粮都拨运了。我即依此而行，卒能开学，后来教职员虽偶尔催薪，但以人事多旧，陈任时欠薪，统归前任理落，也未发生任何问题。

此校自一九三六年创立，值抗战军兴，虽在边区，人力物力，自受影响。我接事以后，又值湘桂沦陷，省政府播迁，顿感经济粮食压迫之苦。第一期以田粮处拨粮较迟，致使五百员生期中断炊，地方政府坐视不救，乃向近处学生借米维持，虽数微时短，后虽偿还，师生至不安也。第二期（一九四五年上期）则更困难，学校不能不于开学时向学生家长借米。而乾城田粮处又不遵守省处令拨付，有意卡住，致使学校困难已达极点。事务主任无人敢当，潘余文未满一月，即行告退，王守成亦即数月而去，田荣英勉支持一期，而他适幸在校师生不逼清偿旧欠，退还借米，共渡难关。自抗战胜利，公粮改发代金，于是师生心理大安，而转注意于教学方面的进展了。

此校前身本是特区师资训练所。所谓特区，即汉民族与兄弟民族（苗族、土家族）杂居之地。此地兄弟民族在清乾隆乙卯年曾被清王朝大屠杀一次，嗣后设厅管制，横加压迫封锁不与交通，因之文化低落。辛亥以后，稍变陈法，但言语不通，习俗各异，在屯区办学校者，并无特殊研究设置以资适应，九师亦然。在四百余学生中，兄弟民族中苗族约占四分之一强，以田、吴、廖、石、麻、龙姓为多。他们中有能讲汉语和苗语者，有不能讲汉语者（少数）。我找出不能讲汉语的学生石某谈话，他必同讲汉语的人同来。问他能听得教师话懂不，

他说“要靠同学转告”。我检查其成绩，其作文只有几十字一篇。但他们同学告诉我，他还未毕业，当地就预约了他为附近高小教务主任了。我因问苗族中是否有文字或符号记载事物，他们说：因各地情况不一，无固定通行文字可言。我因之感到，以大汉族主义的文化化苗，逼苗自行汉化这样的办法，比之今日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兄弟民族自治，自己办自己的事，不啻有壤天之别。故特记于此。

湖南省立工业教育沿革

周邦柱*

清朝末叶，国内有识之士提倡维新，纷纷上书，条陈计划，王朝黉之。于是，开发矿产，敷设铁道，创办制造局；同时，设立学堂，培植专业人才以承其乏。湖南当局乃就长沙城内戮子桥原有的“迁善所”改设为“工艺学堂”。此即湖南创办工业教育之始。

一九〇二年，湘抚俞廉三俯从湘绅的建议，认为“民以食为天”，务农最关重要，奏请清王朝将“湖南工艺学堂”改为“湖南农务学堂”，并委候补道张鸿年为监督。一九〇五年，农务学堂停办，改设“艺徒学堂”。内设“漆器”、“图案”两科，分班教学。一九〇六年，复更名为“湖南全省中等工业学堂”，并增设染织科。时张鸿年去职，彭世俊继任监督。尔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九一二年，才正名为“湖南公立中等工业学校”（蔡湘为校长）。停办“漆器”、“图案”两科，增设“机械”科，与“染织”科并存为两科，规定三年毕业，每年增招新生两班。

一九一四年三月，奉省令更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增设“应用化学”一科。是年十月，蔡感到戮子桥原有校舍狭窄，不便扩充，认为小吴门外“甘家台”停办的

* 周邦柱系同盟会员，建国前任湖南省立工业学校校长，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工程学校校长。已故。

湖南省立工业试验场合适（即现在长沙市立一中的学生宿舍），经呈准省当局指拨后即将迁入。次年，学校当局认为有了校舍，而没有较完备的机器设备的实验工场，只是空谈理论，不结合实际，将来学生毕业出校，仍不能学以致用，适应社会的要求。于是又在经武门外大垅购置基地，建筑机械，染织两科的实习工场；同时，添购供各科实验用的理化仪表和机器，一九一六年实习工场落成之后，即分别装置使用。

一九一六年春，省当局复于常德、衡阳两处，曾设省立第二、第三两个同等的工业学校，并将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更名为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一九二〇年，调常德第二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周邦柱任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同时在原有实习工场之侧，增建“应用化学”科的实习工场。至此，该校机、染、化三科的实习工场，规模粗具，教学便利。是年，周邦柱调出，蔡湘复长该校，至一九二五年，才更委梁应乾为校长。

一九二七年，因省政府厉行紧缩，分设常德和衡阳的第二、第三两工业学校停办。仅留第三工校“电机”一科归并于长沙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仍按期照常招班），乃又将该校更名为“湖南省立工业学校”。周邦柱复继梁应乾为校长。

此时的工业学校已有机、染、化、电四科，规模比较完备。且计划大垅基地增建校舍与宿舍，便于各科与实习工场联系，以免学生上课和实习经常往返于“甘家台”和“大垅”之间。不料值“马日事变”，所有省立各校一律停办。该校在停办期间，由教务主任石声灏专负保管校产之责。一九二八年，该校奉令恢复，并更名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以成希文为校长。一九三一年四月，该校又更名为“湖南省立高级工科职业学校”，于染织科中增加纺纱一部门，正名为纺织科。是年十月，成希文辞职，周盛唐继其任。

一九三二年冬，大垅基地兴工建筑校舍，经时三载，先后完成十二班普通校室，理化特别校室，制图室、图书室、学生宿舍，大办公厅、大食堂等各一大栋，以及浴室，盥洗室和其他杂屋等。一九三五年三月，该校又奉令改为“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省会各校为策安全，纷纷迁移山区。该校亦于一九三八年春迁移到湘乡永丰，租赁王朗和堂房屋为校舍。一九三九年，该校奉令与省立第一中学、第一师范、第一女中、省立长沙初职等校在安化桥头河（现属涟源）合组为第一临时中学。高工部与初级职业部并称为分校。周盛唐受任为临时中学委员之一，主持分校教务，对外悉以第一临时中学分校名义行之。一九四〇年春，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加办“机械”、“电讯”训练班各一班（一年毕业），以应抗战时期的需要。是年九月，奉令仍恢复“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原名，独立设置。旋又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传达蒋介石意旨，大概内容是说：全国成绩优良的职业学校，应办理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一班，电机技术科两班，并逐年招班以资衔接。因此，该校又另租王朗和堂侧“谢东晋堂”房屋以资扩充实习工场，还加租附近“细垅”王氏民房，略予修葺，作为校舍。新招机、电两科学生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入学。

在一九四〇年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增加班次的同时，又奉省政府令以增办职业学校，将高职更名为“湖南省立中正第一职业学校”，（新增的二职校设耒阳，办商科；三职校设桂阳，办陶瓷科；四职校设津市，办农科；五职校设湘乡，办土木科；六职校设新化，办矿科；七职校设祁阳，办机械科；八职校设大庸，办农科；九职校设沅陵，办油漆和土木两科；十职校设安江，办农科。是年七月奉令去掉“中正”二字。一九四二年七月，一职校长周盛唐与三职校长成希文互调。此时又

添招电机技术专科两班，机械技术专科一班，加赁“朱璜壁堂”房屋作为技术科第二校舍，勉强容纳续招的技术班新生。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大举南犯，永丰失守，一职师生辗转迁移，由永丰而邵阳而武冈，直到黔阳，在决定在黔阳的“托口”复课。当时教学内容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困苦是不问可知的。是年冬，广西龙胜失守，托口告急，只好将中等技术科学生全部移送重庆教育部办理转学。一职本部师生，则于一九四五年一月迁至溁浦桥江复课，至一九四六年春才迁回长沙原校。这时教育部又要该校恢复中等技术科，以后一直办到解放后才告结束。

该校自创办以来，截至一九五〇年为止，垂四十余载，总计各科毕业班次达126班，毕业人数达3200余名，散布地区甚广，建树功绩特多。以言革命，效命疆场者有人，投身殉国者亦有人；以言建设，或为重工业的中坚，或为轻工业主干，以及在各地属建设性机关服务的，均不乏其人。

一九五一年，省文教厅利用该校原有校舍和工场的设备，将私立的楚怡工业学校和文艺中学校合并为一校，更名为“湖南工业学校”；内设机械、纺织、应化、电机、土木、矿冶等六科。工业厅厅长高文华兼任校长，曹典球、成希文、曹治阳等为副校长。一九五二年，高文华、成希文均卸校职，由唐棣华任校长。是年秋，中央为统一调整院系关系，遂将该校纺织科并入中南纺织专科学校，电机械科并入河南郑州电力学校，应化科并入广州某校，土木科并入中南建筑工程学校，矿冶科并入长沙矿冶专科学校。仅机械科未动，但学校已更名为汉口汽车学校，随迁汉口。

回忆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

雷天一*

一九三六年秋，正当日寇企图侵吞整个华北的严重时刻。在衡山县城，一所新型的学校——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下简称衡师）在人们惊异的眼光中诞生了。

创办始末

当时为什么要创办这么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这里先从创办人汪德亮说起。

汪德亮从小勤奋好学，十二岁考进北京清华学校，一九二六年毕业。在学习期间，他参加过请愿、游行等学生爱国活动，并逐渐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从清华毕业就选择教育专业，踏上赴美留学之路。

一九三一年，汪从美国彼德堡师范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返回祖国，先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后到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教育实验区工作，任社会教育部主任。他在武大任教时，一位霍姓美国同学在平教会定县实验区教育部负责，力劝汪搞农村工作。给汪的一封信中写道：“你出生、成长、留学美国都在大城市，现在回国工作还是在大城市，你根本不知道农村，不认识农村，你丢掉大多数农民，还

* 雷天一建国前系衡山乡村师范学生，建国后任中南林学院院长。

办什么教育呢？”这些话对汪影响很大。于是毅然辞去高薪的教授职务来到河北定县教育实验区。白天调查研究，接近农民群众，编写教材；晚上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念《千字课》。还经常和农民一道劳动或开展修桥、补路、植树等公益活动。以为这样，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搞起来，就可以改良农村，改良社会，中国也就得救了。

直至抗日战争前夕，湖南要办一个师范学校，平教会极力推荐汪负责筹建。当时，平教会在衡山搞实验，县决定这所师范学校既办在衡山，就命名为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一九三六年九月，汪受命为这所师范的校长。他草拟创办衡师的计划，办学宗旨要注意乡村建设，专门培养乡村小学教师及乡村社会教育教育人员。一句话，就是培养农村基层实干家。可是，对这样的计划，当时的省教育厅也不敢批示，上报到南京教育部，教育部也不敢表态。血气方刚的汪德亮亲至教育部的师范教育司面理，几经周折，由他的一位广东同乡从中疏通后，才获得师范教育司的批准，但这仅仅是汪在衡师这块理想 and 实际相结合的实验基地上迈出的第一步。

三 年 实 验

一、社会化教育。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汪德亮在校经常宣讲自己的办学主张，阐述自己的教育观点——办社会化教育。他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学术思想自由，提倡乡村建设。当时中国有类似教育主张的有：陶行知提倡的乡村教育，俞庆棠等办的社会教育学院实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办的乡村建设实验等等。其思想观点与美国杜威的教育思想或者说与杜威的高足赫脱（Hart）教授（汪在美留学时对这位教授颇感兴趣）的教育思想殊途同归。汪创办衡师的中心思想是：教育和社会打成一

片，希望通过教育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挽救中国。衡师把汪校长的多次演讲加以系统整理，编印成册，题名为《社会化教育演讲录》。

根据汪的下述教育思想，衡师制订了三年课程实验大纲，安排六项中心学程：

一年一期：社会研究。 一年二期：军事教育。

二年一期：民众教育。 二年二期：小学教育。

三年一期：农业教育。 三年二期：乡村建设。

实验大纲的指导思想是：要求青年一代看广一点、看远一点，广泛接触社会实际。这样安排学程，一方面是使学生研究精力集中，另一方面使学生获得广泛知识面。每一个中心学程的完成，都要作到在校研习与服务训练相结合，前者重知，后者重行。使书本和实际相结合，学一点，用一点。如社会研究这个中心学程，即是在学习一些基本理论如《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调查》、《统计学》和《中国现代史》等等课程之后，随即组织师生从事乡村社会调查。一九三七年秋，一、二、三、四班学生去衡山四个乡进行重点调查。为消除群众疑虑采取调查教育情况的名义和乡村教师一道以搞学生家庭访问的形式进行。以四乡调查所得编印了《衡山实验县师古乡等四乡的调查报告》。通过调查学习，使学生逐步认识社会，认识农村，认识中国。

再如军事教育这个中心学程，除了正常的军事训练并协助当地办民众训练之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紧密围当绕神圣抗战开展宣传教宣工作，在校内经常进行时事报告会，抗战书图报刊展览，出大型墙报、唱救亡歌曲，演出抗战戏剧，举办战时演讲会等活动等等。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全校师生下乡宣传，曾组织宣传队，徒步走至武冈、城步等县，开展戏剧和化装宣传，演出了《反正》、《死里求生》、《新打城隍》等

节目，还为当地驻军和伤病员、出征军人家属，组织慰问演出专场。演出之后尽可能和群众举行不拘形式的漫谈讨论，共行程三万余里。不少师生还慷慨解囊相助；有的同学热情地把自己准备下学期杂用费，赠助给贫苦的征属之家。这期间，学校出版了《一个学校的总动员》小册子，忠实地记录了全校师生的精神风貌。

学校的课程设置，除每一中心学程特设的专业课程外，还以国文、历史、体育等贯串各个学期。对地理知识、应用生物、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应用算学、测量以及音乐、戏剧、美术等科目，适当分配到有关学期设置。值得提出的是：学校专设《中国近代史》课，讲述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汪校长亲自讲，还组织其他教师讲，不仅本校师生听，学校附近的中小学教师和一些学生也争着要来听课。随着这门课程的深入讲授，爱国主义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二、民主办教育。

衡师的教师阵容是值得称羨的。大多数是左翼人员。一九三六年秋，学校刚创办时，进步教师叶德光、孟绍曾来校任教，这两位教师早在学生时代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学生耐心传播进步思想，介绍进步书刊，和青年学生交朋友，使不少青年迅速走上革命的道路。衡师迁校新宁时，诗人艾芜来校讲课，他谆谆教育学生：必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能作一个诗人。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我们要“向太阳”。农学家蒋名川老师，是一位正直的生物科学工作者，他热诚教育学生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在衡师逆流滚滚时，特务学生盯住他不放，他借采集植物标本离校出走广西。戏剧导演陈卓猷老师，讲

述戏剧理论。一九三九年暑假他与学生一道参加了300米徒步化装宣传队。可惜这样的同志竟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遭受和不少知识分子同样的厄运。十年浩劫中，被流放到山西一个农场强迫改造，并断绝他对外的一切联系，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屈死火葬以后，才通知家属领取骨灰。还有，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秘密派来的何启君教师（当时化名胡青荃），他是陈卓猷老师去桂林找到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同志要来的。何老师来到湖南这个山区后，患上较严重的胃病，他一直带病工作，和校内师生，校外青年都团结得很好，除了教好《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两门课以外，业余时间还教唱抗战歌曲，与师生打成一片。洪亮的歌声曾鼓舞了不少革命青年奔向救亡最前线。

衡师，于一九三八年迁往衡阳西乡渣江，一九三九年再迁往新宁县，它始终保持和广大社会以及进步人士的密切联系。三年来先后在校任教过的教师有：文学家黎锦明、孙伏园，音乐家任光、安娥夫妇，木刻家温涛，教育家叶德先、邹鸿操、朱屺声、解守业，经济学家孟绍曾、诗人艾青、画家阳太阳、作家王西彦、戏剧导演陈卓猷、农学家蒋名川、教育家陈孝修、周振邦、钱维桢、李笈赐、李智、还有何启君等等，这些教师先后到来，对衡师学生的启蒙教育是很有影响。

学校当局十分尊重教师，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都邀请师生代表列席会议，参加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平时学生各班召开周会或班检讨会，对学校、教职员、同学、其它各个方面都可发表意见，然后汇呈学校当局，以供采择。当时国民党在各个学校推行的是一套法西斯、奴化教育，在衡师，却保有不小不小的独立自主和民主风气，是难能可贵的。

学校办的图书馆，也值得一述。学校当局不断听取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建议与要求，通过各种途径大量采购和订购进步书

刊。一个小小的乡村师范学校，竟拥有各种书刊八、九千册之多。图书管理由学生轮流值勤，他们既是义务图书管理员，又是进步书刊义务宣传员。这儿的书架除了必须应付门面陈列的一般书刊之外，可以自由地读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持久战》、《新经济学讲话》、《大众哲学》、《中国是怎样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社会科学大纲》、《政治常识讲话》、以及文学名著《母亲》、《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彷徨》、《呐喊》、《野草》、《家》等等书籍。还可以看到《新华日报》，《文艺战线》和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等进步书刊对师生的影响很大。

三、相信青年学生

衡师办学，主张对学生进行全面训练，培养单独作战的能力。对学生的训练，在校外是通过乡村社会调查，乡村小学教育实习、县、区、乡民政工作见习等等，使青年人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在校内，要求学生一面认真读书，一面参加校内正常活动。学生的各种学习、生活、宣传服务活动。都在学校的组织领导下，由学生自己管理。如每个班有50个人，要产生一个班主席，由学生直接选举。班主席负责协调各方关系，反映同学的意见，帮助解决困难和组织开展学术和公益服务活动。当时学校流行一首陶行知先生的《自立歌》：“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学生除必须完成各个学程的学习任务之外，全校还组织课余服务活动，成立学生服务活动联席会。这些服务活动有：学务、文书、图书管理、事务、食堂卫生、游艺、交际、体育、

出版、纪律、经济稽核等十二个组，由学生们轮流参加。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服务活动联席会下面，分别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如文艺宣传委员会、伤兵服务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等等，专门负责组织各方面的学生活动。为了弥补组织大合唱时女声的不足，还从社会上吸收一批进步女青年参加，如刘焕珍、杜继琨、何祖祯等，后来都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重要成员。刊物宣传方面有大型墙报《夫夷江》定期出刊，这种新型墙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特别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针对性，给校内外读者以深刻印象。在戏剧演出方面，除《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外，还上演过大型歌剧《军民进行曲》及五幕大型话剧——《凤凰城》，每次演出，只要海报一出现，差不多演出地点附近一、二十里的热情观众都纷纷涌来。

学校还在学生中开展时事讲演竞赛和专题辩论会，讲演竞赛是自行命题，也有全校统一组织、统一命题的。这种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同学们活跃思想，钻研问题，同时也促使大家认真读书学习，扩大知识面。

一九三八年，长沙“文夕大火”，学校师生得知非常愤慨，忙推派邹鸿操老师和两名学生代表赶去衡阳找专员孙某商谈下一步该怎么办，孙漠然置之，回答：“还没有考虑。”这时，邹老师代表全校师生慷慨陈词：“如果政府领导群众打游击，我校师生全体参加。”孙无言以答。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传来八路军的捷报，当时进步师生十分高兴。奔走相告，立即酝酿大游行以示庆祝。谁知这件事被人密报军训处，军训处声称要紧急集合操练，以此阻止游行。同学们一拥而上，把陈卓猷老师团团围住，要求陈老师领队大游行。于是，在这古老的新宁山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大家一面高喊“抗战必胜”的口号，一面

燃放鞭炮，兴奋异常。让军训处去唱紧急集合的独脚戏。

抗日战争期间，衡师先后有两批学生奔向人们向往的延安，还有一大群投奔新四军和其他正战斗着的前线，他们都是带着汪校长和老师们的殷切期望和解囊相助的盛情离开学校的。三班学生周月南，在党的教育下，去延安学习不久即去陕北前线任战地记者，不幸被马鸿逵匪部逮捕，五马分尸处死；二班学生雷怀德去延安不久，即转战华北、内蒙一带，斗争十分顽强，可是，在“文革”期间却受尽折磨；五班学生陆民华，邹今铎，潘世良等三位同学由组织介绍去皖南找新四军，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送上饶集中营，至第二年才从集中营逃出；还有七班学生陈诗伯在去延安途中被特务“钉梢”，非法绑送重庆渣滓洞，在解放前夕被集体枪杀，血染天府之国。在这里我要为拯救我们的祖国而献身的先烈们表示衷心的哀悼。

地 下 斗 争

中国共产党在衡师的活动，先是在校内传播进步书刊，进步师生互相倾谈，交朋友，然后正式成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毛贤友、陈翔石、周月南、刘国安等人是最早的一个学习组。至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个党小组成立，成员是毛贤友、陈翔石、刘国安。一九三八年七月，正式建立衡师党支部，陈翔石任支部书记。由陈翔石、毛贤友、孟绍曾三同志组成支部委员会，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陈卓猷同志继任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九年冬，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派来何启君同志任支部书记，成立新的特别支部，直接由办事处领导，支委有王继银、陆民华，赵琦。

建校头两年，中共地方党委直接领导过衡师党的活动的先后有唐荣前、毛达恂、李锐等同志；在特别支部建立时，直接领导党的活动的是李克农、曹瑛同志。

衡师党组织正式建立，即经常引导党员认真学习党内文件，及时分析学校形势和时局动向，积极支持学校一切进步活动，并带头参加。斗争是复杂艰巨的。如一次，学校决定三、四两班合班上课：要选个班主席，党组织经过研究，在同学中提出：“要爱护衡师，让衡师站起来，一定要团结起来，让大多数同学信得过的人掌权。”可是三青团的喽啰们也纷纷出来活动，有的人竟赤膊上阵，公开叫嚷自己要当班主席。于是斗争的双方都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党领导的力量占绝对优势，真理和正义胜利了。可是那位自拉自唱要当班主席的三青团角色，还不肯服输，此后经常不断寻隙找岔，挑起事端。一九三七年春，衡师要搞军训，薛岳先派蔡某来当军训教官，带领一、二班学生去长沙参加大、中学生的集中军训。在集训期间他在学生中发展了王××，文××，蒋××等人参加军统特务组织。于是蔡本人也就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学校军训处副处长。军训处又来教官三人为蔡摇旗呐喊。从此衡师更不安宁。有一天，正是上课时间，军训教官们以检查卫生为名，搜遍学生的宿舍，特别注意某些学生的抽屉里和枕头下放的书刊，公然把学生传阅的一些进步读物拿走，几个党员闻讯，马上和大批同学抄近路拦截，指责他们：“这是干什么！如果这是不能看的禁书，就应该通知图书馆不外借，为什么你们又把它偷走”？教官们在众目睽睽下，只好把书交了出来。

特务学生又使出一个新花招：公开向学校提出要在校公开发展国民党党员，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汪校长明确表示：“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求学期间以不参加党派活动为宜”。这些家伙被触怒了，就使出无耻诽谤伎俩。他们扬言：“汪德亮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堂侄孙子，既然汪精卫出卖民族利益，投降日本，那么汪德亮也不会是好人”。“衡师赤化了，那么多左派教师。搞什么救亡活动，这是有明显的政治野心，

是要把衡师引向歧路”。所有这些流言蜚语，目的是要赶走汪校长，镇压进步力量，把衡山乡师完全搞垮。这时汪校长也就病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请一位同事代笔向教育厅写了一封信，大意陈述自己体弱任重，责大力小，“日感风寒，已卧床不起，当地无正式医生，唯有静养自摄，坐以待愈。”初步提出辞呈，他先获准去邵阳医院就医，后又转桂林疗养。前后请了近三个月的病假，至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第二封信，谓三年实验完成，呈请辞职。这样一位正直、爱国有进步思想的学者和教育家的辞呈，当然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叫他“体面告退”。

汪走后，继任校长任职只半年多也“因病难于坚持工作”辞职走了。第三任校长（一九四〇年二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是个老古董，伙同他的一批打手，秉承主子的旨意，硬把一所朝气蓬勃的乡村师范打入绝境。首先是更改校名，把衡师改称省立第六师范，一九四一年一月，又搞个第三次大迁徙，把学校全部财物从新宁搬到武冈。衡山乡师就这样在国民党当局摧残下，只办了五年就夭折了。

一九三九年秋，校长人选虽有更迭，尚有不少进步教师留任，斗争并未停息。在教职员之间为所谓宪政，训政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军训教官和极少数几个教师坚持顽固立场，硬说非常时期，只能实行训政，不能实行宪政，只能讲专制，不能讲民主。而大多数教职员如陈卓猷、胡育荃、艾青等等老师则据理反驳，认为这种观点把事物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中国要想不遭受灭亡的命运，只有相信人民群众，大讲民主，大讲宪政。这场辩论遍及全校师生，后来还发展到部分人不上课，不上班，到处搞起了小型辩论。有个朱姓军训教官竟因此要体罚一个学生，引起了公愤，同学们纷纷要求学校领导调离朱姓教官。党组织坚决和广大同学站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

这个教官终于被赶走了。

衡师的最后厄运，发生在第三任校长任内，已于上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学校突然来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先生，据说是来教《文字学》的。学校当局决定把胡奇荃老师讲的《社会发展史》课停开，改开《文字学》。党支部经过商量，坚决罢课，立即派出代表向学校交涉。被停开《社会发展史》的五班的同学分头联系其他各班，希望声援。不少同学纷纷拥到校长办公室，当面质问这是为什么？有的同学还情不自禁高喊：“打倒老古董！”“反对复古！”“反对任用私人！”经过双方反复辩论，《文字学》老师“因病请假”的免战牌挂出来了。这年暑期，第三任校长和他的黑高参纠集军训教官和特务学生，大造舆论，说“学校有异党闹事，要大家提高警惕”云云。利用学期结束，统一发通知书之际，通知四十余人“勒令退学”。进步教师或被逼走，或被辞退，不少教师跑到战时文化中心——桂林，或者重庆、贵阳，另辟新的阵地。

衡阳乡师这所学校，它如同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一样，它为革命培养了人才，为党培养了干部，这所新型师范虽然在国民党当局蓄意摧残下不幸夭折了，但是，它的办学主张，它的开明风貌，它的战斗业绩，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湖南省立高级农业职校沿革

杨惠南*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年)八月,湘抚庞鸿书奏设湖南农业学校,以路孝植充监督。先是湘抚赵尔巽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创办农务局,于长沙北门外先农坛辟附近官地为农务试验场,委提调李祚长主其事。一九〇四年二月自浙购回桑苗三十二万珠,分发各县栽种,试验场内栽种三千八百株。同时复自湖北农业学堂输进蚕种一百张,自浙江蚕学馆购来蚕种三十八张分发各县,并在本场试养春蚕。一九〇五年三月湘抚委路充试验场监督,八月改局为学堂,而以试验场属之。因蚕桑略具基础,故首办蚕科,定二年毕业。是年十月由教员赵广瀛自豫带来山蚕种及橡子等。

一九〇六年二月,庞抚疏奏立案定名为湖南中等农业学堂,并奏请翰林林世焘充监督,拨款修造校舍购办仪器,又划拨古佛寺官地为农场。四月加招蚕科乙班速成生一班,仍定二年毕业。

一九〇七年六月,甲班蚕科速成生毕业二十六名。八月,林世焘辞职,湘抚委候补道张鸿年接任。十一月,招收蚕科学生六十名定四年毕业。一九〇八年六月,招收蚕科乙班速成

*杨惠南系本文撰写者,此文原是省立高级农业职校校史,名《本校沿革略志》,解放前曾在校刊印过。

生三十二名。八月，复收蚕科丙班速成生六十名，定一年毕业。

一九〇九年二月，开始办农科，招收学生一班，并请拨岳麓山官荒为森林培秧局。七月，添招林科学生一班。农林两科学生统定三年毕业，完成三科自此始。十月，蚕科丙班速成生毕业四十四名。

一九一〇年四月，监督张鸿年辞职，湘抚委候补道张绍良继任。九月，附设农业教育讲习所，招收学生一班。十月，湘抚杨文鼎将学堂改归提学司管辖，监督张绍良辞职，由提学司照会沈克刚充监督。由本省士绅主办自此始。

一九一一年正月，陈奂奎继任监督，聘请日人曼昌氏任林科教授。四月，森林培秧局改归劝业道管理。六月，廖名缙接任监督，九月，民军起义，廖辞监督职，都督委刘兼接任。十月，蚕科学生二十六名，农科学生二十九名毕业。

一九一二年一月，本校更名为湖南公立中等学校。朱继承充校长。三月，黄召棠继任，四月，黄辞职，姚建猷接任。八月，姚又去职，钱维骥接任。

一九一三年三月，开办兽医科，招收甲班学生一班，聘请日人村上宽、山下与之助、成松静雄、木暮滕一郎等四人任农林兽医各科教授。

一九一四年二月，陈建中接任校长，三月补招蚕科一班学生二十名。四月辞退日籍教授村上、山下、木暮等三人，同时遵教育部命令更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堂，并改订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八月新建寄宿舍落成，同月新招预科学生二班。十一月，设置气象观测所，并刊行杂志。

一九一六年熊大体任校长。

一九一七年祝鹏祥任校长。

一九一八年陈建中复任校长。

一九一九年陈时臬任校长。

一九二〇年邓寿荃代理校长职务，八月鄞裕楠接任校长。

一九二一年八月，合并农蚕两科，而成为农林牧三科，时校名为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

一九二四年八月，刘宝书任校长，添加园艺设备。

一九二五年四月，又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农业学校，预科增至为二年，本科仍三年毕业。

一九二六年八月，雷孟祥任校长，改名为湖南大学农科高中部，设湖南大学农科筹备处于本校，委周声汉为筹备主任。

一九二七年正月，孟鼎鉴任校长，合并第二甲校（原设常德），男子蚕业（原址设新河），女子蚕业三校（原址设皇仓街），改称农业学校，三月本校停办，委罗宝珍为特派保管员，校舍曾迭受驻军损扰。

一九二八年，陈时臬复任校长，开办农林蚕三科各二班，蚕丝科，女子初中各一班，并以新河制丝工厂为蚕科分校。

一九二九年一月，遵令移送女子初中班子第一女职校，并与金华公司兑换地皮，完成本校墙围。六月，师范班毕业后停办。七月，邓勋接任校长，添招农林蚕三科各一班，完成九班制。

一九三〇年，又改称该校为湖南省立高级农科职业学校。

一九三三年二月，罗敦厚接任校长，同年四月呈准迁建校舍，成立迁建委员会，勘定新校址于岳麓山西之左家垅，拨洋八万元为建迁费。七月，呈请省府核准拍卖铁佛东街农场及第二果园马厂桑园各处，以充迁建经费。八月，成立本校迁建协进委员会，八月二十日买定廖姓两契，为迁建之第一声。十二月改称为湖南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一九三四年二月，新址农林蚕各场办公处成立，创设模范小学于左家垅。十二月九日，新校蚕室建筑奠基，十六日，温室建设奠基。

一九三五年一月，呈准省府会议，给予本农村小学每月经

钱一百三十元。四月，蚕室完工。七月，教室奠基。八月，改建附属模范小学教室，并成立关圣殿分校。

一九三六年二月，呈经省府核准标卖文昌阁旧校校侧地皮，以充作建筑教室经费。三月，修筑夏家冲林场办公室，垦植桐茶树。六月，修造畜产区办公室，及牲畜栏舍。九月，国立清华大学得省府之许可，派员至新校址左家垅施行奠基。十一月，修葺并添建高家坪房舍为教员宿舍。十二月，开始迁搬工作。

一九三七年元月，继续搬运图书及仪器。二月，夏家冲教室完成。三月一日，新校开学，设置灯用发电机，并于校后高山顶上，购地建设气象观测台。同年，奉湘省府令本校所管左家垅全部地段，已有上年二月订约，允许赠与清华大学为校址。四月建筑发电间及麓山第二林场办公室，垦辟夏家冲一带苗圃。五月建筑传达室及学生会客室房屋。六月购置夏家冲磨子山省区救济院所管田庄，以便开辟农场，为迁腾左家垅之用。六月二十六日，举行新校落成典礼，及各科第八班毕业仪式，并举行全省农产品展览及游艺大会。

一九三七年八月，余桂甫任校长。

一九三八年二月，奉厅令自本年秋季起停招蚕科学生，除将蚕科九班即三年一级继续至毕业外，蚕科一二年级乃于秋季依次编入农校各同年级受课。

国立中央大学附设实验中学迁入该校开课，并划出该校课堂之第一层为实验中学办公及教室之用，同时该校之新建学生宿舍落成，旋即迁入。三月，将左家垅清华大学校界内之农场、办公室、农具室、果树区蔬菜区及作物区，陆续迁入校前新辟农场内。八月，时局紧张，省垣各校奉令疏散。本校当即派员勘定泸溪县浦市镇之上方寺为校址。九月即陆续迁入完竣。并将一九三七年各调赴湘米改进委员会协助办理战时稻作推广之

农林蚕各科第九班，即三年一期学生调回学校，十月正式上课。

一九三九年一月，农林蚕各科第九班毕业。蚕科自本年秋季起，正式停办。二月，韩麟凤代理校长，四月农林各科第十班派赴芷江，入省农业改进所举办之推广人员训练班受训。五月，期满卒业，除少数人升学或自营农业外，余均由该所任用为工作人员。

一九四〇年二月，本省建教合作议成，由教育厅同意以农业改进所技师兼秘书周干兼任校长。七月，农林十一班学生三十四人毕业。八月，呈准教育厅增设牧畜兽医科，招收第一班学生三十三人。

一九四二年六月，农林十三班学中二十一人毕业。八月，呈准教育厅增设农业经济科，招收第一班学生一班。十二月，该校附设常德初级工业部奉令改为省立十一职业学校。

一九四三年六月，农林十四班畜牧兽医第一班学生五十六人毕业。

一九四四年六月，农林十五班畜牧兽医第二班学生四十三人毕业。十一月，孙校长辞职，教育厅令同建设厅更派省农改所秘书易劲之接任校长。

一九四五年二月，奉令增招农科新生一班二十七名。六月，农林科第十六班畜牧兽医科第四班，农业经济科第一班学生五十五人毕业。

一九四六年一月，该校奉令由浦市迁津市，永久校址正在勘定中。二月，奉令增招畜牧兽医科新生一班。六月，农林十七班畜牧兽医科第四班农业经济科第二班学生毕业五十六名。七月，奉令招收农科第二十一班、林科第二十班、畜牧兽医科第八班、农业经济科第五班，新生共七十八名。

一九四七年二月，该校奉令增招农业经济科新生一班，共六十四名。

明德中学的五个时期

唐 耀 章*

筹备创办时期的明德

一九〇三年（前清光绪二十九年），明德创立于长沙，为湖南的第一所私立中学。

一、筹备前夕的时代背景。

明德学堂创办的前一阶段，正值前清末年倡议变法维新，废科举，兴学堂，救亡图存的时期。一八九七年时务学堂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开办，由梁启超主讲。一八九八年又有“南学会”的组织，以谭嗣同、皮锡瑞为骨干。当时主持湘政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公度），前后学使江标、徐仁铸等也都具有维新的思想。因而湖南的风气，开通得较早，士气也比较旺盛。另一方面，虽遭到顽固派如王先谦、叶德辉等的激烈反对，但敌不过维新派的声势。一八九七年湘阴范源濂留学日本，主持速成师范班的组织任务。一九〇二年湘抚俞廉三因而选派士绅胡元谈、俞诒庆、陈润霖、刘佐辑、颜昌峤、李鉴丞、仇菱生、余经贻等十余人赴日本学习师范，以建立兴办学堂的基础，这是湘省遣派学生出国的第一次。这一批学员毕业回湘后，湘省公私立学堂，因之次第兴办。胡元谈由东京宏文师范六个月的速成班学成归国后，对日本庆应义

*唐耀章系明德中学学生、学生会主席、新民学会会员，后从事新闻工作。已故。

塾的创办人福泽谕吉非常的崇拜。认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效法日本的维新，最急要的是兴办教育，遂决心不做官，不入党，立志创设私立学堂。因和他的表亲攸县龙璋（硯仙）、龙绂瑞兄弟筹商，并得绂瑞的父亲，前清侍郎龙湛霖（芝生）的赞助，捐资两千元，作为开办费，首创明德学堂于长沙，租凭城北左文襄公祠堂宇为校舍，于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湖南有私立中等学堂，实自明德开端。

二、创设时期的新旧两派的斗争。

明德开办之初，招中学甲、乙两班，共八十人。聘请刘佐楫、周震麟、陆鸿逵、李步青、许兆魁、张继、王正廷、王体、陈凤光、金华祝、苏玄瑛（曼殊）、翁又拱及秦效鲁等担任教席，多是维新派的有名人士。并邀请黄兴（克强）由沪回湘，主办附设的速成师范班。由胡元侠、龙绂瑞分任明德学堂正副监督，龙湛霖任总理。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加以自前清咸同以后，许多文官武将，出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称为所谓“中兴功臣”。他们退職回籍后，形成了一种特殊势力，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不敢得罪他们。因此，绅权之大，经常能够左右一切。当湘籍留日学员，纷纷回省办学的时候，这班所谓士绅中，有一群特别顽固的分子，拥护王先谦、叶德辉和孔宪教等，强烈反对开办学堂。而一般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坚持中国要救亡图存，首先必须多办学堂；于是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在教育界表现得最为突出。明德创设的初期，所聘教职员，都是维新革命派，隐然成为新派的中心，遭到了以王先谦、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公开指责，并分布爪牙兴风作浪。如明德聘请的教员刘佐楫，原系胡元侠在东京宏文师范的同学，并曾出钱二百串，作为明德开办费。这时却依附了王先谦，他利用地理教员周震麟在历史教员陆鸿逵的学生课卷上手批的奖励语措词激烈。便乘机唆使学生单启鸿通过其

兄启鹏的关系，转告王先谦向巡抚赵尔巽密报，诬陷明德师生昌言革命，蓄意造反。结果周震麟被迫离开明德，与一部份学生，在长沙马王街另创修业学堂。这证明明德是当时教育界新旧势力，互相争斗最显著的场所。胡元侠当时基本上倾向于维新革命的。看到这种情势，通过龙氏兄弟的斡旋，和清廷官方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当时湘抚赵尔巽曾到校视察，明德受到奖励。再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颐，长善学务处总办俞浩庆，都是胡元侠留日时的同学，也均有往来。胡元侠就这样利用官绅权势，与顽固派作斗争，借以维持明德学堂，并掩护维新革命分子在学堂的活动。同时更与龙湛霖、谭延闿等商量，另租西园龙宅西侧房室为校舍，开办经正学堂，另招新生两班，作为第二基础，聘李步青主持其事。因此，明德与经正，名义上是两块招牌，而在实际上是同一个组织。

维新革命时期的明德

明德创办初期，受到各方面的资助，建校工作开展顺利，规模逐步扩大。这时中学师资供不应求，地方小学还没有兴办起来，于中学之外，附设速成师范班，并增设理化博物选科，及高初两等小学。因左祠房室不敷分配，另设分校于西园周氏花园。在这九年间，由于先后获得清上海道袁树勋和奉督赵尔巽（由湘调任）各捐助一万元，并拨给泰安里官地三千余方为校址，因而在上海购置了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一九〇五年湘抚端方资送明中甲班全体学生留学日本。一九〇六年开办东语理化专科。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四年间，泰安里新建校舍次第落成，规范渐具，以“坚苦真诚”为校训。龙砚仙依明德校训作《坚苦真诚四箴》，因此建筑“四箴堂”（即礼堂）。再由于清督端方的赞助（时端调任两江总督），一九〇八年在南京设立江南高等商业学堂，为明德毕业生升学之所。在这段期间

内，关于明德的政治立场，有两面的情况，需着重加以叙述。

一、华兴会与明德的关系。

明德在开办时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拥护维新赞助排满革命方面的，华兴会组织中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这种关系的发生，是以黄兴为核心的。黄兴应胡元侠的邀请，于一九〇三年秋季，由沪返湘，主持明德附设速成师范班的教务兼任小学的博物、地理和体操教员。但黄兴自日本返国后，即蓄志革命，因接受胡元侠的邀请，实拟借明德为掩护，以从事革命活动。当他教地理时，在发给学生的每本地图上，都题了下列一些词语：如“空怅望，山川形势，已非畴昔”；“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今也日蹙国百里，呜呼哀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等等。充满了爱国和革命热情，对激发学生的革命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受过黄老师的教导，在明德小学毕业的，如阎鸿飞、万理、宾镇远等，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军，成为各地辛亥革命的骨干。一九〇三年十一月，黄兴在长沙秘密结合同志，组织华兴会（即华兴公司，地址设在城南），大部份成员多系当时明德的教职员及明德、经正两校的学生。教职员中主要的有张继、周震麟、陆鸿逵、苏毓璠、翁汎、苏玄瑛等。再如李步青、陈介、陈凤光、沈迪民、王正廷、金华祝、陆鸿宾、陆鸿弟及辜天佑等，也都是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实际参加的。明、经两校学生，加入华兴会的也很多，最突出的有肖翼鲲、杨继忠、胡瑛、宁调元、陈嘉佑、张启汉及姚洪业等。胡元侠和龙硯仙、龙绶瑞等，虽没有参加华兴会的组织，但都站在赞助的立场。华兴会以联络新军、会党、组织武装起义为目标，开展革命活动，即假明德为秘密机关。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明德理化实验室里，由理化教员日人掘井觉太郎协助，秘密制造的。一九〇四年，黄兴与刘揆一、马福益及

华兴会同志秘密商妥，决定于阴历十月初十日，趁西太后七十七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万寿宫（即江西会馆）行礼朝贺的时候，予先把制就的炸弹，埋藏在拜垫底下，待时爆发，一网打尽，乘机占领长沙，作为革命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十月初三为星期日，当胡元倬和黄兴在陈介与日教员的寓所谈话时，忽有校工来报：协台率队数十人来校，欲见黄先生。黄知事败，避匿西园龙宅内室中，得龙氏兄弟和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于某日夜半易服出城，乘一小舟至靖港，事先由胡元倬借得三百元作旅费，在靖港换乘日清公司轮船“沅江丸”，脱险赴沪。此一情节，胡元倬在《题黄克强先生遗墨》一文中所述甚详，摘录于次：“忆前清癸卯（一九〇三年）夏，学校开办方一学期，倬赴杭约华紫翔兄来湘授英文，在沪遇克强，方自日本归国，因约其来明德共事，欣然允诺。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邀张溥泉（继）为历史教员，吴绶育、李心原辈皆来湘小住。因陈星台代印，并发行其所著《猛回头》、《警世钟》，长沙府颜钟骥欲借此倾复明德学校。时湘抚赵次山（尔巽）虽去职，张筱浦（鹤龄），余寿臣（明颐），金仍珠（还），皆任湘省府要职，共同维护，使事未扩大。克强遂决心革命，辞明德教员职务，实行秘密活动。反对明德学校之巨绅，致书湘抚告密，指明倬与克强，道腴（周震麟）三人为魁，有速即拿问，分别审讯，明正典刑之语。湘抚将函交臬司，寿臣密告倬，遂与组安（谭延闿）莫溪（龙绂瑞）商由芝丈（龙湛霖）致书湘抚，力称克强之贤，倬又于龙宅，约克强与筱浦相见，谈论极洽。旋赴抚署云，方至龙家晤黄某，粹然儒者，职亦可以身家性命保之。倬大放心，住校理事。一日下午，克强仓皇挟一手枪至校，见倬云事又闹大了。（前为印书事，长沙县索克强，亦居校得脱）同赴龙宅。筱浦呼倬去，言得真据，发兵拿人，并言颇受湘抚黄备。倬从容谓筱浦曰，

诸事我均与闻，君如愿升官，吾之颈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拿我就是。筱浦以手击桌曰，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向保护他们。其表目情，大出筱之意外。旋与余寿臣（兵备处总办）商，由黄溪尽一夕之力，将凭据焚烧。俞次晨呼著名缉匪武官杨明远，严谕无证据不许拿人，事遂缓。……”不久，黄兴赴东京见孙先生，遂成立同盟会。

二、立宪派与明德的渊源。

明德既为黄兴组织华兴会的策源地，对辛亥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它又是立宪派的一个据点，这显然是很大的矛盾。它的由来，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借此为革命作掩护。二是胡元倬办学主要是为明德募集经费，只要能替学校筹款，都可兼容并包。立宪派与明德的渊源是这样发生的：一九〇三年，明德开后办的第四个月，即是年七月，茶陵谭延闿，从北京翰林会试回湘，应邀来明德参观，当即表示赞助，并愿为学堂负筹措经费的责任。由于他的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这时已辞职回籍，谭延闿又取得了翰林的头衔，想利用热心教育做幌子，来提高他在士绅的地位。这与当时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发生关系。可是谭钟麟也是一个顽固派，不愿出一文钱办学堂。谭延闿的妻子方氏，出身官僚地主家庭，陪嫁的金器首饰很多，谭就兑换了一部分，用来资助明德，除捐助开办费壹千元外，另外每年资助壹千元，作为聘请英文教员的薪金。胡元倬因赴杭州，聘华紫翔来湘教英文。后谭任湖南省咨议局议长，成为立宪派的首脑，也就成为胡元倬依靠的支柱，当日立宪派的重要份子如曹典球、粟勘时、廖名缙等因谭的关系，都先后担任过明德的教职员。一九〇五年五月，龙侍郎湛霖病卒，谭延闿继任明德学堂的总理。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的三年中，明德次第兴建校舍，总计达拾万元以上，除补助费，及银行贷款叁万数千元外，都系谭借垫。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

清室逊位。胡元倬于先一年（一九一〇），奉派为留日学生监督，胡元倬于是年三月东渡，明经旧生在日本东西京大学专门卒业者近四十人，会宴“富士见轩”胡写有纪事诗七绝一首云：“江户樱花对客开，楼前呼酒漫停杯，不辞烂醉为同乐，眼底觥觥尽异才。”同年十月辞职返国回湘。谭延闿以立宪派的首领，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并与国民党发生了关系。民国成立，改学堂为学校，称监督为校长，总理谭延闿改称董事长。谭氏先后三次督湘，始终与明德没有脱离关系。这因为明德是湖南创始的中学，逐渐成为中等教育的核心。谭氏在政治活动上，欲得湘省教育界人士的拥护，明德能起带头作用。胡元倬则利用谭的地位，在筹款方面，能得到很多的方便。直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谭氏患脑充血卒于南京，这时谭任行政院院长，兼代国民政府主席。是年十月十五日，明德全校师生还开会举行了公祭。胡谭两人的关系，一直很为密切。这也就是明德与立宪派（后改称宪友会）承接下来的渊源。并因谭在辛亥革命后投靠了孙中山，明德也就靠拢了国民党。

五四运动时期的明德

明德自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一阶段中，因民国成立，明德经正两校，已无分设的必要。首于一九一二年，将经正合并明德，分设初小、高小、中学及专门（分商业、政治经济两科，并附设法政别科及银行专修科）四部。一九一二年经北京教育部批准，在汉口设立明德大学，一九一三年，改设于北京，赁乾面胡同房屋为校舍，聘章士钊任校长，旋由李锐继任。并以校产向实业银行抵借五万元，扩充长沙明中泰安里的校址，增建校舍。一九一五年，全国私立大学在北京举行成绩展览会，明德大学列第一。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叛国，大学两班学生，适于此时毕业，因暂行

结束。一九一七年，教育部奖给明德“成德达材”横匾一方。一九一九年，重设大学部于汉口，赁大智门礼和洋行制革厂为校舍，以向绍轩为副校长。作者系于一九一七年秋季考入明德旧制中学第十三班，于一九二〇年暑期毕业，升入汉口明德大学商科。在明德肄业期间，正值响应“五四运动”，发展到“驱张运动”，（北洋皖系军阀，湖南都督张敬尧）的时期，是有关明德校史在中期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在一九六三年所写“湖南学界驱张运动的前后”一篇资料中，曾将明德的活动摘要叙述。本篇系将明德校史作较有系统的纪录，爰就我在明德，从“五四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亲身经历，有重点的分述于下。

一、明德是五四运动的先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夕，明德除设有专门部及高初两级小学外，这时中学部第九班以前的班次，都已毕业。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阶段，陆续发展到第二十三班，约共有学生八百余人，旧制中学到这里告一段落。从第二十四班起，改为新制初级中学第一班。在一九一九年暑假，原中学部主任何衡辞职，由谢真（号祖尧）继任。谢原名振鹏，新化人。一九一〇年，毕业明中旧制第四班，这时自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归国，负起了主持明中的责任。胡元倓虽为校长，总揽明德各部的行政，但终年出外募款，在学校的日子很少。有时筹款返湘，例召集全体中学生，在四箴堂训话一通。主要的内容是希望学生不辜负他鞠躬尽瘁，专诚办学的磨血精神。

（胡元倓曾对黄兴说过这样的话“养成中等社会，实为立国的根本，但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办教育，则是磨血的人”）发扬光大“坚苦真诚”的明德校训。谢真在教学方面，采取严格的管训制度，由管理张鹤仙（新化人，绰号张胡子）担负总责，抓紧“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教

条，作为训育学生的唯一纲领。在这时期，继明德而陆续创办的私立中学已经很多，组织成立了湖南省教育会。胡元侠曾一度被推举为会长，虽未实际负责，但明德在当时，实为湖南中等教育界的重镇，一切行动，都足以影响各私立中学。所聘各科教员中，如语文汪根甲，刘永济（宏度），英文赵鸿钧（运文）、黄子通、张康候。地理王凤喈、张根青，博物曾省斋、辛树帜。伦理魏青璋、张效敏，均属知名人士，这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属于明德教职员方面的阵容。属于学生方面的，明德学生自治会成立的时间比较早，对各私立中学起了领先的作用。但学生自治会主要的内容是所谓“砥砺品德，联络感情，互相学习，加强体育锻炼，开展课余活动”等等，都是属于学校内部范围的。因此，各个中学的自治会，也就没有联合的组织。自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与日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以后，明德及中等学校渐有“国耻讲演会”的活动，但尚未直接与政治斗争发生关系。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为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大举游行示威，由爱国锄奸，进入到反帝反封建，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接着在一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告总罢课。湖南的学生界，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明中的同学们，更是义愤填膺，尤其是得到毛泽东的训勉和鼓勉。回忆在五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来临明德，约集学生自治会负责同志在学生会客室谈话。参加的有柳厚民、左景釜、陈伟器、毕磊等同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对明德同学的鼓勉，主要有两点（1）应继承革命传统的精神，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带头罢课，并加团结，发动组织“学联”，明确认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2）分析了张敬尧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必然会施行镇压手段，明德同学要不畏强暴，要做打倒军阀的主力军。自治会的各班代表，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都斗志昂

扬。当即由各班代表联名，如五月二十九日（日期记不准确）在大礼堂召开了中学全体大会，专门部并派有代表参加，经同学推举，我为临时主席，群情愤激，一致决定，坚决抵抗学校当局的压制，实行罢课。并斗垮了一撮反对罢课，思想顽固的同学，以李维湘、何涇渭等为首，所组织的“同求会”。比即成立“明德学生会”，撤销“学生的自治会”，我被推为学生会的会长。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谢祖尧、张鹤仙及李维湘，都不敢出面阻挠。明德罢课后，即由学生会派出代表，分赴全市尚未发动罢课的各中等学校联络。于六月三日，实现总罢课，揭开了湖南学生政治斗争史的第一页。就在这一天，由各校推出代表，组织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明德系组成“学联”的骨干。明德在罢课期间，首先联合中学专门及小学三部组设“提倡国货会”，印发国货一览表，并推动同学张耀鉴、货少谷、王道傅、李达瑞及肖禄等担任调查员，积极参加各界组织的“国货维持会”的抵制日货运动。再则组合了十五个以上的“十人讲演团”，由杨特（宙康）、毕磊、翟凤辉、刘作舟、殷建华、李介民及张璞友等分任团长，我担任总领导的责任，上街作挨户爱国宣传。并在坡子街福祿宫（今坡子街小学）及玉泉山、玉皇殿、开福寺等处，演出新剧《朝鲜亡国鉴》。学校提前放假后，回乡的同学分别组织《某某乡镇爱国讲演团》。七月中旬，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以学联的名义发行。湖南的学生运动，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由单纯的爱国运动进展到反帝反封建，及文学革命的方面。《明德旬刊》紧接着《湘江评论》出版，带头响应，推动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号召，由我和何硕曼主编。各学校的小型白话刊物，纷纷相继创刊。在这一阶段，明德学生是站在五四运动的最前线，成为先锋的部队。

二、明德是驱张运动的前哨。

明德由于华兴会的关系，和谭系的渊源，（详见上文）在

政治方面是向国民党靠拢的。因此，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统治下的北洋军阀，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对先后督湘的汤芗铭及傅良佐，一直是站在反对的地位。傅良佐被迫离湘后，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继任湖南督军，箠制舆论，摧残教育，搜刮民财，草菅人命，无恶不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更施行严厉的镇压。由于这样，湖南学生在响应五四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发展到驱张的斗争，明德学生是驱张运动中的主力。这时我加入了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自驱张运动的酝酿到爆发期间，我都代表明德，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一九一九年九月，湖南学联开始了驱张的秘密活动。当时各校在暑假后已陆续开学，而“学联”则已被张敬尧明令解散。由于明德、一师、商专及湘雅等校积极活动，终于冲破了军阀的压力，在十一月中旬，重新公开地组织了湖南学联。在重组学联的宣言中，已揭示了军阀政府的罪恶，树立了驱张的先声。十二月二日，由学联发动的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的焚烧日货示威大会，明德被推为主席团之一。张敬尧（即所谓张四帅）到会，驱散开会的群众，把我们站在主席台上的各校同学赶下来，并大骂男女同学做土匪。明德参加大会的学生队伍回到学校，认为是奇耻大辱。当即召集学生会干部紧急会议，决心与张敬尧作坚决的斗争。带头再发动总罢课。并于十二月六日，与周南一师等校首先实行。不到一周，长沙市中等以上的学校第二次总罢课就实现了。总罢课形成后，学联公开的发布了“驱张宣言”，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口号。组织“驱张代表团”，由每校选派代表二人至三人组成。明德推定我和柳厚民、左景鉴三人为代表。这时北洋皖直两系军阀，内哄正烈。学联因派遣代表，分赴衡阳、常德向吴佩孚和冯玉祥请愿驱张，并分派代表赴京、沪、穗等地，扩大以驱张的声援。由明德学生会向学联建议，将各校寄宿同学的膳费全部截留，提作

补充代表旅费之用。因总罢课后，距离寒假还有一段时间。这个建议得到各校同学的赞助，发生了作用。赴省外请愿驱张的代表，就都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陆续出发了。另由各校留校同学选派代表，组织“驻省驱张团”，由明德、湘雅及长郡等校负主要责任。确定湘雅同学张维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后张维赴上海，团务即由我主持。中心的任务有两项：（1）转述各地驱张请愿的情报，编成油印的《驱张通讯》，分发各校学生会负责人，转知各同学，并向新闻界联系；（2）油印“张毒祸湘罪状”，并于末尾加注一行阅后请互相传递的字样，用报纸一份份的包好，由我和柳厚民及长郡代表吴长生等，秘密向各商店散发，以引起广大人民的痛恨。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携带一批张毒祸湘的罪状，放在人力车坐板底下的车桶内，我坐在车上去南郊，车行至南门口，被放哨的卫兵喝令停车，将我周身搜查一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答不是学生是百姓，因为没有搜到什么东西，才怒气冲冲地将车喝走。我那时真是提心吊胆，幸而没有揭开车桶，否则就险遭不测了。一九二〇年六月，张敬尧被驱逐去职。谭延闿三次督湘。湖南学生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驱张运动，完全取得了胜利。明德学生在整个驱张斗争的过程中，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哨。

何键督湘时期的明德

明德自一九二〇年，学生驱张运动胜利结束，至一九三七年，湖南省主席何键去职。在这一段期间中，首先是中学部主事谢真，于一九一九年，因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罢课，借考察教育的名义，重赴日本。一九二〇年暑假期返校，仍继续负责主持中学部的教务。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明德建校二十周年纪念，由教职员集款，于学校池塘建立楚辞亭，并发行《湘君》文艺月刊。这时吴芳吉（别署白屋词人）主持语文教学，

提倡写新诗，蔚为风气。一九二六年，汉口大学部因款绌停办。计办理七年，共毕业本科七班，学生一百〇四人，预科四班，学生九十八人。肄业商科第四及第五两班学生咨送湖南大学毕业。同年长沙将小学及专科两部停办，专办中学并扩充班次。一九二九年，谢真兼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以一九一四年，毕业中学第五班的余劲，总揽校务。是年得国民政府批准，于俄庚款内拨给壹拾伍万元，兴建“乐诚堂”（即教学大楼，因胡元侠晚年别署乐诚老人。）于一九三二年落成，学校规模日具，并恢复高级小学。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为明德三十周年纪念日，湘省政府给予奖金八千元。校友陈果夫、刘永济、周安汉及钱元咎等四十人，撰赠创立三十年颂词。明德于此阶段，体育方面：历年参加省运动会的结果，统计获得排球、网球、棒球、足球及田径赛共三十三次优胜奖，而取得全省冠军的计六次。一九三〇年，代表参加华中运动会。并取得所谓全省高中以上学校，军训大检阅的冠军。学业方面：一九三二年七月，湖南第一届中学毕业会考，明德高初中四班参加，全部及格，平均成绩列第一。其中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均考入国内著名大学。历次教育部及省教育厅视学报告，与社会舆论，均认为成绩优异，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反动军阀何键据湘期间，明德在政治上的表现，有下列的两个方面：

一、CC派系的重点。

湖南的私立中等学校，一直是与政治、党务方面的各个派系有着联系的。胡元侠平生虽标榜不做官，不入党。但由于明德传统上的渊源，并图达到筹募校款的目的，也就不能不有所依靠。明德创办的初期，由于黄兴的关系，与华兴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络，因而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占有了一页。再由于当时为了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又与立宪派（即宪友会）相结

合，而宪友会的首领谭延闿，企图得到教育界的支持，以巩固和提高其政治地位，也就以明德为依托。民国建立以后，谭系投靠了孙中山，明德因而接近了国民党。何键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统治了湖南九年。在这一段时期，明德董事会的董事长谭延闿逝世，由张溥泉继任。而陈果夫实为董事会的中坚人物。陈幼年名祖焘，于一九〇五年，在明德附设高小第一班毕业，他的兄弟陈立夫，也曾在明德肄业（班次记忆不清）一直与明德有密切联系。两陈在何键据湘期间，是国民党中央CC派系的首脑。为了企图控制全国的党务，将CC的组织遍布于各省市，着重以教育机构为发展的对象。因与明德的关系很深，而明德在湖南中等教育界，已形成了领导的地位，正适合CC的要求。明德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在中央和地方的声势，也就互相利用，成为CC在湖南活动的枢纽，以扩充CC在湘的宗派和权利，占领了湖南省党部阵地。彭国钧，谢祖尧、王凤喈、曾省斋、及陈大榕等，通过胡元侠做桥梁，先后由国民党中央派充湖南省党委。彭系明德董事，一九〇四年，毕业明德附设速成师范第一班，谢系明中的主事，王、曾、陈等都是明德的教职员，因而都系CC在湖南的骨干份子。在“七七”对日抗战以前，一直掌握了湘省党务的实权，各市县的党务，都为CC派系所操纵，从而中小学的教职员，大部分都与CC有关连，胡元侠本人，在表面上虽超然于派系之外，实际是在走CC路线的。因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多来湘，曾在十一月七日，到明德参观，并题赠“止于至善”的横匾一方。当何键据湘期间，明德实为CC在湖南的重点。

二、反何运动的核心。

明德在何键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内，既为CC派在湘的支柱，因而在反何斗争的方面，实为策动的中心。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国民党湖南省的党务，完全被CC派的势力所笼罩，

一般称为“甲派”，又名“钻子派”，（因为甲字象钻）这一派系的主要人物，为彭国钧、张炯、王祺、李毓尧、王凤喈、谢祖尧、陈大榕及曾省斋等人。明德的系统占主要地位，已详上述，都是一直坚持反何斗争的。还有所谓“乙派”又名“皮刀派”（因为乙字象皮刀）。以谭常恺、毛飞、刘岳厚等为首领，则系依附于何键的，但在湘省党务上，只能属于附庸，不能占有优势。这时胡元倬以湖南教育界的元老资格，具有号召的力量。在因而绝大部分私立中学，都并于了CC组织的范围。又何任内的省教育厅厅长，如黄士衡、曹典球及后来任职较久的朱经农，都是经过胡元倬同意的。在朱任职阶段的教厅主任秘书夏开权，系CC的嫡系，也就是明德在湘的常务董事。由于这样，湖南中等教育界，始终采取与何键不合作的态度，支持“甲派”对何的斗争。何键惟恐动摇他在湖南军事与政治上的地位，不敢对教育界施行强暴的压力。何曾几度拟到明中，讲演所谓“八德教育”，借以自重，都未能实现。何键企图争取湘教育界对他的拥护，曾拟利用他的嫡系谭常恺，出任湘省教育厅厅长。胡元倬听到这个消息，即写信给陈果夫坚决不同意。陈将此信放在蒋介石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后胡元倬复去南京，强烈反对，谭终致失败。这里还有一段轶事，记得谭常恺赴南京，运动任教厅厅长的前夕，想和胡发生联系，有一天邀我同去见胡，代为先容。当时胡住在明德进头门靠右手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我先敲门进去，并申述九思（谭常恺的号）同来，想见校长，胡连忙要我拒绝，只说有病，不能会客，谭只得悻悻而去。后谭改任湘建设厅厅长，又遭到CC的打击，停职十年。七七事变发生，何键终于去职。在反何运动的斗争中，明德实起了核心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明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帝国入侵芦沟桥，华北沦陷。谢真辞却明德副校长兼秘书职务，专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由一九一〇年明中第四班毕业校友、董事周安汉继任。兹将明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阶段，分述于下。

一、抗战疏散的搬迁。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了上海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重庆，这时武汉岌岌可危，长沙准备进行疏散。各中等学校都拟订了迁移计划，明德迁湘乡霞岭曾祠。此时日寇还只进苏皖，因此，没有作全校尽徙的打算。先运去教学、办公及员生必须的床桌教具等项，合共二十多船，余均扁存乐诚堂的四楼。曾祠系分做三个部分，中间隔着一条小溪，溪东是焕新堂，溪西是敦富堂和涵养堂。但由于年久荒废，蒿绿汲胫，重加铲修整葺后，以敦富、涵养两堂为高中部，焕新堂为初中部，并赁民田一丘为操场。胡元倬在长沙议决迁校后，就国民政府临时参议员之聘，赴汉飞渝。在陈介写的《明德话旧》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抗战伊始，政府议设‘国民参政会’行政院长张岳军先生（群），从事组织，网罗贤达，共济困难，偶与余谈湘中人物，余以胡先生对，先生应聘，毅然就之。”不久，周安汉辞付校长兼秘书，由一九二〇年明中第十二班毕业校友何泾渭代理校长，废除副校长制。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晚，谣传日寇迫近长沙，湘省府主席张治中，张皇失措，实行焦土政策，纵火焚烧全城房室，即所谓“文夕大火”。明德除乐诚堂及第一、第三宿舍幸存外，其余校舍都付之一炬。胡元倬在渝奉命回湘慰问，并查究真相。因病由胡迈代表，于十二月中旬抵湘，慰劳灾民。关于查询情况，非本文范围，兹不赘叙。明德迁校霞岭后，因教职员子弟无处读书，于

一九三九年又再恢复小学。招高级小学“五一”及“六一”各一班，初级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各一班，校址设距在离中学部五里的“肖望公祠”。一九四〇年，何泾渭辞职，俞劲代理校长。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前十一时，胡元侠因患脑充血，在重庆歌乐山八块田寓所逝世，年六十九岁，著有《修身约言》及《耐安言志》四集，前三集曾刊行，现都已散失。胡在叔伯昆仲间排行第九，因毕生奔走南北及南洋群岛等处，为明德募集经费，曾为募款向清上海道袁树勋下跪，因而有“胡九叫化”的绰号。晚岁入蜀，任国民政府临时参议员，还刻有“暮年烈士”的印章。继配王氏持家节俭，先十年病逝（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能诗、刊有《晚晴集》。长子胡牧，据闻现在北京银行界服务，次子胡毅，现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三子胡微为音乐专家。当一九三二年，胡元侠自顾精力渐衰，预立一遗嘱，书明德维持员及继任校长姓名于内，封寄校董陈介收藏保险篋中。（胡与陈为至交，一九〇四年，坚聘陈任明德教职时，也曾一次屈膝，胡的两次下跪，是过去教育界人所周知的，因而有“南方武训”之称）。经过几次修订，至一九三九年，始成定案。胡卒后，于一九六四年移柩回湘，葬岳麓山。一九四〇年冬，陈介适出柏林，将胡遗嘱，摄影缄寄校董会，启视继任校长，为胡迈、谢真、刘永济三人，因而胡迈继任明德校长。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胡迈偕同校董周安汉，到麓岭就职，但因担任湘省府财政厅厅长，兼田粮管理处处长，不能兼顾校务，仍由何泾渭代理。一九四二年，前副校长谢真返校，继续负责总综校务。明德自一九三八年迁校麓岭就职，至一九四三年已届六载，规模渐具。但山区僻壤，交通不便。是年胡迈归自陪都，莅校会商，决定再迁衡山晓南港，周安汉校董新建的宋祠。屋宇高爽，光线充足，讲堂优于麓岭，惟宿舍较窄，附小则因人力房室都感缺乏，停办。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明德

在周祠补祝四十周年校庆，胡近偕教育厅长王凤喈由耒阳来校，参加庆祝典礼，校友及各校赠送的纪念品甚多。当时有在校服务四十周年的老工友倪玉昆，由校方赠给奖品，加发工资，并受到全体师生的敬礼。六月倭寇大举南犯，企图打通粤汉路线。长沙、湘潭、衡山及衡阳相继沦陷。这时谢真已先期假返新化，由教务主任胡少燿，偕同教职员及学生于九月二十日，出走到安化兰田。谢真由新化赶到，召开校务座谈会，会议决假国立师范学院的校舍及校具，筹备复学，（因此时国师已迁校溆浦）。同时并赁距兰田四十里樟梅乡的刘姓房室作为退步，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复学。一九四五年四月，倭寇进犯新化，兰田震动。四月十一日九时半，谢真，周安汉及胡少燿等率领学生五百余人，分队仓皇出走，十二日上午十时抵樟梅乡，至二十三日，在刘宅因陋就简，继续上课。学生大半星散，至十五周，始陆续到齐。八月十一日，倭寇投降，复迁往兰田开学。以上系明德在抗战疏散期间播迁的概况。

二、抗战复员的设施。

明德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倭寇投降后，从樟梅乡仍迁回兰田国师复课，由教务主任胡少燿代理校长。自一九三八年至此，经过五次迁徙，开始筹备复员长沙。泰安里的校舍，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文夕大火时，还存有乐诚堂及第一、第三宿舍，侥幸未被焚烧。后因第九战区兵站处为仓库，储存军用品，被倭寇侦察机发现，肆意轰炸，于是全部校舍，仅余断壁残垣，尽成瓦砾。经先派员返校，择要修葺，并北向湘春马路开辟校门。由事务主任沈杰赴晓南港周祠，运回图书仪器及教具、床桌和什物等。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教职员等偕同在兰田的学生雇民船三艘下驶，十二日抵校。于三月十六日开学。乐诚堂的教室，大寄宿舍房室、及浴室、盥所等，都于是年下期赶修完竣，并自备发电机，以改善灯光。十一月三日，

谢真病逝，决定于长沙设立常务董事会，以彭国钧、龙绂瑞、胡迈、胡庶华、周安汉、余先励及夏开权七人，为常务董事，推定彭国钧为主任。一九四七年，因湘春马路校门，不便于取水进粮，且延误兼课教员上课时间，又不能实行门禁，另于泰安里新建头门，以利生活与教学。为提高学生程度，聘陈崧涛为教务主任，添购图书、仪器、及药品，以供课外阅读，及教学实验之用。教务部增聘教务助理员，实行混合考试。并增聘初中导师六人，夜间实行监修，以转移读书的风气。张董事长溥泉，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病逝，改推陈果夫继任。再这一年的四月一日，为明德四十四周年纪念日，按照胡元倓的遗嘱，在乐诚堂举行明德第一次校友会会员大会，由胡迈主席，修正通过校友会章程，选举理监事，结果张平子、唐耀章、王先德、周绍洛、王隐雄、李国继、侯厚培、周煦秋、周惠连等九人当选为理事。陈铸新、潘基珩、陈子钊、王前、贺家汾等五人当选为监事。正式成立了校友总会。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各部分的校舍如图书室、理化实验室及总办公室等，均逐渐竣工。关于体育用具和刊物标本等，也都渐设备齐全。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解放，校务仍由胡迈主持，曹赞华任副校长，周八百任教务主任。我担任初中一年级语文教员，当时教职员的阵容，处我记忆所及的，有周士钊、陈崧涛、周绍濂、袁鹤皋、杨忆慈、王培心、王昌猷、苏忠谋、王禹卿、王孝迪、王先德、李允恭、罗平、周煦秋、李旬云及曾三吾等，一九五〇年，参加了长沙市中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学习，并组织了工会。一九五一年秋季，明德结束，改为长沙市第三中学，转入了为人民教育服务的光明前途。

结 束 语

明德为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自一九〇三年（前清光绪二

十九年)创立，迄长沙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秋季结束，改为长沙市第三中学，具有四十八年的校史。综合大学、中学、小学、师范、专科、预科、并经正学堂，约共办有一百七十余班，毕业学生约六千余人，连同肄业学生，总数达一万人以上。由于有关校史的记载，多已散失，钱无咎写的《明德校史》早经绝版。以上仅就作者所得知的材料及亲身经历，概括为五个时期，择要叙述。着重突各个阶段的政治环境与立场。再明德创办人胡元倬，为过去湖南教育界轴心人物之一，并将其事迹附带的扼要叙入，备编辑湖南教育史资料的补充与参考。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胡元倓侧记

陈 恂 涛*

胡元倓字子靖，湖南湘潭县人。从堂弟兄行九，一般称他“胡九先生”。他于一九〇三年春创办明德学堂，同年秋，为避旧派倾陷，又另设经正学堂。至一九一二年仍合并为明德，改称明德学校。明德学校分设专门、中学和小学三部，除专门、小学二部陆续停办外，中学部一直不曾停办过。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〇年改为长沙市立第三中学，一九八四年又改为明德中学。胡元倓曾于一九〇八年任留日学生监督，一九二九年任湖南大学校长，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终生为明德校长“以明德为生命”。我在明德中学连续工作过十五年，三次作教务主任，两次作训育主任，并一直兼任语文教学。因工作的关系，我和胡元倓先生比较接近，因此稍知他一些思想、言论和行谊，把他撮要记载出来，希望能从一个教育家的侧面，反映出明德学校和当时湖南教育方面的若干情况。

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

一九〇二年，胡元倓被湘抚俞廉三选派到日本弘文师范学院学师范教育，那时正值日本进入东亚称霸的时期，经济、军

*陈恂涛曾任明德中学教务主任，建国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已故。

事文教各方都有飞跃的进步。而中国从一八四〇年起，屡遭列强侵略，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在这种强烈的形势对比下，爱国志士们有的想搞君主立宪，有的主张革命救亡，有的提倡教育救国。胡元琰便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便不能打碎那个腐败的国家政治机构，一切改革无从谈起。他常说“革命是打乱了再做”，但他又认为革命也只能打乱，而不能再做，再做的任务要由教育承担起来。教育才能培养建国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只有通过这千千万万人才的努力，才有可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特别是日本搞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后改庆应大学）为明治维新提供了许多足以担负国家重任的有用人才的实际范例，对他的感受极深，鼓舞极大，使他的教育救国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使他由一个教育救国的理论者变成一个实际行动者。当黄兴、周震鳞一些人在明德暗中革命的时候，胡元琰就理会到他们和自己的事业之间除有一个救国的共同点以外，还存在着差异。他曾同黄兴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终生以“磨血人”自许。对于教育造就人才的收益，他体会殊深。我记得他在一次演说中引用管子的话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他这次讲话，请当时一位语文教员周味道为他板书，他一边讲，一边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和“一树百获者人也”两句话旁打了许多圈，并举巴斯德发明蚕瘟的科学预防方法，使法国还清了普鲁士的战债而有余的事例，他说：“从表面看，教育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要教育能达到成德达材的任务，为国家造就有用的人才，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种需要发奋努力的艰苦事业——磨血事业。中国的建国问题，非这样不能解决。”在他看来，明德学校是“磨血人”的磨子，他希望这

付磨子能够磨拢许多报国的人才，他用尽毕生的心血去推动这付磨子，也是这付磨子磨尽了他一生的心血。

人生大不幸碰到胡子靖

明德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胡元谈是一位穷拔贡，明德在创办初期遭遇的困难是一言难尽的。校舍问题：从龙湛霖侍郎捐让几间房子办开始，一移左文襄祠，再扩充到朱剑凡出货的花园，终莫基于泰安里。守旧势力接二连三的颠复活动：从分设经正，辞追刘梅作到争取到张鹤龄、端方的同情支持，算是勉强渡过了。惟有经费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这个难关就要靠胡元谈这里请津贴，那里求募捐，左挪右借来渡过。

先说津贴：明德开办不到半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来校参观，大为嘉奖，就月给津贴千两。过两年后，端方继为湘抚，除豁免明德借公家的一笔贷款外，还月加津贴三百两。民国成立，前清度支部腾一笔饭余金，明德分得八万元。湖南教育厅对明德的津贴一开始就是甲种，一九二四年以后升为特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华教育基金会津贴万元。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大学院按月补助两千元。最突出的是中俄庚子赔款拨给十五万元，中英庚子赔款拨给四万元，抗战时期的中央教育部又月增津贴二千元。

上述津贴也不算少，特别是中华教育基金和两笔庚款，全国私立学校当中只有明德和南开得到过。但是应该指出：第一，有些津贴是从一种企业盈利和税收附加派生的。比如清末赵尔巽对明德月给千两，是从湖南铜元余利项下开支的。到一九〇七年，湖南停止铸造铜元，这笔津贴就无形取消。又如湖南教育经费从一九一二年以后至抗战时期，完全依靠盐税附加；在过去内战是常事，战争一爆发，盐税就要断绝或减少，切肉连皮，附加自然要受影响，这是给津贴带来灾难的一个方

面，即便是和平时期，没有内战，但全省的盐税也是有限度的，而公私立学校逐年增加，因之津贴就不能持久稳定。第二，在北洋统治时期，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而湖南地当南北之冲，更是受祸最深。地方教育经费，被这些割地称雄的军阀全部中途提取，还哪里有什么津贴！第三，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想掠夺湖南的盐税，何键统治湖南，又想夺取地方的教育经费，虽由于全省教育界誓死力争，没成事实，但可见津贴的动摇性很大，学校随时都可能关闭。这些情况是新社会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正因为如此，胡元陔就不能不另外筹款。再说这些津贴也不是凭空发给每一个学校的，要在学校的成绩，信誉和物质建设等一定的水平之上；去钻、去争，去多方请托，才有可能分得一杯羹，否则就要向隅。这些工夫一贯是由胡元陔包干的。

所谓另外筹款是怎么筹的呢？

第一是募捐。明德本来是靠人捐款办起来的。一九三五年寒假，少数远道学生留校，我曾于旧历除夕组织一个学生晚会，请胡元陔谈明德掌故，他说：“我癸卯三月初开办明德学堂，由我姻丈龙芝生（湛霖）捐二千元，表兄龙研仙（璋）、黄溪（绶瑞）兄弟各投一千元作为开办费，社会上说明德姓胡，我说明德实际姓龙。不久谭缙庵（延闳）用他老太太的钱捐一千元作购置费，又另捐一千元作聘请英文教员的薪水”。这是亲戚朋友捐款的例子。后来推广到达官贵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两广总督端方、上海道袁树勋和清宗室振贝勒等人先后捐助巨款。进一步他又向银行企业和巨商大贾劝募，得到中国、交通、金城、大陆和湖南实业等银行、哈尔滨交通航业公司以及湖南淮商公所等企业的大力帮助。一九二二年他到南洋群岛槟榔屿和新加坡等地的向爱国华侨劝募，得款不少。他回忆学校在一段时期的困难情形说：“有一次，一期只能发给三个月薪水、

职员同人见谅，自动提议起折发薪。有一次比这更糟，我只能在期终对每位教职员送一把宜兴茶壶，作为纪念。”以后在学校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他有时只得向学生家长或趁某种宴会拿出捐簿，当场劝捐。早期的学生家长如黄锡光、谭长生、较晚的如学生欧阳平坤的家长以及社会人士也有乐于捐助的。自然也有个别的人不乐意解囊，又苦于不好拒绝，于是造出“人生大不幸，碰到了胡子靖”的话来，一时流传很广。我记得一九三七年，他请春客，酒后谈天，他曾说：“我办明德，向人家磕过两次头，请袁树勋捐款是第一次（第二次后详）至于请振贝勒捐款，更有喜剧性的排场，因为‘大人好见，小人难见’已成为官场中的一种习气，我从小就生得憔悴，不象一个官儿的样子，又不讲究穿着，这位亲王的门上看不起我，一连几次挡驾在门外。后来我才借人家一件貂皮褂褂和蒲饰袍子穿在身上，雇一辆漂亮马车，临时又请十六名呵道，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直奔亲王府——这样才见着他。”

津贴不可靠，募捐时有时无，而明德不能不办，不能不扩充。胡元倌的第三着棋便是借贷。或是向本地政府借，或是凭学校的抵押、校长的信用向银行借，这种借款有的还了，有的由债权人免了。提起这事，我记得他还赞美过一些人慷慨、大方。对比之下一九三三年明德三十周年纪念，湖南省政府只给奖金八千元，他觉得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有一次他到南京找端方，想通过他向南京裕宁官钱局借款过年，钱局不付现，他便转往九江官钱局提取，等他到九江时，已是年关逼近，那里也不肯兑。他曾和我们谈起：“一生借钱以这次最为狼狈，风雪横江，使人闷绝，侥幸当天接到本校一个电报：有办法，我才松一口气。等我回来，才知道并无办法，只是谭组庵（时为明德总理）怕我寻死。这电报确实救了我一条命，年关也就这样将就过了。”对私人借款也是他常有的事，特别是

对学生借钱不讲客气，非借不可。有一次刘永济筹足了四千元，准备留美，亲人为他钱行了，并在曲园（现在长沙走马楼）照了相，当日就要动身。胡元侠从汉口回来知道了，他一口气跑去找刘说学校困难不能解决，你的留学费用，我要挪用一下，缓一下出国没关系，你一定要救我这一回急！刘永济向来敬重老师，只得借给他，以至终生牺牲了这次留学的机会，而师生之间因此相得益彰。又一次他找明德大学毕业生李凤池借钱，开宗明义说：“是不是学生，就看这一回借不借钱给我。”现任文史馆员涂开舆也曾经是他的债权人。这种事情不胜举。

胡元侠筹款永无止境：津贴已是甲种，就请特种；请了省津贴，还要请中央和部的津贴，募捐几万了，还想几十万。但这一切款项，他自己分文不取，只是想吧明德办好，安定了，就要扩充，扩充了，就要请好教职员，中小学办好了，就要恢复大学。一年一度的水灾，还使他想起跳出泰安里这个水窠子，迁往三汉矶，筑一栋中心大楼，一个礼堂，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健身房，一劳永逸。他的计划是个无底洞，所以他的筹款活动也永远无休止。为了筹款，他不避严寒酷暑，不计成败，风尘仆仆，不以为苦。记得一九三五年底，他和楚怡学校校长陈凤荒相约同往南京筹款。并于事前定好了舱位，可以由长沙直达南京。忽然前一天刮大风下大雪，轮船公司派一个职员来问：“陈凤荒先生不到南京去了，你还去不去？”当时我和谢祖尧、余先砺正在他那儿聊天，只听他说“陈凤荒不去，我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他的听差！”

我是侍候学生的

一九〇三年明德刚开办不久，一天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来校参观，学生们正在自习，教室里鸦雀无声。赵尔

巽非常感动，认为这是教训的工夫作得好，非旧式私塾所能及。他大加褒奖胡校长一番，称他办学有方。胡元谈一再逊谢，只说“我是伺候学生的。”我到明德以后还常听见他讲这句话，这时才知道这是他办学校的重要精神，也才逐步理解这句话所包括的内容：一是指学校的基本建设，如校舍、教学设备和膳食；一是指教职员阵容整齐。他对于教员整齐是办好学校伺候学生的重要环节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不止一次和我们谈过：“学校里只要教员整齐，学生便乐于受教，进步于无形，而职员可以腾出手来从其它方面作增进学生品质和康健的事业，才可以使学生进德修业，三育并进。相反，如果教员程度不够，阵容不齐，学生无尊师之心，不能受教师之益，甚至引起风潮，职员将会忙于边压边哄，补苴罅漏，疲于奔命，无以自其说，弄得职员也因而失掉信仰，转成众矢之的。一切问题常从此起。

他常以明德的教师一般不错而自豪。如早期的教员黄兴，我记得龙莫溪先生说：“克强博学多能，白天上课娓娓动听，教图画他还能替学生改稿；晚上就革命去了。”张继教历史，周震鳞教地理，苏曼殊教英文，许奎元教数学，很受学生欢迎。陈介主持附小，兼为日本教员助教（翻译），学生也很敬爱。后来他要辞职，想继续留学。胡元谈曾说过：“我为了伺候学生，曾当众向他磕头，请他再干一期，他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他奈我这对膝头不何，只得又蝉联一期”。

胡元谈为了请教员，肯下身段，这种精神曾使很多人感动。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张伯苓还向明德师生赞扬过他这种朴素肯干的精神。

胡元谈请教职员无路界，无派系，以人才为标准。一九三六年夏天，事务主任唐极献讲笑话：“今年的明德教务主任余先砺，湘潭人，是中路的；训育主任陈盛涛，常德人，是西路

的，我，衡阳人，是南路的，一路一个，真凑巧。”这本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也是作笑话讲的。胡元谈听了，却不以为然：“我办明德，向来不分路界，唐主任的话不要传开了，人家造谣生事。”在明德工作过的人中有东洋留学的，西洋留学的，北高、南高、武高和湖南高师的，也有北大，中大和中山的，这是不分派系的最好说明。同时，他对组织明德校友会也采取保留的态度。他曾说：“如有事实上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临时召集当地校友座谈一下，如话家常，解决某些具体困难，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须随会随散。我去北平，南京，上海和汉口等地就是这样作的。如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组织，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胡元谈为了“伺候”学生，聘人还有一套特殊作法：一是挖，那就是人家的好教员，他不惜通过种种手段，挖到明德来。如郑柏新本是兑泽中学的得力教员，校长彭锦云是明德的学生，他就是倚老卖老，要兑泽放让，把郑柏新挖过来。又如教务主任余先砺到教育厅作科长去了，胡元谈就征得前省立四中（设在常德）校长向玉楷的同意（实际上不同意也得同意），把他的教务主任马文义挖过来。二是拉，有些名手，甲校想聘，乙校想聘，但结果总是被明德拉过来。比如谢祖尧从东京高师毕业回国，范源廉本已介绍他到成都高师去教书，却被胡元谈从中拉过来，还责备范源廉不扶植桑梓教育，又说谢祖尧忘本；不到母校服务。谢祖尧就和我谈过这件事。三是挡，有些人若想从明德挖人出来，胡元谈不同意是走不了的。大约是一九三四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增设体育督学一员，朱经农拟提明德体育主任何涇渭去担任，被胡元谈大说一顿：“何涇渭是由我津贴，送到南京高师去为明德培养的，我的人你不能挖。”

在聘教员这一方面，由于他争胜的心理过强，乃至于好高

臂远，不惜高抬时价。如远东运动会的十项运动冠军杜荣棠，在粤汉铁路局工作，胡元倬想方设法把他聘来教过一下短时期的体育。在一段时期内，全国注重英文，明德的课程除国文、中国史地以外，几乎全都是英文课本，采取直接教法。胡元倬还从上海、香港或从湖大请些教授如胡安恂等来校教课，薪金都特别高。冼星海也被明德请来教过音乐。

总的说：在组织教员这一点上，他认为办好学校的重要一环，是他“伺候”学生的具体体现。

不参加政治 但过闻政治

我来到明德工作以前，总天真的认为胡元倬是不过闻政治的。又无知的认为教育可以超然于政治之外。我到明德以后，才听到他说：“办学校的人一定要过闻政治，我不参加政治，但过闻政治，否则我就会变成一个瞎子和跛子，我的学校就办不成了。”

这几句话，当时我的体会并不深刻，又认为他一生不作官，只短期作过一次留日学生监督，是为了明德要请教员，卖仪器。这可以作为他不愿意参加政治的注脚。既不参加政治，为什么又过闻政治呢？怎样过闻的呢？那时我和他共事尚浅，还很难拿出事实。后来共事久了，根据一些线索，渐渐地觉得他实际上是参加政治的。清末他同湖南方面大吏如赵尔巽、端方、黄忠浩和张鹤龄、余明震等，打得火热，也为后来拥护革命党人打下很好的基础。湘籍京官如张百熙、徐树铭、地方官如袁树勋等，都和他有一定的友谊，为他办校开辟一些道路。一九一一年十月焦、陈被害、谭延闿一则喜，一则惧，不敢冒然上台，胡元倬是从谭的床下把他拉出来捧上台的一个。谭延闿督湘三次，有些内幕，他是过闻过的，特别是对教育和财政上的措施，他是争取过闻的。陈强作谭延闿的参谋长，一

次和我谈起：“胡九先生和谭祖庵的关系极深，有许多事他是入幕之宾，不过他自己不露面不上台罢了。”后来赵恒惕和谭延闿翻了脸，对胡元愬也非常仇视。

大革命以后，明德早期的教员如谭延闿、张继、陈介、周震麟、陈其采、学生如陈果夫等人都已经通显，很多求官的人走他的门子。在这些过程中，他有次说：“周佛海太躁进，‘一二八’以后，他既想搞交通部长，又想搞湖南主席，还通过向复庵请我领衔保举，我虽不谓然，也盖了两次公章。”

最突出的是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要老毕（名成，一个跟他多年的老听差，北京人）交一封信给我：“今晚有要事奉商，请予八时枉过一谈。”根据老例，我以为是商量学校内部什么事。殊不知我届时前往，客人只有两个，赖琰和朱经农。胡元愬向他们介绍了我以后，便向我说：“我们今晚谈一件向中央控告何键的事，请你代拟呈文。”我问“告他那几款呢？”朱经农说：“他干预教育的事很多，九先生是一位老教育家，当以这方面的材料为重。”赖琰又补充：“他在党务方面插手的情况也可提一提，九先生声望高，他向中央说话，可以一言九鼎。”接着朱经农讲了长沙县教育局局长陈幼鸣一案，第一师范校长谢祖尧被撤职一案；赖琰又讲何键想保黄家声作教育厅长的阴谋……他们还讲过一些什么，也不记得了。胡元愬就我要根据这些内容写一呈文。第二天早上十点我把呈文稿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说：“得意急书，很好，等我找彦炜（他堂侄辈好后，交给果夫，面呈总座。”

他和何键的关系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是过得去的，并以湖南大学校长一席相邀（那时湖大还是省立，校长由省遴选）。以后就恶化了，他曾因此在南京住了几年，不肯回来，回来以后，关系也没好转。一九三五年上期，明德举行毕业礼，何键还想扭转僵局，自己来观礼，胡元愬避不见面。胡元愬为学校筹款是

无孔不入的，独公开向人表示：“我不要何键的钱。”同时还声明不向何键荐人。这都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紧张呢？据我了解：第一，他是受了甲派的影响。甲派反对何键，又利用胡元倓作他们的盾牌，本来甲派的角色多是他的学生或曾在明德工作过的人，彭国钧、谢祖尧、王凤喈、曾省斋和张炯这些人经常来告何键的状；湖南党务，教育行政方面的头脑又多同情甲派，这种气氛无形中把他包围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他比较容易接受甲派不利于何键的薰染和宣传。他有一口闲章，刻“听微堂”三个字，在明德的老同事们时常引为谈助：“胡九先生就是爱‘听’甲派的‘微’言大义啦。”一方爱讲，一方爱听，讲的人推波助澜，添油加醋，听的人潜移默化，深恶痛绝，所以使他与何键中间的一道墙壁越筑越高。

另外，一九三〇年红军进城的那天上午，他曾亲去会何键，当时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彻底破裂，胡元倓探询前方战事消息如何，要不要避开一下，何键答复说：“前方战事很好，我不离开，九先生也不必离开。”殊不知当天下午何键即已离省逃命，红军晚上即已进城，谣言四起，害得胡元倓割须弃袍，宁汉之间还谣传他已遇害。谭延闿还要教育部长蒋梦麟准备为胡元倓开追悼会，从优议卹。这件事使他对何键非常痛恨。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所以他热心向中央控告何键。后来谢祖尧也知道这件事，曾说：“这是中央撤换何键的先兆，有意要湖南绅耆说话作为张本。”果然，不久张治中主湘的命令就发表了。

我们如再从胡元倓和某些人物交往的角度上，探索他与政治的关系，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比如他最怀念，称赞的人有两个：黄兴、谭延闿。我们常听见他说：“克强雍容有大度，组庵绝顶聪明。”黄兴早死，与他有关的史事不多；独谭延闿和他的关系维持最久，从清末起，至整个北洋统治时期及国民

政府初期，直到谭死为止，约莫三十年之久，彼此来往极密，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得到谭的照顾与帮助。明德学堂早年向外借款，谭总作保人，有两笔钱是谭用省库结余垫还的。汤芎铭督湘时，教育遭受了推残，私立学校都朝不保夕，谭时已赴上海，元谈是通过他居间，居然和汤化龙搭上关系。谭与化龙同为翰林，同为湘鄂省参议局长，有相当交情。汤化龙致书其弟芎铭，要他在湖南对元谈另眼相看。汤芎铭祸湘时期，对革命党人恣意仇杀，惟对胡元谈优予照顾，并曾捐几万元补助明德。后来洪宪事起，各省选国民代表，湖南初次名单本有胡元谈，汤芎铭说：“他是个办教育的，不宜于搞这一套。”于是勾去他的名字。胡元谈有一次想找黎元洪捐款、题字、想来想去，还是要请谭帮忙，谭时在青岛，回信说：“弟子黄陂（指黎元洪）求乞已多，苦难应命，不如就近找汪闲止（汪诒书，长沙翰林，自署闲止老人，与黎有旧）也”。

胡元谈对谭与龙绂瑞等人，具有一种魔力，使他们心甘情愿作他的走卒而不辞，或于规讽之中寓关切之意。前者的事例是：谭、龙和旧派与王先谦、叶德辉的交情本来不坏，只是为了胡元谈才和他决裂的。谭对这事有坦率的自白与忏悔：“葵园（王先谦）以争铁路事，与我辈过从甚密，后之参差，则以明德学校——为胡子靖故也。实则经师闾于世故，为肤受之愆所蒙，迄今思之，多可惜者”后者的事例：当叶德辉、符定一把持省教育会时，在会长选举问题上，胡元谈与他们有直接的矛盾。后来他们又明目张胆搞筹安会，胡元谈极力反对，说他们是一群攀龙附凤的妖孽。谭曾劝他：“与恶势力斗，弟每为公危。”。一九三〇年，谭死前有信给他：“弟每感于国人之无教育，同辈中惟公为有职业，有历史，不可不勉”。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厚友谊，胡元谈在谭的子女面前，常以非同泛泛的父执自居，经常通过谭曼意（谭的女儿，陈诚的夫人）找陈

诚。在张治中主湘以前，有一个时期，他曾说：“陈辞修（陈诚字）可能来作湖南主席。”这说明了政治上的一些微妙关系。

驱张运动发生以后，胡元倌在汉口暗中策应，驱张运动的代表们北上请愿，就是以汉口明德大学为枢纽的。

其次，和胡元倌关系较密的人，我想要数陈介和陈果夫兄弟。陈介早年在明德学堂作日文翻译和附小主事，这是他们定交之始。后来陈介由日德留学深造回国之后，在政治、外交方面渐露头角，无论在政治、经济上，他都可以给胡元倌以支持，特别是明德大学在汉口开办时期，有很多问题都是依靠陈介解决的。如校址，先设在俄租界的道胜银行，后来迁至汉口洪春里，都是陈介为之筹划奔走。开学以后，经费每苦不继，听说有一年到了重阳还不能开学，就地借款又是陈介的帮助最多，因为当时他任江汉关监督，在汉口银行界走得途途是道。正因为这些关系，胡元倌和他拉得很紧，请他任明德的董事。胡元倌往来汉口、上海、南京之间，总是住在他家里，对烛长谈，每到深夜。一次陈介问他：“明德学校是你心血交瘁的产物，在社会上已有很深厚的基础和影响，你百年以后，这学校交给谁继承？无论传子、传贤，你都该该先有个打算和交待，要后死者执行，才可以长远维持这个学校于不坠，你的精神才可以不死。”这一席话使胡元倌感动得流泪。他当即决定：“你的决定是最好最对的，我的打算和交待该该随时写成书面条文。交给后死者作为我的遗嘱执行。这份遗嘱我决定随写随寄，托你编次保管，死后开拆，予以公布。”陈介接受这个委托。一九四一年冬，胡元倌死于重庆时，陈介在德国柏林任大使，任内果如其意，拆开他的各封遗嘱拍照以后，以原件邮寄回国。从这些具体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深度。

至于陈果夫，他是明德小学、中学的毕业生。因他叔父陈

其采在明德教算术，远从吴兴把他带来读书，陈果夫还讲过这段历史：“我祖母原不赞成我到长沙来读书，我父、叔只得用用计，向祖母撒个谎说：‘我们在庙里求只签再说罢，吉利就去，不吉利就罢了。’第二天清早他们就装着从庙里抽签回来的样子，对祖母讲：‘签文极好，大吉大利。’我祖母才准我叔父把我带走。”胡元倓也说过：“果夫初来上学，我抱过他。以后他写履历只有两条，一是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毕业；二是上他交易所职员。”在蒋家天下陈家党时期，果夫窃据要津，弟兄两对胡元倓优礼有加，对胡元倓的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后来明德向中央要求津贴，特别是摊分庚款十五万元，果夫出力最多。果夫他们曾也想利用老师在湖南的地位和声望，替他们组织一帮人，作为他们支配湖南党务和教育的一股实力。胡元倓一次极力怂恿黄士衡加入国民党，黄到南京述职，陈立夫又通过胡元倓请他吃饭，意在拉他入彀。黄曾反问过胡元倓：“你介绍我入国民党，您自己呢？”胡元倓答复：“这是你们壮年的前程问题，我倒犯不着了。”

从表面看，胡元倓不作官也是事实，比如一九一二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推荐他作教育总长，他敬谢不敏。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曾邀他作教育司长，他掩耳即走。张伯苓曾特别赞扬胡元倓的胸襟淡泊，足为人师。这是有事实根据。但并不等于他自己所标榜的不参加政治。

点 滴 言 行

我还想起胡元倓生前一些言行，写出来也可以增进人们对他的了解。

我第一次会见他，是一九二七年正月，他住明德进门靠北一幢窄而矮小的土房里，一连三间，窄而长，孤伶伶的，既无地板，又无套房。一九三五年秋，我到明德工作，那栋雄浑壮

丽的乐诚堂已经建成，而他还是住在我八年前初次见他的那幢房子里。他夫人（王夫人，能词，著有《晚晴集》）在世时，家里有一个时期没开火，他们就搭学校食堂的伙食和茶水。夫人死后老毕是他终生的伴侣（老毕后来患精神病而死。胡元谈病时，他可以代胡元谈写信，字迹还有几分相似）。有一次胡元谈病了，龙绂瑞来看他，看到阒无一人，责备他的儿媳：“九先生如果死了不知时间，你们可担不起骂名！”他病好以后，却并没有加雇仆媪。一九三〇年以后他才有一辆六成新的人力车，那是大陆银行总理傅丽行送的。寒天冷冻，我看见他只烧一个苏州火缸取暖，一袋敝裘还是他的学生周安漠送的。

他对学生极为严格。看见学生不合规矩要斥责。彭国钧一次对我说：“我在经正毕业的那一期，打着赤膊在油印室印东西，被胡九先生看见了，把我大骂一顿，我简直作不得声，其实他只比我大几岁呀！”正因为如此，他律己也同样严格要求，他同我说：“要管人家，先管自己，我每到办公室去，一出房门我就要摸摸颈项下面的扣子是不是扣好了。”

胡元谈一生专一于一种事业——教育事业，不旁驰外骛。在这一种事业面前，他不知道受了多少冷嘲热讽，折磨打击，困顿颠沛，但他从来没被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所吓倒，也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认为这种事业总是有希望的，只有百端忍耐才可以战胜困难，仿佛先是山穷水尽，硬过这一关，便是柳暗花明。教育总是要办的，办了教育，纵不成功而死，也是有意义的。他这种信心非常坚强，曾请王闿运为他写横式两块：一为“忍耐为希望心”，一为屈原成句，“虽九死吾犹未悔”，以自惕励。他并刻一“从苦打击”的石章以表示他的乐观与坚定。我认为这些是胡元谈毅力、精神、经验的自白与总结，一点也不夸张。

在旧社会，湖南是一个私立学校比较发达的省份，这与胡元谈的鼓舞，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和我们谈起过，他鼓励朱剑

凡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创办周南女校。胡元侠自己始终为周南的董事，董事长，给予帮助不少。周震麟、彭国钧办修业学校，陈润霖办楚怡学校，方克刚办妙高峰中学，都或多或少与胡元侠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些学校树立风声，全省各县纷起景从，推其实际，有人简直说“元侠是湖南私立学校的母校。”上海复旦大学的开办，他是校董。抗战时期，外省好多大学始迁湖南，再迁西南（如北大、南开、清华、交大、商学院等），当他们在长沙时，胡元侠大力支持，并要我们从各方面竭力帮助。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去见他，是与一位私立中学校长同去的，胡元侠热情地说：“办学校的都是同志。凡办学校要有恒心，要慢慢来，不能希望今天创办，明天、明年就能办好。”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到明德工作以后，看见他集宋明学案句，请严修为他写一付对联：“持之以恒，化小为大；行之以渐，融异为同。”我才进一步体会他的精神，也受到教益。

胡元侠热情而爽朗，言语不多，别有一种热诚对人，如自肺腑中出，他的爱憎好恶，坦率地摆在脸上。明中学校的任何一个胜利，会考军训、球赛以及一年一度的考入大专学校的升学百分率……他都以关切和喜悦的心情对待。对某个教职员的长处，某一个学生的才能，他都如数家珍，寄以欣赏，每树大拇指称道不绝。至于所亦恶，亦不假以词色。我和他参加过一些集会，发现他熟识最多，周旋应接，给人一种热烈的冲击，使人觉他得在大人物中不渺小，在小人物中不伟大。后来他在重庆开国民参政会，《大公报》说他和张一麟“须发如雪，四座风生。”这描写是恰当的。对一些请他帮助的人来说，题字，题词最易，请写榜书较难，他坦白地说：“我的大字写得不好，你定要我写的话，我就要舍侄彦炜‘煞枪’（意谓代替）。”请他经济上资助较易，有时人家在病患为难之中，他常找上门去给以接济。请他写荐牒较难，但

有些人他又常请他推荐。他都明白表示，从不转弯抹角。我记得一次有人请他写信找陈果夫要事，他说：“你搞党务工作不相宜，我不答应你的要求。”一次有人请他写信给朱经农，想得到省四中学（时在桃原）校长之缺，他说：“不行我已经推存向复庵了”。

有个晚上，我们几个教职员在他那儿聊天，就学制、教科书和文学几个问题谈开了，他的一些议论和插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中学生最好五年毕业。三三制多花一年时间。中间多一层升级的关卡，在教材上多一层迂回复习……这是非常不必要的。”他接着告诉我们：“教育部准备委托我们办一个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我认为这很好，我想一定会成功。”讲到教科书时，他极反对当时的小学课本。”他说“如今的小学识字课本第一课是人手刀尺，纯从笔划简易着眼，没有想到他在学生的头脑里面会起什么作用。很明白，这四个字只能使儿童从自己身上看到人手和摆在桌上的刀尺，这只能使学生变成一个鼠目寸光，胸襟狭小的人。这个严重后果，我们搞教育的人要予以充分正视。日本的小学教育便不是如此，他们的小学识字开宗明义只教‘山海’两个字，这显然不是单纯从笔划难易看的，而是着重从下一代儿童思想人格的后果看的，要他们如山之高，如海之深。我初到日本如此，我作留日学生监督时如此，听说现在还是如此。在这种对比之下，我们该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小学的课本有必要重编写，这个关系非常重大。”他对语文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折衷的，既不一味复古，也不一味趋新，认为古典文学要学习，语体文学也要学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传统的遗产要继承，语体文学也要发扬。他说：“在文字写作上，我今天不感觉有什么困难，还是得力于几卷老书；白话文也有好处，说理记事深切著明，为空架子古文所不及。”停了一会，他又举他亲身的经历说：“我为石

醉六《跋黄克强先生遗墨》，就是一篇白话文，意到笔随，写得痛快，古文不能透澈明白。我将来还要写几篇白话文嘞。”我猜想他可能是想写篇关于民国开国和明德校史的文章，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他就死了。

明德在创办三十周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声誉日隆，以致有“南有明德，北有南开”的传颂。一九三四年天洋旧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来校参观，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湘省之教育》一文，对明德称道备至，说：“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寄宿生之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学生重工作，习勤劳，如……如泥瓦工人也。”针对这一事实，胡元倓每说：“我们全体教职员要益发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才对得起全国的舆论。”并镌一口“戒慎恐惧”的石章以自勉，兼以勉同人。

记得一九三六年下期他请得一笔英退庚款回校，随即开了校董会议，商量使用这笔款项改建校舍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和方案：一种主张把现有房屋除乐诚堂以外，一律拆毁、从新改建校舍、大礼堂和图书馆。其规模和风格要与乐诚堂调和、相称。另一种主张将现有校舍全部出售，连同这笔津贴，另在三汉矶购地新建校舍，既永避水灾，又可增开教室，扩大招生名额。胡元倓倾向于迁校三汉矶，半年后抗战事起，陈果夫来校参观，并向师生讲话：“明德应作到能招收学生一千人，教师人力、教学物力才不虚费。”其时胡元倓血压高，正在湘雅养病，听到这个说法，非常兴奋，迁校的决心更大。等我和何涇渭去看他时，他说：“只等战争结束，我们决在三汉矶新建校舍，乐诚堂还是中心房屋，替我留这一纪念就够了。礼堂仍叫四箴堂，用以纪念龙研仙；图书馆命名组庵馆，用以纪念谭延闿；健身房就叫克强房，用以纪念黄兴。”。

朱剑凡和周南女校

杨 澍*

在古老的长沙城西北角泰安里，有一所占地八十多亩的园林。这在二十世纪初，要算全城首屈一指的苏州式园林了。相传唐代有一个名叫刘蜕的进士在这里住过，所以又名“蜕园”。园的南部临通泰街为一大住宅，园的北部引水为池，叠石成山，有一拱形石桥飞架池上，后取名为“思源桥”。绕池的四周，建起八十多间房屋，空坪隙地，栽种了四季名花，加上古树凌空，鸟声清脆，环境十分清幽。这所名园属于宁乡朱氏。朱家少爷朱剑凡，是个思想进步的新式人物，他不甘于过优游闲适的无聊生活，有心干一番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他卖掉了宁乡的田产，又献出这所园林。一九〇五年，在这里创办了“周氏家塾”，一九一二年以后改称周南女校。湖南第一所女子中学在这里诞生（注）。

八十年过去了，现在这所园林已完全改观了。旧式庭院变成了现代学校，一座五层高的现代化的科学馆耸然矗立，宽敞的健身房，明亮的教学大楼，梯形的电化教室，教学设施成套地排列着。一栋六层的教师宿舍，代替了昔日低矮潮湿的小平房。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那座古色古香的六角小亭——思源亭。它在幢幢高楼的包围中，以它经历的风雨沧桑，成为周南

* 杨澍原系周南女中高十七班学生，后从事教育、新闻工作。建国后为《新湖南报》记者，现已离休。

学校历史的见证。

周氏家塾与周南女校

一九〇四年，朱剑凡先生在日本学完师范归国后，立志要办女学。他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拔于黑暗”。但在那清王朝龙旗将要倒下的年代，虽然科举废除了，洋学堂办起来了，然而对开办女学还是禁止的。有人在一九〇三年办过民立第一女校和淑慎女校，但一开办就被清政府勒令停办了。朱剑凡先生利用封建制度下开办私塾是合法的传统，于一九〇五年，在长沙泰安里园林私宅办起周氏家塾。最初只收本族亲属，以后招收外姓女学生。这时原在民立和淑慎两校的女学生，都进了周氏家塾，家塾共有学生三十多人。虽然命名“家塾”，清政府还是不放心的，经常派人来“视察”，因此师生不得不随时提防和应付。每个学生除课本外，还得准备一套“四书”，若官府来人“视察”，学生得马上把新课本收起，把“四书”摆在桌上，教员也就改授“诗云”“子曰”了。初办时，男性教员居多，男教员上课，得垂下帘子，把师生隔开来，讲课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做到“男女有别”。这样做固然是受了封建旧礼教的影响，但也是为了让官府抓到把柄。封建顽固势力是决不让步的，他们看不惯女孩子上学校，说什么“抛头露面”、“男女混杂”，大逆不道，还对办学的朱剑凡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年仅二十多岁的少爷办女学心怀叵测，“周家花园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周家绳（即朱剑凡）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不然他为什么要办女学呢？”其实朱剑凡是看到办男学校的大有人才，而办女学校却无人过问，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方设法办女学校的。他要用科学文明，唤起妇女的解放意识。他虽然年轻，对学生关怀备至。他言行庄重，作风

正派，是教育界的楷模，是反封建的前驱。那些流言蜚语和恶毒攻击，丝毫无损于他，反而更坚定了他办好女学的决心。

一九〇七年，清政府严禁女学的命令稍微放松，朱剑凡取《诗经·国风·周南》之义，于一九一〇年将家塾正式定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朱剑凡自任校长，徐特立任小学部主事兼师范部主任，伟大的民主革命家黄兴，捐银千两，帮助扩建校舍。当时学校除办师范部并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外，还设置了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几年间发展达四百多名学生。辛亥革命后，由当时政府批准更名为私立周南女子学校。一九一六年停办师范部，改办普通中学，学校正式定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这就是湖南第一所正规的女子中学。一时名师荟萃，除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前来协助办学外，革命家张唯一、周以栗、陈章甫，全国著名诗人吴芳吉、国学家李肖聃、唐梅村等，都来周南任教。这些前辈们在教育界树起了一面反封建的旗帜，把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余孽打得落花流水。

五四运动以后，朱剑凡对周南女校施行教育改革，强调科学和新文化教育，主张学生自治，主张学生言论、信仰自由，鼓励学生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学生思想转为活跃，创办了以反帝反封建及解放妇女为内容的刊物《女界钟》，向警予、蔡畅、陶毅、劳启荣等十三名同学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新民学会，积极向邪恶势力进攻，这些引起了当局的仇视。马日事变后，周南女校被封闭，朱剑凡遭到搜捕，被迫远走日本。

一九二八年，周南女中恢复办学，由朱剑凡的留日同学李士元出任校长。在白色恐怖下，虽然锐气有减，但弦歌未辍。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几经搬迁，长沙大火又使大部分校舍化为灰烬。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六年，这二十年艰辛的岁月中，周南女校饱经风雨，师生们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但朱剑凡校长

的创业精神和教学方针深入人心，鼓舞了后来者，许多校友在大学深造后又返回母校任教，周南的事业在艰难中有所发展。

一九四八年，由校友周昭怡任校长。长沙和平解放后，周南由人民政府接办，由朱剑凡先生的侄女朱超任校长。其中曾一度改名“长沙市第一女子中学”、“长沙市第四中学”。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由湖南省教育厅呈报教育部批准恢复“周南”的名称，以便继承并发扬革命传统和教学特色，促进学校更大的发展。

八大少爷到革命教育家

徐特立同志是朱剑凡先生的学生，也是创办周南女校的大力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他对朱剑凡先生极其敬佩，他曾说过：“象朱剑凡这种人，出身于贵族书香的子弟，良田上千，房屋成街，怎么会主动为穷人谋幸福呢？怎么会自觉地走向这条共产主义道路上来的呢？这是大奇迹！”据说，朱剑凡先生的家族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相传原赣南明宗室吉王有一后裔，得到湖南宁乡道林大屯营旅赣周氏族人的庇护，认为己子，于是隐去朱性，改从周姓，带回大屯营避祸。以后此人子孙繁衍，人丁甚多，朱剑凡就是继承这支血脉的。他原名周家纯，父亲周达武原是炭子冲一带采煤为生的矿工，后来投入湘军长期有军职，将历年积累的资财，在原籍宁乡道林一带购置田产万余亩，并建筑一座冠甲湘中的城堡式大庄园（现为宁乡石家湾乡办公地），同时又以巨资购得长沙泰安里占地八十余亩苏州式园林作宅第。一八九四年，朱剑凡先生随父丧回湖南，全家就住在这里。辛亥革命后，周族人报官恢复朱姓的很多，朱剑凡先生到民国后也改姓朱了。

朱剑凡先生虽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但他却不满意那种穷奢极侈的生活。他的生母姚氏本是一个贫农家的女儿，周达

武率领湘军入川时，把她掳掠过来，做了他的第三个姨太太。姚氏来到周家后，一直受着大老婆的鞭挞虐待。朱剑凡由于是小老婆的儿子，在家里也受到歧视。这些不幸遭遇，对朱剑凡先生的刺激很深，他因此十分憎恨封建家族制度，十分同情妇女受压迫的悲惨境遇，因而促使他与封建家庭决裂，促使他热衷办女学，支持妇女解放。他结婚之后，立即要求分家，在蛻园西南角开门，另立门户。安置了母亲姚氏和妻子之后，自己则东渡日本留学，企图解决他心里大惑不解的许多关于人生、家庭和社会的问题。

他青年时代读过王夫之、魏源和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他的政治思想受了改良思想的影响，限于“富国强兵、教育生聚”而已。到日本后，考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在东京期间，他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结识了黄兴、陈天华、周震麟等民主革命斗士，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受周震麟的影响较深。周震麟鼓励朱剑凡从事教育救国工作，集结力量支持革命。他在弘文师范学习期间，又结识了胡元侠、陈润霖、杨昌济、李士元等一批留日学生。他们回到长沙以后，胡元侠创办明德中学、陈润霖创办楚怡工业学校，杨昌济离日去英国学习，回国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朱剑凡先生于一九〇四年夏天回国，先在周震麟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教书，一九〇五年才回长沙创办周氏家塾的。他先后将祖传的泰安里园林宅第捐赠为周南校址，然后又变卖私人田产和珠宝首饰来支付办学经费，总共达十一万七千银元之多，他的毁家兴学，在三湘传为美谈。

五四运动前后，湖南教育界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发生了明显的政治分化，有的顽固地宣扬旧文化；有的卖身投靠军阀，而朱剑凡先生却跟随时代前进，与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董维健等一起热心追求真理，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立志改造旧

教育，培养新人才。一九一八年，在新民学会的影响下，朱剑凡、徐特立为首的教育界人士组成了“健学会”。毛泽东著文称誉这个组织的出现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毛泽东《论民众大联合》的文章发表后，朱剑凡为扩大这篇文章在教育界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在健学会发表了题为《排除己见，团结一致，服从真理》的演讲。朱剑凡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为了响应辛亥革命，他剪掉了辫子，砸了家里的神龛和“历代祖宗考妣”的牌位。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是十分坚决的，他发表的《论中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的谬误》这篇著名演说词，曾被毛泽东转载在《湘江评论》上。

朱剑凡不是一个坐而论道而是积极行动的人。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和徐特立一起，团结教育界人士，配合学生的行动，与反动军阀张敬尧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除游行示威和焚烧日货外，还带动湖南七十二所学校一千二百名教职员工进行总罢教。朱剑凡在教育界还带头在周南实行彻底的改革，引导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和社会活动，积极阅读进步刊物，成立“救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周南师生十多人加入新民学会。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朱剑凡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向警予、蔡畅、丁玲、陶毅、劳启荣、周敦祥、魏壁、周毓民等以及朱剑凡的子女朱伯琛、朱觉、朱仲止、朱仲丽等，都先后在周南求学，他们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都走上革命的道路。

朱剑凡经历了教育救国、立宪维新、民主共和、议会民主的曲折道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他在广州参加北伐前的准备工作，在长沙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是一位极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宣传鼓动家，对

湖南的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对湖南的教育事业，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徐特立同志说过：“朱剑凡在清朝时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叛变了清朝皇室的家族，拒绝了国民党的官爵，毁家兴学，创办私立周南女校，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经过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朱剑凡与李维汉、王震、郭亮、夏曦等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大革命失败后，朱剑凡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家产被抄，周南女校被洗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朱剑凡抱有必胜信心，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拥护。他从日本回来去武汉避难，后来转居上海，仍抱病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刊物，参加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他不但向党表示入党的愿望，还把全家老小组成一个战斗小集体从事革命工作。当时上海特务如麻，他把自己的寓所作党组织秘密接头和会谈休息的地点。朱剑凡自己每天挎着篮子外出买菜，侦察四周动静，保护同志们安全。一九三一年，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开了一个小酒店作掩护。

朱剑凡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为了改革教育和从事革命工作，耗尽了心血，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病，以后发展成为胃癌。一九三二年夏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仅五十岁。

周南的办学方针及教育特色

朱剑凡留学日本带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教育方法。但是他没有墨守那一套教育方法，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在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强调要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立志求解放，争民主。他办学有明确的宗旨，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数十年来，周南就是围绕这个方针进行教学 and 管理的。

在招生制度上，他鼓励女子求学，凡未婚及订婚未嫁者都可入学；少数家境贫困还可在校打钟、扫地，半工半读。

关于学科设置，朱剑凡认为师范教育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周南最初办的是师范科及简易师范科，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他还针对社会上鄙视体力劳动和城市妇女缺乏谋生技能的情况，开办了缝纫班和烹饪班，提倡刺绣、挑花和手工劳动，使学生除学文化外，还学习一门谋生技能。为了满足全省各地女子学校对音乐、体育教员的需要，朱剑凡特聘江苏省体育家蔡婉静女士来周南任教，选择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各种成绩合格的女学生，开办了体操、音乐专科班，这些学生两年后毕业，应聘到各地女校任教，受到各校欢迎。蔡畅同志曾在这个专科班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一九一六年，文化风气进一步开化，朱剑凡认识到女学生有进一步的学习要求，应当升入高等学校，与男学生一样获得深造的机会，而当时省内还很少女子普通高中。于是他将师范班停办，改办普通中学，并且设法提高外文和自然科学的教学水平。周南自开办到一九一六年的十一年中，共毕业了五个班的师范学生，其中第一、二班系两年制速成班，其余三个班都是四年制。这批师范生象一颗颗教育的种子，撒遍三湘，开花结果。其中蒋葆荪、蔡珉荪，在长沙创办了幼幼小学，王钰创办了培德女校，李宗莲在湘潭办起了自得小学；陈舜琴回麻阳，向警予回溆浦，在边远县城办了起女校，既传授了文化知识，又撒下了思想革命的种子。此外象吴剑、文惠中、李泳南等都终身致力于湖南中、小学教育。师范班同学的光荣传统也影响到以后的高中毕业学生，象朱超、曹国智、旷璧城、周昭怡、贺益恩、李静等校友，都是在周南毕业后经过深造，在湖南办学的，她们毕业献身教育事业，成为我省著名的女教育家。朱剑凡还注重学校向劳动人民开门；他和徐特立一道，在长沙最早举办平民学校，招收的学生全是

丫头、婢女和贫苦孩子，孩子们一面学识字、算术和记帐，一面学绣花和手工技术，这个办民校的传统，一直继承下来，即使在抗日烽火中，学校搬迁蓝田，民校也没有停办。由于周南办学适应社会要求，毕业的学生品学好，能力强，深得社会赞誉，远近来校求学的日益增多，学生在校人数已达六百多人。要办一所象周南这样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中等学校，需要不少的财力、物力。初创时，既无公款补贴，所收学费也很有限（每学期连学费、膳宿费一起才二十多元）。学校开支全靠朱剑凡校长当田押产和变卖金银珠宝来维持，加上募得少数捐款，也仍是入不敷出。朱夫人魏湘若女士理解丈夫的事业。全力支持办学，毫不吝惜地捐献了自己陪嫁的财物。朱校长还几次跪在母亲姚氏膝下，恳求老人家赞助他毁家兴学的行动。全家人的义举，使学校度过了重重经济难关。民国以后，周南得到政府当局嘉奖，每年补助四千八百余银元，加上学生交费五千三百五十余元，收支相抵，尚不足一千七百余元（据一九一五年教育杂志记载，需要另外设法弥补。朱剑凡无私地献出了全部家产。而他的晚年，大革命后避难寓居上海时，一家生活十分贫困，女儿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自身患胃癌无钱动手术，真是“一身硬骨，两袖清风”。朱剑凡培养人才的伟大精神和毁家兴学的感人事迹，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永远值得人们钦佩敬仰！

周南曾经传唱一首《纪念朱校长》的歌，词曰：“纪念朱先生，纪念朱先生，纪念朱先生之公心，纪念朱先生之精神。清后禁女学，谕旨何森严，非有朱先生，安能有周南。毅然创办，不畏辛艰，独立支持，二十余年，自捐田庄租，千石有零，自捐房与地，十余万金。如此公心，湖南有几人，如此精神，湖南有几人。人心未死，安能忘先生，女权益张，安能忘先生”。一九四八年，校友周昭怡任周南校长时，倡议兴建了

“剑凡堂”，这些都是对革命教育家朱剑凡的永远纪念。

周南之所以办得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剑凡校长选择师资十分严格，但又不拘一格，他认为这是学校成败的关键。他要求教员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高尚的品格。他任人唯贤，招聘新教员须得有饱学之士的推荐，合格者才能发给聘书。既聘以后，发现不能胜任教学或不堪为人师表者，即行辞退，决不循情。凡教学成绩优良，身教言教俱足者，他就礼遇有加，甚至不惜下跪挽留。因此，周南女校声誉极高，名师云集，有的是知名学者，有些是朱校长留日时的同学。为了办好幼稚园和幼稚师范班，朱校长还聘请了两位日本教员佐藤操子和松山雪子，到周南上游戏课和体育课。当时湖南的英文教员很缺乏，他不惜重金，从浙江聘来了谢仁仲先生，教了一学期，谢先生要辞聘回家乡去，经过苦苦挽留仍不答应。为了学生的学业，朱校长竟跪在谢仁仲面前祈求他留下，谢仁仲被感动了，答应继续留校任教，这种尊师重教的精神，一时传为佳话。

朱校长聘请教员，不拘一格，能者为师。如缝纫班教员，就选择了他家附近开成衣店的皮师傅。皮师傅年近六旬，戴着老花眼镜，耐心地讲解画在黑板上的裁剪图样，学生很容易理解。他还从学校工友中选择师资。办事员袁顺生，原是学校的摇铃工人，他会刻钢板，印讲义，教小学生做手工，糊的彩色风筝十分出色。一个吃斋念佛的道婆李淑仪，长于刺绣，朱校长聘请她教刺绣，她自己也在校读师范班。在教学上朱校长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兼教教育学、心理学四、五门课程和全校的音乐课。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从来不辞辛劳。

朱校长对教学，要求启发与练习并重。教员备有预备录（即备课本），或编概要，或列简表，或录参考。并备有教授时录，每小时授课完毕，由教员填注教授要点，学校可以从中

了解教学情况，也可供以后教学的参考。学校还在公共场所设置揭示板（即黑板报），揭示格言、图表、诗歌、成绩等。为养成学生自由阅读的能力，宽敞的图书室储备各种新图书，学生可以入内自由阅读，有疑难时，还有值日教员解答。基础较差或缺课的学生，可进“特别教室”由教师补课。在学校园地，开辟了学级园、公共园、美育园、创育园、纪念树园，使学生从中培养美的情操，讲究公共道德，研究自然现象。各园都由学生自己管理，只有一个教员作指导。我省学校之有“校园”，是从周南女校开始的。每逢春秋佳日，学校组织郊游，让学生饱览祖国河山，了解农村生活，使学生除学好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之外，还从课外活动扩大知识领域，把知识用于实践。周南女校每年还举办成绩展览会，展出学生的图画、刺绣、习字、作文和各科作业。《教育杂志》一九一三年第十二期曾评述周南女学生的习字“男校中如此程度中亦不多得”。在那次展览的作文中，就有论断时事的，有阐述女子参政的，还有专论政党问题的，从文章内容所涉及的范围看，周南女学生的思想是十分活跃的。

朱校长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深深感到“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认为要振兴中华，国民非有健壮的体魄不可。他看到女学生虽然勤奋好学，但体格不强。于是他在抓紧文化学习的同时，大力提倡体育。他除办体育专修科培养体育师资外，还从校外请来体育教练培训球队。学校有篮球、排球、网球、垒球四种，由同学选择练习。以后发展到各班有班队，学校有校队，在课余循环比赛，还与外校球队进行比赛。每春季或秋季举行运动会，除请家长参观外，还发出少数参观券，邀请外校参观。一九一二年第七次运动会，团体参观的就有二十六所学校，其他参观的达三千余人。周南的校队是有点名气的，篮、排球队及田径队参加省、市运动会，经常获得冠军，并且连续三

次夺得华中运动会总锦标。当时明德学校也擅长体育，由于两校都在泰安里，故有“泰安球王”的美称。这种重视体育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即使抗战时期学校迁往山城蓝田，仍然在山坡下开辟球场、跑道，每天课余，操场上龙腾虎跃，生气盎然。在周南，文艺活动也开展得很好。每年五月一日校庆和元旦都要举行游艺会，节目丰富多采。高中班都演出大型话剧或歌剧，初中班演出独幕剧和歌舞等，象《山河泪》、《日出》、《雷雨》、《茶花女》等大型话剧，都由学生自导自演。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蓝田火车站演出街头剧，观众达万人以上。

在学校管理方面，朱校长大力提高学生自治，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学校设校学生自治会，各班设班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干部全由学生选举产生，分管学术、体育、文娱、卫生各项活动。各班设级长，寝室设室长，其他如图书室、校园、食堂，无一不是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自治会的干部，对内参加学校校务会议，共商学校大计，对外代表学校与各校联系。学生经过这样的锻炼，踏入社会以后，大多能干大方，工作有魄力。

周南女校诞生在清朝统治的时代，从开办起，朱剑凡便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鼓励学生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它经历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反动军阀的凶恶摧残，大革命时期的腥风血雨，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孕育了无数革命志士仁人，造就了成千上方的建设人才，它是妇女界人才的摇篮，是革命前辈培育的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

周南，它有着光荣的过去，更有光辉的未来。

(注) 在周南之前还有彭新女学，见本书205页。

我所知道的岳云中学

刘伯勋*

岳云中学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南路公学。辛亥革命后，改名岳云中学，由何炳麟先生任校长。于本市经武门建筑校舍数栋，负债累累，以致校长冷天御寒的衣服都被当出。适有郴县巨商陈宜诚先生关怀教育，解囊相助，把学校亏欠款项，悉数偿还，并给予扩充费，学校因之蒸蒸日上，学生成绩亦逐步提高，为湖南私立各中学之冠。学校于前面花园当中，为陈宜诚先生建立一块高达丈余的纪念碑，以资纪念。

一九一七年上期，湖南高等师范有六班学生同时毕业，且不同科系，除音乐、体育、图画三科外，其余各科齐全。奈当时政府，不能分配工作，学生困难重重，欲到各校教课，苦无门径，何校长借此机会，聘用达数十人之多。该校全部教职员，都出自湖南高师。该校设英、算、理化等科，学生每周要交作业，由教务员清查后，再送交教员批改记分，以作临时成绩。英、算、国三科，于宿舍设有“学生作业室”，每晚及礼拜日均有该科教员轮流值日，以备学生谘询。英、算两科每周星期六上课时，抽出二、三十分钟，举行小考一次。教员读书的风气亦好，除自行钻研外，有的还从学校津贴款项中开支到北京师范大学当研究生，期满回校服务。因此学生成绩逐步提

* 刘伯勋系岳云中学教师。

高，凡毕业于高中部者，投考国内各大学均无问题。

赵恒惕当省长时，举行全省中等学校考优一次，每校选送学生十名参加。试题由外省出。考试时由省长和教育厅长当场拆开，分发各学生，考试完毕，即将试卷封好，加盖省长印信，交邮局寄送，其防范极为周密。考试结果前三名及第五名都属于岳云，只有第四名属于明德，但该生原肄业于岳云，系先年到该校插班者。第六名到第十名，虽无关重要，岳云还占二名，此次取录第一名者，叫谢伯俞，系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他于是年暑假毕业后，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均取第一名。因家中贫寒，便进北京师范大学。他尊敬师长，每次由北京回家路过长沙时，总要来我处看看。张作霖进据北京后将他逮捕，用绳索绞死，殊属可惜。

一九三二年暑假，湖南教育厅举行会考，凡属高初中毕业学生，须经过会考，各科成绩全部及格，方能发给毕业证书。如有一、二科不及格者，须经下次会考时，补试成绩及格，才能发给毕业证书。第一次毕业会考，岳云高初中成绩第一。历次送考学生，从未有一科或二科不及格的。

曹籽谷、方小川诸先生主持湖南省教育会各种教育事宜时，计先后共举行全省各中学成绩展览会三次，每次经各教育专家评阅，岳云中学都列入第一名。

岳云对于生物、化学、物理三科极为重视。高中班除上课外，都编有实习钟点，以便学生分组实习。生物实习，放在一年级，因人数较多，分作甲乙两组。每组又分作六小组，所需的显微镜、解剖仪器、切片刀、药品及用具等齐备，实验动物时，如兔、鸽、龟、鱼等，都是每小组一个。实习后，学生要交实习报告，以为该科成绩之一部分。此外还组织学生采集队，以采集植物和昆虫等标本。至于化学、物理两科，学生实习时所需的药品、仪器也很齐全，其实习时间，每周皆在两小

时以上。

该校班次依照政府规定，高中部每年春季和秋季各招一班，初中部每年春季招一班，秋季招两班，在校学生有高中六班，初中九班，如有超过此定数的，则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

该校何校长，每年要赴南岳避暑，对该地极为熟悉，于此设立高级农校，并筹集巨款新建了校舍，名曰：“岳云南岳分校”，并亲自主持分校工作，每年有大半时间住在南岳，经武门本校，后设有副校长以代理职务，后农校被毁于敌寇。

该校学生，除正式上体育课外，每日课余时间，要分别到操场练习，以求达到一定的水平，加以学校原有体育成绩过劣者不准毕业的规定，因而学生人人自动练习，历时既久，技术较高，某年湘、鄂、皖、赣四省联合在鄂举行运动大会，结果湘省成绩获得第一名，其所得总分，按校计算，岳云占第一。

湖南自开办学校以来，无论公立、私立，都是以男女分别设校。一九二二年，杨开慧肄业周南女校，与同学某某将头发剪去，学校当局把她开除学籍，后皆投考岳云，各科阅卷人员，见其成绩优异，都赞成录取，因而得何校长之允许，开湖南男女同校的新纪元。于是，学校添设女生宿舍，并指定人员负责管理，女生人数亦随之增多。

该校应时代的需要，先后附设体育、美术、教育等专科各一班，成绩较好，为各学校所欢迎。

该校在抗战中几经迁徙，其所受的损失，为当时私立各校所罕见的。经武门本校，郊外沙湖桥新建高中校舍，南岳分校，先后均被敌寇破坏，荡然无存。光复后，计划复校，为时不过数月，又于南岳重建新校舍，旋值解放，改为衡山第一中学，校长仍由何炳麟先生担任。

何 炳 麟 传

衡山县政协*

何炳麟，别号迴程，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农历五月十七日诞生于湖南省邵县中村农塘。少年时在父亲执教的蒙馆里念书。稍长，随兄进县城梅岗书院学习。以发奋为学，于经史百家之书，初有心得。一九〇〇年参加衡州府试，录取秀才。次年考进武昌辅文普通学校。一九〇二年入湖南范馆。一九〇三年八月他抱着科学救国思想，东渡日本，进工业学校电气科学习。一九〇八年十日，回国省亲，被人诬告为刘道一报仇而回国行刺，抵湘后被扣留，以至滞居省垣，未能再去日本。旋接办电报局邮电学校，并开办省电话局；同时在湖南省高等学堂、省立优级师范等校任课，主讲几何学、用器画（制图学）凡四年。

何炳麟认为：欲兴国邦，必兴科学；欲兴科学，必先培育人才。乃于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二月，邀集湘南人士刘光前、邓国勋、唐瞻云等十五人，共捐资二千五百元，创办南路公学，佃长沙戡子桥陶宅为校舍。一九一二年改名为湖南第二公学。是年七月，校长唐瞻云辞职，何炳麟不避艰难，毅然挑起校长重担。从此，夙兴夜寐，矢志为社会育人才。一九一四年学校改名为湖南私立岳云中学，当即提出：“招收好学生；

* 衡山县政协根据许多老人回忆以及调查访问，参看有关档案材料整理岳云中学校长《何炳麟传》。

聘请好教员；办成好学校”的三好目标，与全校师生共同奋斗。建校十周年时，社会人士已有好评。此后，日新月异，远近驰名。

何炳麟办学，一贯抱定为“社会育才”的宗旨，反对把学校变成达官贵人追名逐利的工具。三十年代，湖南省主席何键以捐巨款作钓饵，企图谋取岳云中学董事长的名位，何炳麟当即召开校董会讨论，决定予以拒绝。他爱护青年，不畏权势，当时杨开慧、丁玲（原名蒋冰之）等七名女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为某女校所难容。何炳麟却欣然接受她们转学岳云，开湖南中学男女同校的先声。一九三五年学生邓德滋（后改名方用），因组织同学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上街游行，期末教导处给予“勒令退学处分”。下期开学，何炳麟却批准邓德滋继续入学。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白崇禧驻南岳部队鲁道源兵团镇压学运，四处捕人，国师一批学生及岳云学生丁近智等被抓。何炳麟闻讯，马上扶杖前往白军营部，营救了等学生回校，并参加国师教授组织的营救活动。

何炳麟办学作风民主，一是表现在教学上的群众路线。当时岳云有值周生会议制度，每周召开一次有行政人员、教师代表参加的值周生会议，听取各班值周生汇报。内容包括老师教学、学生生活、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和意见。校领导对所反映的意见，能答复的当即答复，该说明的加以说明，需要讨论才能处理的就听候处理。值周生散会后回班传达，工作人员留下继续开会研究部署本周工作。何炳麟不但认真礼聘教师，还从教学效果及教学态度上考察教师，对水平低或工作责任感不强的教师，期末予以解聘。如旧制中学第十班曾聘了国文教师曹某，他以饱学自负，经常缺课，学生意见很多。何炳麟不顾曹某的“名望”，期末毅然辞退。二是表现在经济上的民主：岳云财经制度比较健全，设有经济审查委员会，由教职员工代

表与事务主任组成，定期审核全校经费收支情况。每当学校碰到经济困难时，全校教职员在何炳麟的感召下，节衣缩食，甚至义务教学，终能度过重重难关，坚持办学。岳云由长沙而南岳而白果而蓝田，再回南岳，四次大迁徙，摧不垮，打不散，巍然屹立在祝融峰下。这与何炳麟的民主作风，能团结一批人是分不开的。

“用人唯材”、“用人唯贤”，是何炳麟聘请教师的原则。大革命前在湖南教育界享有盛名的何叔衡、徐特立等曾先后应聘到岳云执教。抗战前夕，进步教师梁君大应聘任岳云高农教务主任兼管南岳初中分校的工作。这时，原地下党员胡敬夫也在高农任教。“七七”事变后，一批共产党员相继来南岳岳云任教。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岳云为基点的南岳地下党支部后已成为领导南岳地区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这年冬季，长沙文夕大火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密令省教育厅下令岳云，解除梁君大、陈啸天、朱抱坚三人的聘约，何炳麟据理力争，终于把梁君大留了下来，梁一直坚持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才离开南岳去广西。解放战争时候，地下党员何之光、邓轩宇、熊仲元等来到岳云任教。一九四九年春建立了岳云地下党支部，发展组织，开展学运，配合我大军渡江迎接解放，当年暑假，学运侧重护校，何炳麟督率学校财会人员等借粮，解决护校学生的生活问题，全校教工无一离开，一直坚持到南岳解放。校图书仪器教具，丝毫无损。这与何炳麟思想日趋开明，重视发挥进步师生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何炳麟深谋远虑，早在旧制中学第一班毕业时，就从中挑选文亚文、杨国础、宋焕达等人，送入高师等校深造，其后又有谭创余、方嗣稷、张德粹等，因此后来的副校长、教导主任、以及各科骨干教师，大多由校友担任，形成了“校友治校”的独特风格。这些校友在何炳麟的精神感召下，团结奋

斗，爱校如家，友情洋溢，历数十年而不衰。

何炳麟办学，注重面向社会，面向农村，不断进行改革。他针对当时普通中学教育不完全适应社会需要的缺点，于一九一七年试行分科制，高中阶段分文科、理科、工科、商科以及高级农科班，并在长沙北门外沙湖桥建设农场。在校内设金工场、木工场、和贩卖部，供各科学生实习。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又举办体育专修科、艺术专修科、教育专修科，三十年代，还特地在南岳开办岳云高级农校。并于一九四二年在衡山城关观湘洲兴建果园，大植广柑，想为教学、生产打下基础，后来成为衡山优良广柑基点之一。以上各个专科，为社会造就了一批专业人材。

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岳云的一大特色。对学生操行考评，分甲、乙、丙、丁四等。丁等为不及格，勒令退学。成绩考核方面，规定数学、体育一科不及格和其它学科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毕业考试一科不及格者，不发给毕业证书。考勤也很严格，旷课满十八小时者除名。何炳麟立法执法，不拘私情，他的儿子何国福某期旷课满了十八小时，教导主任迟迟未执行规定。他知道后，亲自书贴布告，将儿子开除。其执法如山的精神，师生无不钦佩。

岳云教学质量享有盛名，尤以数学、体育两科独具一格。数学是以自编《混合数学》作教本，习题力求准确工整，学生用三角板划等号，至今传为美谈。一九二四年全省中学选优会考，岳云学生获总分第一及第二、第三、第五名；一九三二年全省高初中应届毕业生统考，岳云又获两个第一名。抗战烽烟弥漫，岳云转徙流离，但当时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还认为岳云学生质量优良可靠，特许每年保送三名高中毕业生免试入学，后来增至七名。岳云的体育教学也是很突出的，通过实践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结合”的方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九

二三年在武昌举行的第一届华中运动会，岳云夺得五项冠军和个人总分第一名。第二年在全国运动会上，岳云获得一项冠军，一项亚军，两项第三名。一九二五年岳云运动员李珍和、黄延义被选送出席菲律宾远东运动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五十年代学生欧阳载黄出席全国运动会获得国家撑竿跳高运动健将的光荣称号。何炳麟自己也很注意锻炼身体，在长沙时家住沙湖桥，距经武门学校有五里之遥。他每日步行来校，风雨无阻。在南岳、白果时也是如此。岳云体育驰名省内外，与何炳麟身体力行是有密切关联的。

何炳麟把办学当作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崇高事业。他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担任校长五十五年，不仅家中未置任何产业，连祖遗的三十多担田租，早年就捐献给家乡龙门学校了。在学校经济极端困难的年代，他还将自己身上着的皮袍脱下，手上带的手表摘下，卖得钱来，以资挹注。他常给朋辈讲：“办学斂钱，绝子灭孙”，“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至今追忆，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生真是满园桃李，两袖清风。

从学校创办至一九六六年，已培养了两万名毕业生，其中有著名的革命志士、社会活动家、学者、艺术家、教育家等，如杨开慧烈士、谢伯瑜烈士、李渭璜、彭庭桂等烈士和了玲、贺绿汀、邓华、李熏、李锐、曹建猷、孟少农等都是岳云的校友。现在侨居海外的专家学者中，也不乏岳云的毕业生。

人民是不会忘记为人民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的。一九五六年夏，衡山一中举行隆重大会，热烈祝贺何炳麟教学五十周年及八十寿辰。接着省教育界在长沙举行座谈会，副省长谭余保代表省人委将“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成绩卓著”的奖状授给他，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工会赠送一幅“松鹤遐龄”的中堂湘绣。何炳麟在这次会上，心情激动，发言说：“在旧中国办学四十多年的实践中，许多痛苦的教训告诉了我，那时是不懂得

为什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老是走不通的道理……。建国七年来，亲身感受到在新社会里从事教育工作的愉快和光荣，亲眼看到几十年来艰苦坚持的学校，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迅速地获得了发展。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抚今追昔，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情不自禁地说：“我愿与全省教育工作者共同勉励，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培育更多的新人。”

何炳麟连任第一、第二、第三届省人民代表，一九五八年被任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长沙市主委。嗣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九年被邀参加全国群英大会，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休息时接见了，说：“老人家是国家的财富，应该好好休息了。”这时何炳麟已届八十三岁高龄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何炳麟病逝于长沙，享寿九十岁。省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将骨灰安葬于南岳半山亭下耙耙岭。

春风馥郁，桃李峥嵘，名山日朗，祖国繁荣，何老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省立第一中学创办概况

甘 融*

省立第一中学的前身为全省中学，是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春季创办的。当初的校名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这是我国中学分高初两级的滥觞。（一九二三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才正式分中学为高初两级）。校址设在长沙紫东园（为今民主后街四号和五号），是租赁新建并排五开间三进两层的两所民房成立的。后来班次较多（最多时八班），又租对门驻省湘潭中学（今石怡织布厂）为宿舍。直到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设在荷花池的第四师范并入南门外第一师范之后，才迁往荷花池（今省立幼师校址）。为什么名为高等中学呢？因为前清学制，中学之上尚有高等学堂，为大学的预科，高等学堂毕业后，可直接考入大学本科。全省中学创办时，校长是符定一（字宇澄，衡山人，清秀才，北京大学师范馆毕业，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已故）。他是一个具有事业心的人，奉令来办一个唯一的省立中学（那时公立的只有各府州的中学，民国成立后，改为联合县立中学，如长沙府中学改为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宝庆府中学改为第五联合县立中学）。他总想把学校办得规模大，学生多，以此提高他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此时民国还在草创时期，学制尚未厘定颁

* 甘融一九一二年考入省立一中，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布。岳麓山的高等学堂业已停办，所以全省中学在创办时，就开了高等科一班，招收中学毕业生，普通科三班，招收高小毕业生。

听说开办全省中学的动机有二，一是在长沙办一个象样的中学，好做全省的示范；二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优级师范选科（办在贡院）毕业了博物、理数、英地三科学生一百四、五十人，一时没有出路，都向教育司要事，办一个省立中学，也可以安插这一部分人。所以在全省中学开办的时候，教职员三十余人中，绝大多数是优级选科毕业的。

我是一九一一年冬季，在湘阴官立高等小学毕业的（那时高小是四年制）。一九一二年二月，来省投考中学，那时第一联合中学考期已过，适新设的全省高等中学，招高等科一班，普通科三班，名额各为五十名，我便报名应考。普通科报考的有二千余人，高等科报考的人数很少，借贡院优级师范校舍为试场。我记得第一场试国文，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要策”。第二场，试史地、算术理科。榜发，普通科取一百五十名，榜首是毛泽东，我列为第四。高等科没有取足定额，仅录取二十余名。普通科分英文两班，德文一班，毛泽东习英文，编入普一班，我习德文，编入普三班。到三月下旬，又添招普四班，习法文。普通中学的外语之所以有德法文，是因为要造就科学人才，须吸收西洋文化之故。

紫东园校舍既系民房改装，当然不适合学校之用，楼上作寝室和自修室，楼下每边把四间房打通，作为教室，其余房间作办公室、图书仪器室和教职员住室。一栋轿厅作为风雨操场和礼堂，另一栋轿厅作食堂，师生二百余人，挤在全校面积不到一百二十平方丈的斗室中，无宽广校园可资游息。教室黑暗，雨天要点灯，天晴要到咨议局上体操课，那时学校还没有电灯，晚间自修，点燃油斗笠灯。

普通科第一年课程为国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植物、修身、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等。国文、外语每周都有六小时，全周上课时间为三十六小时，课外活动时间很少。修身即后来的公民；灌输伦理思想与爱国主义，手工做摺纸工和竹器雕刻，体操有柔软操、器械操（仅有哑铃）、兵式操（尚无球类）。国文由教员选读古文名作，发木字排印的讲义。教国文的，普一班为柳潜老师（字钧湄，湘阴人，清秀才，中路师范讲习科毕业）普三班为甘澍老师。（桃源人，清秀才，优级师范选科毕业）。

学校行政组织，校长之下，没有分教务、训育、事务三部，只设一办公室，有学监三人为王祐、郭问阳、李邦藩（即李石岑，后来著《人生哲学》的）管编课、查课、训导学生等事；舍监一人为周楷，管寝室点名、学生生活等事；事务上设庶务、会计各一人，另设图书仪器管理员一人，校医一人。学生大部分寄宿，伙食每餐两荤四素每月膳费仅三元六角，（当时物价低），由厨房包办，伙食还好。起床和晚上自习就寝都吹号，吃饭敲梆，上课和集会就摇铃。清晨闻号声起床，以十分钟盥漱整理内务，即摇铃点名晨操（柔软操），点名时校长训话，无非是勉励学生进德修业，有时对犯规同学公开批评，校长的态度是严肃的。学生与校长之间有很大距离，学生们认为校长是官老爷。

高等科一班，只有同学二十余人。符校长自己教英文，在声调和教法上，不能灌学生的意，到下期开学，报到的人数极少，学校决定将高等科停办，将报到学生送高工、高商等校，有少数人（如黄士衡等）考取公费留学生去欧美了。高等科停办后，学校的名称改为公立全省中学。到了一九一五年，因为巡按使署决定在衡阳、常德各设一个省立中学，于是这个学校就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

吴 剑*

省立第二中学成立于一九二八年春，校舍在今长沙市马王街古稻田。它的前身是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湖南各校一律停办。一九二八年学校重新改组，全省设六所省立中学，男女各半。第一、第三、第五是男子中学，第二、第四、第六是女子中学。故二中全系女生，分高中、初中和师范三部。

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在该校教学，后来还任过一届校长。对于二中的情况，知道较多。兹记忆所及，概述于后：

关于校长方面的情况

当时对于省立中学校长一席，逐鹿者颇有人在，尤以省主席何键荷包里的人为多。加以屡易教育厅长，故省立中学校长，经常随教育厅长而更易。二中成立，短短十年，校长九易。其中除吴剑第一次被省政会议通过，辞未到职，余先砺被委派又被解职，王承洲被委卒未履任外，实负校长之责的，只有周八百、余蕙传、魏先朴、曾宝荪、吴剑、熊知白六人。

周八百这个人，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一直到宣布他为省立二中校长，才知道有他这个人。以后，我也并没有与他有一面之识。但最近有人告诉我，周八百本质是不倾向革命的，但在大革命时期，他却表现很积极，也跟着一班

* 吴剑建国前系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革命者去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活动。岳云中中学校长冯天柱，就是要被他打倒的一个。马日事变以后，他又还了原来的面目。当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张定为教育厅长时，他不知怎样被任命为二中校长。后来冯天柱等，为了报复，控告他有共产党嫌疑，他被逮捕入狱。经国民党员萧逢蔚、曾省斋及明德中学校长胡元侠等营救出狱，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一个时期做了新疆省的专员，陷害了不少革命人士。建国后他在第一次学习会上与龚励初二人同时坦白过去的一切罪行，时人称他们为思想起义。周八百遂在明德中学教书。不但他对于新疆当专员陷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并没有坦白。经他们自己的女儿揭发出来以后，他乃畏罪在明德中学投塘而死。

余蕙传(去世)，系余籍传的胞妹。毕业于稻田省立一女师第八班。后曾留学美国。一九二九年她继周八百之后，当上了二中校长。她以留学生资格，加上其胞兄余籍传政治地位的关系，通过省主席何健与教育厅长黄士衡两重关系来当一个省立中学校长是不困难的。

魏先朴(去世)，系湖南优级师范毕业，为形式论理学教学专家。后来担任心理学、三民主义等课的教学。他是余蕙传的老师，余蕙传为二中校长时就找他当教务主任。一九三〇年秋，正值红军攻城之后，余蕙传早已离湘他去。教育厅向省府会议提出东南大学毕业的王承洲继任校长。王在南京，久未回湘履职，遂替以魏先朴代理二中校长。是岁初冬，王承洲才来信表示不归，魏先朴乃以代理校长兼教务主任的身份被正式任命为校长，以继余任。

曾宝荪(去台湾)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重伯的孙女，颇具旧学根底。后留学于英，学成归国，创设私立艺芳女子中学。信耶稣教。艺芳女校，虽非教会设立，其性质与教会学校履相近似。曾宝荪以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地位，留英学生的资格，

较有新旧学识，故在旧社会是极为政府和一般人士所推崇的。一九二〇年以前，即委她当过一届稻田女师校长。一九三一年春，魏先朴去职，教育厅复委曾宝荪为二中校长。

吴剑，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当她还没有考取大学以前，已在省内外当任小学教职十三年之久。尤其与稻田女师的关系最密。因为稻田女师自一九一二年成立以后，她即在该校附小教课。至一九二一年，才上省升学。大学毕业回湘后，在省立二中担任实习主任。她出身于所谓十代书香的封建家庭，受着欧美化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一九三一年秋曾宝荪辞去二中校长职时，教育厅长黄士衡就向省政会议提出她继任二中校长。

熊知白，他对我来说，也很陌生，仅在二中校长打移交时会过他一面。故对于他的平生经历及为人，无法详细介绍，只听说他的旧学根底极深，是教育厅长朱经农的老师。一九三三年，他不知打从何处回湘，正向他的弟子朱经农要工作，值二中校长吴剑有机会去职，他遂继任了二中校长。

关于教职员方面的情况

余蕙传任内，教务主任为魏先朴，训育主任为陈淑茵，事务主任为朱安，庶务主任为曾有香、师范班实习主任兼教育心理学教员为余先砺。魏先朴任内，除教务主任另易人外，余均仍旧。曾宝荪任内，教务主任为言自芳，训育主任陈淑茵已退聘去职，曾宝荪自兼训育主任。实习主任为吴剑，余均仍旧。

至于教员方面在历届校长任内多系所谓名老教师，如国文教员李肖聃、周世钊，物理教员罗大藩，数学教员陈鹿萍、汪澹华、徐钰礼，英文教员杨笔钩，化学教员罗新誉，美术教员翟翊，历史教员左复等。其中历史教员和公民教员人数最多，几乎每班都各有各的历史教员和公民教员，全校高初中

和师范共计十多班，公民、历史两科教员就有十多人。原因不外乎是对人事方面的一种应付手段而已。总之每个教员都是在其他学校兼了很多课的，没有一个专任教员能对学生负课外辅导之责。甚至有的教员每周共兼课36—40小时，每天由甲校到乙校，途中经过的时间不得不从授课时间内节省出来，因此常常是到甲校早退，到乙校迟到。或者这个星期缺甲校课，那个星期缺乙校课，他们的业余生活多花在麻将牌上面，夜以继日。上课时精神疲乏，个别的还闹出笑话，如要问学生是谁做值日生时，就问“今天是谁做庄，怎么不搭黑板？”课与课的十分钟休息时间，大家讲的尽是牌经、牌帐。若是谁输给了谁，就在会议室扣薪金，等到发薪金时，有的教员不仅没有薪金可领，甚至还倒欠了帐。

吴剑任内第一学期，教职员方面一律仍旧，因为吴是在学期中间接任曾宝荪校长职的。到了第二学期就有下面几种变动：

一、职员方面，教务主任改聘彭缙云，后来他去一中当校长，又改聘了马文义。训育主任陈淑茵退聘去上海，又改聘了季相琼，另外改换了一个文牒和一个庶务。

二、教职员方面——如国文、英文、历史、公民等课则合并了一些钟点，改聘了几个专任教员，住校负责。至于数理化等教员，是无法聘专任的，因为这些名老教员是不可避免地要兼课。

旧职员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出来特别谈一谈：一个是雷有香庶务，他除掌握日常出入活动金外，另还掌握了一笔学生学杂费。——是关于征收部分的——当时各校会计，还未独立，二中会计帐目，即由事务主任朱安办理，朱安对这笔学杂费，素不过问，让曹庶务单独掌握和运用。当余、魏二校长任内，魏先朴曾托曹庶务经手代印伦理学书籍。事后，曹庶务曾不满意地对人说，魏校长的印书费始终没有还过他一文。魏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打了学杂费这笔款子的主意，曹庶务很不甘心。

吴剑任内，她却坚持将这笔经费交会计室朱安经管，开会

议决，以后非遇必要且经公议后不得动用。这笔经费具体数字已记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两千元上下。朱安接收后，将它另立存摺，存入银行。

当吴任第二学期斟换曹庶务时，曹提出在他任职内亏欠经费若干元，（具体数目不记得，大约是七、八百元）要求下任庶务负责。我当时坚决不答应，嗣经朱安、罗大藩、余先砺等几个教职员多向我求情，为曹庶务解除困难——他们都和曹庶务的关系搞得很好——结果我乃由坚持而动摇，终向这班人屈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另一个人是训育主任陈淑莹（魏光模的姨妹），她精明能干，负责认真，对人对事办法多，毅力强，能坚持下去，丝毫也不放松。当周八百任内，校规松弛，学校秩序乱七八糟。记得民政厅曾在二中校舍内办过公，厅长曹伯闻看到学生纪律乱糟糟的，还曾批评过他。自余蕙传任内聘了陈淑莹当训育主任以后，校规严格，学生已不敢乱说乱动。出入信件，必须经过训育部办公室检查，关于学生恋爱等事，无不一一了解清楚，门禁森严，每日课毕以后，中门落锁，训育部办公室即在门之右侧一角，学生出入，必须经过训育部办公室，一举一动，也不能逃过她的视线。因此学生对她，无不畏惧，背地里称她为阎王。但她对成绩优异，顶调皮的学生，又有另一种手法，那就是态度和藹可亲，遇事照顾备至。看到他们身体欠健康时，从自己家里炖药鸡送给他们吃。后来我还听说过，她曾为某一学生输过自己的血。她这样的训育主任，当时是能受到政府和一般人的赞扬和称许的。回忆刚公布我当二中校长时，黄士衡教育厅长曾指示我两点：（1）我这个厅长并不希望校长们常常来到厅里走，只希望专心在学校里办事；（2）陈淑莹是个好训育主任，无论如何要留着她好好共事。有好多女同事之间，总喜欢闹意气，希望莫蹈那样的覆辙。我对这两点指示是兢兢业业遵守的，但又为什么在我接任

后第二学期竟让陈训育主任退聘走了呢？原来陈淑萑在我接任校长后，已不是一次向我辞职了。第一次是我初到职时，公开向全体学生谈话以后，因为我对学生们说：“学校是我们的大家庭，我和你们之间就如姐妹相处。我愿做你们的大姐姐，有什么话，大家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有什么困难，彼此协商解决，不要把师道尊严的这一堵墙隔阂起来。”学生散去后，陈淑萑随即走到校长办公室来向我辞职，说：“大家都做好好先生，我一个人做恶，这个工作做不好。”当时我详细向她解释一番，才打消她的辞意。第二次是在我和各班值周生个别谈话以后，值周生代表各班同学对我陈述一些意见，其中初中一年级值周生陈述该班全体同学都不愿意陈训育主任教算术，因为她教的有好多地方难懂，又不许学生问，如果问就要挨骂。这个消息很快地被陈淑萑知道了，她又向我辞训育主任职，说：“这还了得，学生竟敢向校长告训育主任的状了。”当时我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把她留住。第三次是在我任期内第一学期放假后，还没有致送教职员聘（因为新旧教员还没有定妥），而先致送职员聘时，她却离校他去，再托人将聘书退还。凡与她有关的地方我都找到了，终于找她不着。这次她没有亲自对我说明退聘的原因，但后来许多人都说，是下面两个原因：①她历来要兼一班初中一年级算术课才肯当训育主任。当时初中一年级只教算术，如果到二年级要授代数了，她就不能担任。她见我未送教员聘书，怀疑我不让她教算术了。②我对教职员的去留，没有和她商量，她不满意。而在余蕙传、魏先朴两届校长任内，她都掌握了学校行政和教务处之权。继我后的熊知白校长任内，关于一切人事方面的事情，听说是完全经过了她的同意。

关于取录新生的情况

学校每当招考新生的时候，每每要受到两方面的压力：第

一是来自教职员，因为他们多少有些这子女或亲属关系的人要来报考，成绩不好的，总要设法录取。逼迫校长多录取备取生，备取生不必要等候正取生出缺，可以与正取生一同入校受业。记得我还是在该校当实习主任时，我有个姨侄女考了该校高中，数学是零分，按标准不能录取，我觉得无希望了。嗣后看到有几个教员的亲属同一情况都入了备取栏，于是我也按例要求把我的姨侄女列为备取了。第二是来自有实力地位的人，他们为运动自己的儿女或亲属入学，在招考之前，请求的函件，如雪片似地飞来。当局每每为着应付，不得不设法录取。还有一个这样的传统，榜已揭晓，有某一个人的女儿非取不可，因此当局不得不在一个晚上，爬梯添上一个名字于备取栏。这些怪现象，只有在旧社会才有。也说明班内学生的成绩，是何等不齐。

在我任内，马文义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我们商量好这次招生硬要矫正过去招收新生的恶习，将外面说情的函件一律投入纸篓里；召开招生委员会议，制定录取标准，任何人不得例外；学生姓名编两套号码：第一套号码为教务处掌握，明写在试卷浮签上，学生交卷时必须撕掉浮签。第二套号码由校长收藏以防作弊。这套号码是根据第一套号字编写的，写于试卷一角，密密粘封。等到试卷成绩定了去取和名次，才能拆去第二套封号码，然后取出校长室所收藏的密码簿，才能找出第一套号字，再从教务处所收藏的第一套号码簿里，才能找出考生姓名。这次总算是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公公道道地写出了新生录取榜。内部教职员毫无异言，并且说：“这种办法很好。”但是却出自萧墙之内了。大公报馆主笔龙兼公之女龙纶普，原系本校初中毕业生，这次都没有录取高中师范。龙兼公与我和马文义同系湘潭县人，平时往来密切，是二十年来的老朋友。这次我当校长，马文义当教务主任，而他的女儿竟名落孙山，对他来说，

的确是晴天霹雳。他在我外骂我：“是牺牲我的女，买她认真的名。”因为教员罗大藩等曾说：“这次录取新生，真正坚持了原则，连龙兼公的女都冒取。”老实说，当新生中没有录取龙纶普时，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她在初中时，成绩还可以（据说这次历史、地理考得极坏）。谁愿故意牺牲她呢？嗣经许多有关的人向龙兼公代我疏通意见，终归无效。他还说：“原则自原则，人情应该还是人情。”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没有和我们通往来。龙兼公恨我之情既如此，其它一些有实力地位的人恨我，更可想而知，于是“吴剑没有能力”的名声，已遍湖湘了。

关于党派方面的情况

二中是湖南马日事变以后的产物，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是不被委当校长的，该校长也不会聘请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职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二中校长和教职员们，不是国民党员就是无党派人士，总的说来，多数是不喜欢共产党的。那时国民党中已逐渐形成了甲乙两派，甲派势力早已打入了该校内部。余惠传任内，国民党甲派余先砺就在该校当师范班的实习主任。周八百、余惠传两个校长是不是国民党员我不知道，魏先朴确是国民党员，与余先砺颇友善，且有相当信任，人事组织上有所倚重。故与余先砺接近的人，如周调阳、杨国础、吴剑都先后担任过该校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员，或师范班实习主任。吴剑任内又聘请了陈大榕教英文，陈澧兰当文牍，他们两人是国民党的甲派。又聘了周方教国文，也曾一度聘宋焕达当文牍，马文义当教务主任，他们三人都是与国民党甲派相接近的，因此外面人常常替国民党甲乙两派打分家之算盘，哪几个学校是属甲派的，哪几个学校是属乙派的。省立二中就算作是甲派的家私了。但是吴剑虽是国民党员，她却对党务不感兴趣。她与余先砺、陈大榕二人有同学（北京师

大)同县(湘潭)的关系,与陈澧兰、宋焕达有同县(湘潭)的关系,与周方有同事(通俗教育馆)的关系。而他们这些人又都有相当的教学技能和办事才能,平时就有交往。至于陈大榕、余先砺等,他们每每为湖南省或长沙市国民党派问题密谈时,吴剑从不参加,关于党派纷争的内幕,一点也不了解。人们把她归属于国民党甲派,她极不甘心,殊不知自己却无形中做了国民党甲派所利用的工具。魏先朴虽是国民党员,我认为他也并不是什么国民党甲派,之所以与余先砺友善,多半是麻将牌桌上或同事的关系。

一九二九年,二中校内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区分部常委员是高中第二班学生陶绍英,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是谁已记忆不起了。我和余先砺、魏先朴三人都同在这个区分部,我们都不乐意到这个会,记得只到过一、二次。学生们拿这些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陶绍英的父亲陶叔衡,是湘潭私立新群中学的历史教员,与湘潭国民党乙派主角王洪波、黄笃杰、王蔚佐、言志超、廖镇楚等相友善,他们大概是一师同学的关系。陶绍英父女是不是国民党乙派,我搞不清。两年前碰到过陶绍英,我曾问过她,她说她和她的父亲既非乙派也非甲派。的确二中校内从未听说有过国民党甲乙两派斗争的事实。

第七班师范学生苏镜、廖申之、唐荣前等是有觉悟的进步青年、尤以苏镜为首,是陈大榕所教英文班的高足弟子,他们师生关系搞得很好。陈大榕常对他们灌输一些国民党反共的理论,说共产主义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苏等听了表面上并不和他争论,陈大榕却认为苏镜等是可靠的青年,不会加入共产党所以后来苏镜因阅读进步书籍而被捕入狱时,陈大榕、余先砺两人为他百般奔走,救她出了狱,此时我已离开二中。抗战时期,苏镜等已作党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政府所追捕,他们就都跑到延安去了。看起来国民党甲派想在二中起些作用,在真正的革命青年面前,也无法售其伎俩。

关于学校前后发生的问题

一九二〇年冬，魏先朴校长任内，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毕业生打莲花闹。师范第三班和第四班毕业生为了答谢学生自治会欢送他们的盛意，编了一套莲花套，在迎送会游艺会中表演出来。莲花闹的内容都是针对各个老师的特点编成的，打唱的时候，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哈哈大笑。不料其中有些话竟触怒了校长和训育主任，认为毕业生对学校当局如此不敬，应作如下的处分：①打唱莲花闹的一个学生按毕业成绩本名列第二，却改为第四，不能留附小工作（按规定毕业生名列前三名的留附小工作）；②另一打个莲花闹的学生，毕业后学校不予介绍工作。第二个问题是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侮辱了省代主席——省府委员曹典球，代理省主席何键出席二中典礼向学生训话，大大宣扬三从四德的要义时，学生们在座上一齐发出嗤嗤之声。代主席气极乃拍案大骂。他骂得越厉害，学生嗤得也越厉害。事后当然是罪责校长：“教育无方，学生竟敢侮辱省代主席。”逼得魏校长在第二学期中间退了职。

一九三一年夏曾宝荪校长任内，发生了一个问题，是一个走读的学生生了一个私生子于校内厕所粪坑里，该学生年仅十余岁，寄居于姨母家，在二中读走学。她的姨父行为不端，淫猥成性，诱奸了姨侄女，怀孕已足月。该生姨母不知怎的没有发觉。学校训育部人员也因走读生人多，从未发现。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长沙市已是闹得风雨满城。报纸连续登载。太伤脑筋的曾校长，真是每日接待新闻记者之不暇。当这学期放假后，她就离湘赴沪。第二学期——一九三一年秋，由教务主任言自芳代理校长，聘请教职员（陈淑蕊仍受聘当训育主任），招收新生，办理开学手续。学期中，曾校长坚持不归，教育厅遂改委吴剑当校长。

一九三一年秋，我初任校长职，第一个问题就发生了——高中第五班在考数学时，全班学生交白卷并气走了数学教员余书荣。当时我正在别班监试，教导员走来报告这个消息。陈淑莹来商量善后。她说：“不能容许学生有这样猖狂习气——冲走教员——务必要第五班学生派代表向余书荣道歉并慰留。”她并说：“余书荣会自己知趣，不会再来了，这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啊。”

结果，不仅第五班学生不肯派代表，而且师范第七、八班学生都派来了代表，要求不再要余书荣上他们班的数学课。陈淑莹则主动代表我到余书荣家，慰问一番。余书荣还要求另聘别班教课，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次日陈淑莹严厉地对我说：“事情发生两天了，五班学生不肯派代表出来，就不能不受到应有的处分。”。她主张给五班学生全班记一大过，于是我就照她说的办了。

余书荣自己的学问并不太坏，教课却实在不行。眼既近视，头脑也糊涂。授课时，说话不清楚。黑板上演算例题时，每每错误很多，当写正号时，却写成负号；当写负号时，却又写成正号。学生在下一喊，她更慌得手足无措。我当实习主任时，就知道余书荣是个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员。为什么我当了校长，还留聘她呢？这是因为曾宝荪在学期中途接任校长时，解聘了一个国文教员，而受到许多人背后的议论。说“学校聘书是盖有校印的，不应该因校长个人更易的关系，而使校印无效，致在学期中改聘教员。”我也和曾校长一样，在学期中接任校长的，故对所有教职员，一律加入新聘，无所更易，余书荣当然不在例外。但人们对我的指责，却另有所籍词。说“分明晓得余书荣教课有问题，而仍旧聘请，这是对同县人的维护。”据说学生冲走余书荣的先一晚，曾开了一个全班的会议，这事过了好久，我才听说。

一九三二年冬，第二个问题又发生了。一连几天大雪，使二中在两年前新建的食堂梁柱坍下，砸伤了三四个学生。其中一名因伤重气绝。这个死亡的学生，叫潘仪，醴陵人，是师范第六班毕业生。我曾教过她几期课，平时师生间感情很好。出事故的早两天，举行毕业典礼后，她还独自走到我房里，满面笑容地与我商谈毕业后的工作问题。不料两天后，她竟作了这次事故的牺牲者。迄今思之，不免犹有餘痛！

一九三三年初春第三个问题发生了一一何键实施各校毕业生会考制度，二中高中第三班学生全班会考成绩不及格。这次实施第二届会考了。第一届会考，二中高中第二班已参加过，会考成绩都及格了。这次规定更严，凡在学校内毕业考试未及格者，不准参加会考。记得高中第三班学生中有两个经学校考试后未及格，按规定不能参加会考。这两名学生的家长经过多次要求不得，学生自己却发疯匿迹，藏在同学家，校方一时找不着她们，她的同班生都大闹说是她们自杀了，总之全校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那些参加会考的学生，结果一个也没有及格。有人问我究竟原因何在？我实在不知怎么答复才算正确。大概不出下面这几个原因吧：

(1) 学生成绩质量不佳，录取时就是参差不齐的。

(2) 学生成绩质量不佳，教师未能把她们作课余辅导。

(3) 我自己平时对学生成绩漠不关心。要毕业了，而且要会考了，也不想方设法为她们请教师补习，反面代理实习主任（因为实习主任的爱人病危）率领师范第六班学生教育参观团赴江渐一带，经月方归。

上述三个原因，总算都有关系吧，但是一班学生中至少也会有一、二成绩优异的，又何至连一个都不能及格呢？因此当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什么想倒吴的多有人要出阴谋诡计啦，什么第三班学生怨恨校长不准那两个在校内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参加会

考，故意将全班成绩考坏以报复校长啦。我认为这些无稽之谈，都不足为信。不过问题很严重地发生了，倒吴的暗潮，果然风起云涌。人们认为有辞可藉，有罪可拿了。教育厅方面也发出了话。“吴太缺乏应付能力，太不得人心啦。”好在我并没有“费尽多少心机，才坐上了这把交椅。”更没有“指望打个卖一批，捞一批算盘。”不称职就滚蛋，丝毫没有有什么留念。只一想到没有为学生们尽到职责，心中不免歉然。

关于三个教育厅长的不同作风与学校的关系

我做二中校长的时间不满一年半，但却经过了三个教育厅长，即黄士衡、曹典球、朱经农。这三个教育厅长，各有千秋，学校行政也因此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兹分述如下：

1. 黄士衡厅长，他不希望校长们常来亲近他自己，只希望他们专心专意办好学校。他不向校长们介绍教职员，连厅内秘书科长，乃至科员办事员等，都承受了他的意旨，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他对于他所提出来的校长，始终是关心的，无论他在不在教育厅长职内。例如一九三二年春季，学期还没有开始，我正在组织二中教职员时，他却亲自来到学校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将把曾校长任内去职的那个国文教员聘进来，而且将把一个年高德劭众所推崇的李肖聃解除职务。我认为这个对你办学前途不利，特专程来告诉你。”我说：“你放心，我并冒打算这样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诬蔑的。谢谢您的关怀。”这时他已没有在教育厅了，犹能对我关怀备至，我对他是很感激的。至于他的主张正确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2. 曹典球厅长，他的作风比黄厅长大不相同，他是爱受人奉承的。因为我生性不爱趋奉长官的，从不到教育厅去走。于是他发出话来了：“吴剑是个什么人物，厅内从不见到他的足迹。”有关人告诉我，并劝我到教育厅去看看厅长，我方去见

他。他就当面向我介绍两个人(一个人的姓名不记得了。)一个是李泳南，她本是我的老友，曾经向我自荐过，我答应她做个事务员，她不愿意，乃依据她爱人与曹厅长的师生关系，请求曹厅长介绍。当时我告诉曹厅长，校内无其他位置可以安插。厅长却指示我一个好办法——在校内新添家事科——李泳南主持家务很能干，更会做点心和各种菜肴，就请她教家务科好了。新添家事科，需要开办费和经常费，厅长都——允许负责筹拨。从此二中各班课业中，又增加了家事一科，这可以说是因人设事的。

3. 朱经农厅长，表面上看他对人非常谦和，似乎比黄厅长还客气。但比起曹厅长来，却显得虚伪。他十分讲究应付。他的第一科长杨乃康，权力很大，有第二厅长之称。一天傍晚，打给我一个电话，说厅长约我到厅里谈话。我去了，厅长并不在，只有杨乃康一个人。他并未说别的问题，只是当面介绍两个小学教员到附小。我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当即告诉他，附小另有主事，该校校长用人及行政，中学校长从不过问。并且已经开学了，人事方面，必定早已安排，再介绍人去，只怕无法接受。结果。正如我之所料。后来二中新发生的各种问题，以及传到厅长那儿的流言蜚语，更足以证明吴剑是一个缺乏应付能力的人了。

一九三三年春熊知白继我后当二中校长，不久改校名为省立长沙女子中学。一九三八年秋，避日寇飞机轰炸，校址初迁湘潭石潭冲萧家塘，再迁安化桥头河，合并于全省临时中学。稻田女校的寿命，由此告终。陈淑莹训育主任，除在曾宝荪校长和吴剑校长两任内短期辞聘以外，她可以说是与二中学校相始终，共存亡。

福湘女中片断

范瑄*

福湘女中成立于一九一三年。位于长沙市北门外长春巷，即今日之长沙市第十中学所在地。它是美国教会所开办的一所中学。

开办时仅学生十余人。我是一九一八年九月由教会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校的。当时全校分甲、乙、丙、丁四班，共有学生四十余人。李肖聘是当时的国文老师，他老曾对当时最年轻的一个同学提了一句词：“四十人中最少年，”到一九二二年我毕业时，全校学生已发展到百余人。到解放时学生人数还只发展到四百余人。学生的家庭成份绝大多数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以及教会的教牧师或教友。

学校创立之初的校长是牧亚奴，协助者为方格伦。一九一九年凌支尼继任校长。这三位女士皆为美国人。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学校的规章制度大多仿效美国。学生一律寄宿，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在学生中组织了基督教学生青年会，协助学生进行宗教生活训练，和日常生活管理。寝室教室地板每周必须洗抹两次或三次。每日且必须用煤油抹布擦抹地板。所有教科书，从中学二年级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用汉语课本外，其余的采用美国课本。世界史、世界地理、生理卫生、生物、理化、几何、三角、大代数都是采用英文原本。教员并非都是

* 范瑄为一九一八年福湘女中的学生，后任福湘女中教务主任，已故。

美国人，但绝大多数必须是知晓英文的。

一九二八年，由于时代的要求，福湘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照章在教育部立了案，正式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同时成立了校董事会。其成员为创办福湘的美英教会美英籍代表以及有关的教会的中国代表。选聘校长及掌管学校的经济大权均属校董事会。校长人选必须是基督教信徒。学校会计必须是设立教会之代表，换言之，必须是洋人。校长遵循董事会的意旨，按照教育部所规定的教育规章办事。学校采用学生住读制。学生一律住校。有时规定每周回家一次，有时规定两周或四周回家一次。这样就使学生少有与社会接触之机会。

学校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宗教生活习惯。学生除学习一班的科目外，还有圣经课；除参加一班的课外活动外，还有宗教活动。圣经课虽为选修科，但事实上希望学生都参加。每日有早晚礼拜。礼拜天在教堂里有大礼拜，也希望学生前去参加。想通过读圣经、参加礼拜等形式，成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们的驯服工具。

学校对学生其他方面的训练抓得比较紧。课堂、食堂、礼堂、寝室、图书室、阅览室、体育场、漱洗室以及厕所都有一定的规则条文，要求学生遵守。违者按情节之轻重予以扣假留校或扣操行分数之处分。当时学生最怕的是扣假留校。学生出校必须穿着线布制服，夏白冬蓝。衣领两端分别绣福湘两字。这样做使学生产生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感觉。对自己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自豪。

学校通过教会的所谓奖学金或在学膳杂以及医药等方面的私人经济资助，使一些经济困难的学生自然地产生亲美和崇美的感情。学校对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热心公共事务，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同学中有威信的学生采用两种手段。一是五四运

动在长沙轰轰烈烈展开时，福湘学生积极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当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时，有位同学曾被邀参加出席会议。此事被校方所知，校方便给该同学一星期之隔离处分（不上课留在寝室）。还有一个同学一向是热心参加公务和社会活动的，于暑假时她都是到处奔跑。一九二〇年暑假当她在古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搞爱国和社会服务活动时如开办儿童半日学校，妇女识字班，到通信报馆作关于反帝反封建的讲演或宣传卫生常识等，校方忽然来电话，叫她停止工作，当晚动身到庐山休息，原因是身体会累垮，更会影响将来的学习。该学生无知，闻悉此事，惊喜不已。认为这是“老师”对自己的“关心”，加上到庐山休息歇暑，真是再好不过了。因此她就抛弃了光荣的服务工作，奔向了个人享受的匡庐。至此，该学生在思想和感情上都成了洋人的俘虏。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她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才懂得了帝国主义用小恩小惠奴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灵魂的阴谋，同时对自己的麻木不仁。感到无限痛恨。



我所知道的妙高峰中学与方克刚

马文义*

妙高峰在长沙城南，乃一高阜，为宋张南轩讲学地。上有卷云亭，为城南十景之一。清时，亭后有二贤祠，祀陈良、屈原，再进为五贤祠，在左侧为王船山祠。一九〇六年二月（光绪三十年），谭延闿、马邻翼等捐资设简易师范科于此，七月毕业。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又稟请设立中路公学，推贝允昕为监督。次年三月校舍被毁，租碧湘街许宅为校舍招生。六月又迁储备仓，十二月迁还原址。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停办。次年一月，因三路公学均为公立，中路公学乃改为公立第一中学校。一九二四年汤芑铭督湘，削减经费千分之八迫其停办，贝校长辞职。教员罗元鲲，张有晋等竭力维持，组织校董会，公推贝允昕为总理，推方克刚继任校长，遂更校名为私立妙高峰中学。一九二六年建南轩图书馆，藏书达一万七千余册。又添购仪器标本，设置理化生物实验室，校舍够用，规模大备。一九三八年抗日军兴，学校迁蓝田。一九四三年，方辞校长职，仍被举为董事长；而以原任董事长之张有晋继任校长。一九四四年，张有晋辞职，周育真继任。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学校复员，一九四六年，该校便陆续迁回原址，直至解放前，共毕业八十余班，前后肄业学生达六千余人。校董会董事，先后有谭延闿、陈术藩、马邻

* 马文义系一九二三年妙高峰中学教务主任，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已故。

翼、貝允昕、王国鼎、方克剛、喻紹勛、羅元鯤、張有晉、羅教鋒、周漢藩、繆育南、任杰、張干、劉謙、楊少岩、周育真、潘世謨、余先礪、陳述三等。

我是一九二三年七月到校任教務主任，與方克剛初無一面之緣，因前教務主任吳起鵬找我作替身故爾應允。到校後，有人為我擔心說，“與方某很難共事，近幾年來，沒有人在妙高峰中學搞過兩期教務主任的。”可是我與各方面接觸時，很留心了解其為人，覺得此人心術正派，能耐勞苦，無聲色貨利之野心，有為教育而從事教育事業之意願。在當時看來，不失為好人。而從現在來看，則是一個性格雖不夠堅強，但能隨時代前進的人。例如“五四”運動、驅張運動，他不是不贊成，也不是中立，但他不挺身出來帶頭干。如新文化運動，文言與白話之爭，資產階級民主教育之倡導，起初他總是在觀風，到後來，他也轉而提倡了。凡遇促進教育進步事業，他常持不為人先，不落人後的態度。如鄒干于倡導中學五年一貫制和明德辦實驗班，得了教育部的補助金，于是他也在妙高峰中學開辦實驗班。諸如此類行動，頗符合於他的思想和性格。然而他也有喜做“帶頭人”和為“群倫之首”的事，如領銜爭取教育經費獨立，帶頭請將教育經費一條載入約法，一九三一年代表教育界入京請願，將鹽稅附加撥還湖南作為教育經費等，都是他在帶頭。順便提一下，湘省鹽稅（淮鹽）附加原有學堂、善堂、公益、鐵路、口捐五項，年約銀百余萬兩。一九一四年鹽稅劃一，附加廢除，并入正稅，各項經費無着，後由熊秉三等呈請中央指為教育慈善專款，由湘紳公管。一九二一年再由湘教育界呈准，每包划拨八角為教育經費專款。以為數不數，一九二九年又呈准加撥一元五角，案尚未行。一九三一年三月，財政部又統一鹽稅，教育經費根本動搖。教育界乃公推方克剛等代表赴京請願，結果由中央依一九三〇年一百一十萬元收入

平均数，按月由部拨还九万三千元。照当时教育经费支出预算，可摊发六成或七成之款。（他告我：连呈文都要他拟稿的）。至其在省教育会工作时间，对于会场之建筑，中山图书馆、博物馆、幻灯场之筹备，能热心从事。全国教育会议在各地开会，他多次代表湖南参加，更是他平生所认为得意的。

他任妙高中学校长，自一九一四年七月代理校长起，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止，为时三十年。他所以能延续任职很久时间，可以说是由于下列几个原因：

一、经济公开。他把学校每年度收支详细数目，连同单据数簿等，统统送交校董会审核，以表现他勤俭治校之精神。

二、他有几个畏友，如张六村、罗汉溟、周与泉等，既是校董，又都在学校任课，随时能直言无隐的向他进言，他受影响不小。

三、他对于校务，事无大小，每事必问，勤而有恒。如每日必出席晨操或课间操去与学生见面，并巡视学生内务。又常在办公室检阅学生练习，尤以作文本为多，如遇教师批改不正前时，立即亲笔加以改正。从此教师批阅文卷大都认真。当时长沙著名的国文教员傅君剑，每周教国文八班之多。常在他校轮流缺课或将作文卷请人批改，但在妙高峰中学任课时，他既不缺课，又不请人批改，还对人说：“怕对方先生不起！”方先生主持妙高峰中学工作，三十年如一日，其毅力是可贵的。但他在讨论总结校务时，常流露功则归己，过则归人的语调，不很深信同事，是其缺点，也是一般人不乐与之久共事的原因。每逢学校纪念会，他常将历年学校行政历（每学期一张）和每期的预算决算册展览出来。在妙高峰中学三十年纪念大会时，曾展出三十年来的每期一张的行政历，每期的预算决算册表，每期的会议记录，学校日志，还有中外报纸杂志，积二十余年，逐年逐月装订，任人披阅，尤以保存《东方杂志》自一九一二

年一至九三七年不缺一册，加以精装陈列，更为难能而可贵。

在他三十年任期内，不以专筹学校经费为主要任务。在一九二二年，他为着贫寒学生免费入校，曾向谭延闿、鲁涤平、谢冠军各人捐学额二名，每名五百元，共三千元。一九二五年，为建筑南轩图书馆向校友募捐一次。一九二四年，接受陈宣城捐助梓术园地皮一千五百方（系与岳云、兑泽共），以后募捐次数不多，大都因社会经济日益穷困，鲜有应募者，故成绩均不佳。

方先生，籍贯平江，年十六，以家贫习商贾四年，一九〇七年（光绪丁未年）入长沙经正学堂肄业。次年考入中路师范史地科。他平生无他嗜好，喜吟诗作对，多刊在校刊《卷云旬刊》上。一九四六年二月卒。他记日记三十年，每年一本。其子方乐山不肯拿出来。据知之者云，内记有很多关于教育与其他方面史实。他除任妙高峰中学校长外，曾兼任其他机关要职。如教育会，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水灾帐务处，抗敌委员会，省临时参议委员会（任参议员）。兹以其事实不详从略。

我所了解的曾宝荪

曾昭桓*

曾宝荪，字浩如，号平芳，湖南省双峰（原湘乡）县荷叶区人。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正月廿十一出生于清王朝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曾广钧，字重伯，号汲安，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甲午日朝战争，曾奉派统领钢武马步炮队全营出关援朝。他是曾国藩孙儿中年长的一个。曾宝荪又是曾国藩曾孙辈中年长的一个。曾宝荪是曾广钧的侧室陈氏所生。但是他受祖母郭氏的教养居多。郭氏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夫人。曾纪鸿考圆周率创捷法颇有名于国内外，当时西欧旧法，求三十六位，需演草数十年，他月余得百位。郭氏是她丈夫的助手。她说“自身善游冶于六艺之中”，故自号艺芳。她钟爱孙女宝荪，但不溺爱。曾宝荪幼年即从祖母学，及长，考入浙江公立女子学校，立志从事教育。但是，曾广钧不愿女儿学师范，他要女儿“穷经史之后，再去泰西学”这种先穷经后出国学习的计划，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曾家的不见于形式的教育计划。还是曾国藩在世时，他即“命长子纪泽治方言，命纪鸿治历象，设馆以通重译，遣童涉海，以求新知。”并“期砥于成”因此，曾宝荪在浙江冯氏高等女校毕业，补读经史之后，即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攻理科。她叔父的儿子曾约农亦同时去英

* 曾昭桓系曾宝荪之弟，曾国藩曾孙。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铁路土木工程，曾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已故。

国学习。曾宝荪另一叔父的儿子曾昭权以及堂弟曾昭掄，先均后赴美学习。曾宝荪在伦敦大学获理科学士学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曾宝荪的父辈中有不少惶惑消极的，曾宝荪既不以失去皇恩世荫为虑，又不欲以所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她完成了在英国伦敦的学习任务归国之后，即计划以私人积资，筹办学校，以遂初志。郭艺芳逝世之后，曾宝荪得其父、诸叔和兄弟的赞助，终于在一九二〇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为了纪念其祖母，特将该校定名为“艺芳”。当时的校址设在长沙市北门西园龙伯坚宅，后迁局关祠。曾宝荪自任艺芳女校校长。她是个独身主义者，一直以校为家，她确实贞洁，故在校内，一直享有威信。可是，她的独身主义，也一直影响着她的莘莘学子。她的学生中，学习她的终身不婚的指不胜数。

曾宝荪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湖南省高等检定考试委员会委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二第三两届世界大会中国代表，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一第二两届参议员，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等职。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曾宝荪为筹备委员。狂热吹捧“曾文正公”的蒋介石，本想把有着封建门阀的优越地位，有着一定学位资历的“曾文正公”后裔曾宝荪、曾约农、罗致去中央，然而，曾宝荪却与蒋介石在政治关系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因此，虽被任命为三青团筹委，并经张治中代蒋电催过曾宝荪，托病未去做实际工作，她曾经表示过无意于旁虎乞食。可是，在蒋介石举行国大时，她却在原籍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湘乡张默君同在一个县内竞选，几乎由劲敌成了冤家。张默君因丈夫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国民党中央有人支持她。同时，青年党也为她卖力。但曾宝荪在省内特别是湘乡地方实权派的支持下得胜了。然而国民党中央的通知书却被扣留，直到行宪国大会议召开的先两天才送到曾宝

荪手里（据仇亦山曾约农两人对我说，蒋介石把张默君作立委预为安排后，才将曾宝荪的通知书发出）。蒋介石竞选总统期间，曾宝荪用英语向北美广播了一次大会实况。在李宗仁与孙科抢夺副总统宝座，而李宗仁赌气飞北平时，胡适装病在家，坐观成败，曾宝荪此时去拜访胡适，胡适闻曾宝荪到，一跃起床，倒屣相迎（李宗仁早就写信给胡适，要胡适参加总统竞选，故胡李是相互支持的，曾宝荪原是支持程潜的，程后自称受命放弃竞选，故宝荪转而支持李宗仁）。

曾宝荪是个基督徒，因受叔父曾广钟的影响，青年时即加入基督教会。参加过世界基督教宣进协会，任该会第二第三两届中国代表。她曾为曾广钟编校过《新旧约圣经提要偈子》。

曾宝荪虽是个独身主义者，但是，她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观念。抗战期间长沙大火后，她一度回籍，深居简出，谢绝一切访问者。但是，她“与约农日事研讨，戚戚然不知诸事应否中辍”。她与曾约农倡议并纂修了《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她自己任监修并写了谱跋。她在谱跋中阐述并强调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家族主义；阐述并强调了以“贵强”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她认为只有家族的发展，才能有民族的发展，而“曾族”的发展，正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

曾宝荪除异母兄弟外，同胞只有一弟名曾昭桦，香港大学文学士，当过国民党时期广西省政府高级顾问，一九四六年正五十岁时做买办去曼谷，死于飞机失事。时曾宝荪正避乱分居，闻耗极为悲恸。可见她们姐弟感情是深厚的。

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解放前夕，曾宝荪与曾约农乘飞机去香港，后又去台湾。她们将其先人墨稿随身带去海外。但对艺芳女校的图书仪器（一部分存荷叶富厚堂）和曾国藩故宅的七大楼藏书保存下来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

湖南乡村的最早女学堂

黄 曾 甫*

清末长沙县有唐黄琼、许黄萱祐姊妹，联合亲族黄镛（辛亥首义同盟会员）、黄为焯（太学生）、黄亨理（贡生）、陈保彝（举人）、余黄国芝等，捐集私财，于一九〇三年即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二月二十八日，在影珠山下西冲樟树脚下黄镛私宅，开办影珠女学。学生仅十余人，皆黄姓戚族女子，如黄国厚（后来衡粹女校校长，建国后北京文史馆员）、黄国巽、黄辉、陈光璇、陈淑芷、黄经慎、余才勋等人。不久，湖南第一女学堂在省城开办，许黄萱祐受聘为女生监督，影珠校务，全由唐黄琼主持。一九〇四年，第一女学因御史杜本崇参劾，奉旨停办，影珠亦受牵连，一度被迫更名黄氏家塾。一九〇五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奏准考录第一批官费留日女生，计二十人，以许黄萱祐任管理员，其中女生大多为第一女学和影珠女学的学生，此乃湖南女子出国留学之首创。一九〇七年，清政府规定民间可以开设女学，影珠得以正名为影珠学堂，因唐黄琼病逝，互推陈保彝任监督，黄亨理副之，校址迁到长沙东乡梁家街坳上屋黄为焯私宅，设男子中学一班于屋东，女子师范一班于屋西，中隔一墙，不通往来。教员有陈作新、荆嗣佑、

* 黄曾甫193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曾任醴陵女校代校长，副董事长，现任湖南省政协委员。

黄德诚等人。男子中学学生有黄国瀛（后为湖大、云大教授、广雅校长）、张铭西（建国后省政协委员）、余才劲（前大麓中学校董）等人。女子师范学生有余才劲、黄经哲、郑家静、李昌淑等人。并在涂家坳附属小学。杨开智、余彝五、黄则民皆当时学生。一九一〇年，由许黄萱祐、余黄国芝姊妹合资，购置东乡竹杉铺符嘉屋场缪姓房屋一边，将校址迁此，停办男子中学，专办女子师范，易名为隐储女子师范学校。门首悬挂陈作新篆刻木联“隐壮山河气，储成巾帼才”。仍附属两级小学，一九一二年，杨开慧烈士即在隐储附小读书，杨母向太夫人一度在隐储当过管理员即后之训育员。一九一二年后，成立校董会，因陈保彝为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之业师，乃推谭为名誉董事长，陈为董事长，许黄萱祐为校长。及后，汤芑铭、张敬尧督湘期间，摧残教育，师资缺乏，经费拮据，只得于一九二一年将师范停办，改为隐储女子职业学校，先后设有刺绣、缝纫、印染等科。后由校董章克恭捐赠安沙夏湾私产房屋，又增设分校于此。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陷长沙，学校停办，抗日胜利后，才又恢复本校。

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由人民政府接收，本校校址改作开慧公社，学校改名影珠中学，后又改为县立五中，设在师古台原开物农校旧址。建国前隐储历任校长有黄经慎、余才劲、余长辅、郭道谦等人。

笔者是一九二四年夏在隐储附属高小毕业，自一九三五年大学毕业后，至一九五一年，先后曾在隐储担任过代校长、副董事长等职。回忆一九二三年春，隐储成立二十周年校庆的一次校董会上，胡元侠（子靖）说：“隐储是癸卯二月开办，明德是癸卯三月开办，应该说隐储是老姐姐”。朱剑凡说：“周南是乙巳年五月开办，更是小妹妹了”。胡元侠、朱剑凡、曹典球、陈润霖、魏先朴、范旭东皆当时隐储校董云。

湖南省立男女中等学校沿革

吴 剑*

辛亥革命前的湖南公立学校，就我所知初只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陆军学堂、实业学堂、优级师范、高等学堂、府中学堂、中路、西路、南路等师范学堂。至于女子学堂是一所也没有的。

一九一二年春，湖南成立六所省立师范学校，三所中学校，三所甲种工业学校。其中省立第一师范（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省立第一中学（长沙贡院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长沙小吴门外），省立第二师范（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常德）、省立第二甲种工业学校（常德），省立第三师范（衡阳）、省立第三中学（衡阳）、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衡阳），专收男生。省立第一女师范（长沙古稻田）、省立第二女师范（桃源）、省立第三女师范（衡阳），则专收女生。

一九二七年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设全省高级中学（内附师范科）和全省初级中学各一所，将全省的省立师范和省立中学的高中学生全部并入省立高级中学。省立高级学校址设长沙南门外书院坪。将全省省立中学的初中生全数并入省立初级中学。省立初级中学校址设在长沙马王街古稻田。这是湖南省立学校男女生合校的开始。

* 吴剑建国前系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建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
已故。

一九二八年秋，（马日事变后的一年），又将两所中学改设为六所省立中学，将男女生再次分开。第一、第三、第五三所中学专收男生；第二、第四、第六三所中学专收女生。省立第一中学校址设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第二中学校址设长沙马王街古稻田，第三中学校址设常德，第四中学校址设桃源，第五、第六两所中学校址设衡阳江东岸。至于此时的省立工业学校已将甲种乙种等字样去掉，改称省立第一高工、省立第一初职，省立第二高工、省立第二初职，省立第三高工、省立第三初职。高工等于高级中学程度，初职等于初级中学程度。

一九二九年秋，又另创设省立第一师范一所于长沙贡院街，专收男生。

一九三四年秋，学校名称又略有改变。校名之前，必冠以地名，女子中学，必冠以女子二字。第一、第二、第三等字完全去掉。如省立第一中学改称省立长沙中学，省立第二中学改称省立长沙女子中学，省立第三中学改称省立常德中学，省立第四中学改称省立桃源女子中学，省立第五中学改称省立衡阳中学，省立第六中学改称省立衡阳女子中学，省立第一高工改称省立长沙高工……等。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因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各省立中等学校皆向各地迁徙。甚至一迁再迁。如省立一师，初迁湘西酉阳，再迁安化桥头河。省立长沙女中，初迁湘潭县张家坪，再迁安化桥头河。最后长沙省立中等学校都聚集在桥头河。

一九三九年，这几所学校的学生又合并起来（工业学校除外），在桥头河成立一所省立临时中学，内分高中部、师范部、初中部，这是第二次男女合校。

一九四〇年（薛岳统治湖南时期），湖南全省划为十个行政区域。每个行政区设省立师范、中学、职业学校各一所。如学校在第一行政区就称第一中学、第一师范、第一职业学校。

学校在第二行政区就称第二中学、第二师范、第二职业学校等。换言之，湖南全省共有十所省立中学、十所省立师范、十所省立职业学校。故迁至桥头河的省立临时中学再行分开，师范部称第一师范，高中部称第一中学，初中部先称第五中学，复员时，并入第一中学初中部。至此永为男女合校。昔日赫赫有名，历史悠久的省立稻田女校已不复存在了。其校具档案等，一部分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一部分并入省立第一中学。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桥头河所在的长沙省立中等学校，于次年迁回长沙。省立一中校址在小吴门原四十九标、五十标之地。省立一师，初迁至岳麓山左家垅，解放后，迁回南门外书院坪。第一职业学校迁回长沙经武门外姚家巷（现第一汽车制造工程工厂厂址）。

一九四六年，教育厅复员后，另筹设省立女子师范一所于湘潭市。初仅招收两个班，借他校房屋办公招考。继租赁周舟园一部分房屋因陋就简地开了学。后复买了周舟园全部房屋暨陶公祠废墟，新建校舍两栋（现湘潭专署），规模日益扩大，共招收学生五百余人，十一个班。毕业了六个班。

一九五〇年春，湘潭省立女子师范迁至长沙。与荷花池原长沙师范女生部合并为省立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现省立幼师前身。现湘潭筹设的省立女子师范其校舍、校具和一切档案，皆系另立炉灶，与前稻田女子师范毫无渊源关系。迁省城时，该校全部档案和全部新制校具一概归属于荷花池省立长沙女子师范。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稻田女校之校友，千方百计想恢复母校，只因稻田校址，已成为瓦砾之场，政府又拿不出一笔巨大的建筑费，想要建立一所规模宏大的校舍是困难的。虽然后来在黄土岭建造了一栋校舍，还没有开办学校，湖南即已解放了。稻田女校始终没有恢复。

欧美各国教会在湘开办学校概况

劳启祥*

自清末以来，欧美各国的教会势力，凭借着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保障，渗入我国进行宗教宣传和文化传播。他们到处设教堂，宣传宗教，附设医院以便与群众接近；开办学校，传播西方文化，灌输崇尚欧美的思想。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沿海地区设立的教会大学有十多处，中学更多，而教堂所在的地方，直至穷乡僻壤都附设有小学。所办大学，绝大多数只办有文科、理科，也间有设立教育科或医科的，办工科的很少。

欧美各国在湘的教会组织，都有或多或少的办学与文化传播活动。但是他们的教派复杂，组织名目繁多，彼此间存在纵横交错的关系。有的教会名称不同，而宗教信仰则完全相同（如循道会与美以美会、信义会与路德会等）；有的是同一种教会，但其传播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其在华的教会组织就各立门户（如挪威信义会、瑞典信义会等等）；有的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教会，但因其母会所在的省区不同，其在华的教会组织也就各立门户（如美国北部长老会和南部的长老会）。由于他们各有来历，独自活动，因此，要了解各国教会组织在湘办学的全面情况是有困难的。我对美国基督教会在长沙活动的情况

* 劳启祥建国前任雅礼中学校长，已故。

接触较多，但对美国的其他教会及欧洲国家的教会的办学情况则是很少了解。本文所举事实，仅系个人记忆所及，并无任何文件书籍可资参考，加以事隔多年，遗忘疏漏之处实所难免，尚望各方知情人士予以补充指正。

一、外国教会在湘创办高等学校经过

欧美各国教会在湖南办的高等教育机关先后共有三处。其中存在时间最短的就是瑞典信义会在益阳所办的信义大学，于大革命时期停办。

当时，第一班学生还未毕业，转往上海的沪江大学读完课程了事。这个信义大学规模很小，设备极为简陋。校长虽是中国人，但他们另设一个副校长魏兹满（瑞典人），学校一切行政用人权力都由魏一人独揽。当时，社会上许多具有卓见的人士，督促政府下了一道“私立学校不得设副校长”的命令，就是针对教会学校这种副职掌权，为外人所操纵而制定的。当局并未严加执行，教会学校把这个命令看成一纸虚文。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键不但不执行这道命令，而且自任某私立中学的校长，以原有的校长为副校长。何键首先自己违反了这条命令，无怪乎对教会学校的放纵了。

第二所大学就是美国复初会（The Reformed church mission）在岳阳所办的湖滨大学。这个复初会在湘的活动有两个重心。一个是在沅陵办有男学、女学、医院等，主要负责人是美国人郗来德（Snyder）。第二个重心在岳阳，由美人鲍姓（Beck）两兄弟主持在这里创办湖滨大学，校址地面宽阔，但内部设施相当简单。其成立比较信义大学早些，也是大革命时停办的。马日事变后，仅恢复了湖滨中学，将大学部迁往武昌，与华中大学合办。

第三所大学是长沙的雅礼大学，初设西牌楼，后迁北门外

麻园岭。这所学校是美国雅礼会办的。雅礼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由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一些毕业生组织起来的。虽然各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但他们是来自各宗派，彼此之间并没有共同的特殊宗教信条。这个组织原名雅礼国外布道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后简称雅礼会(Yale misoion)，最后改为雅礼学会(Yale-in-china association)。这个团体最初派来的人宗教色彩颇为浓厚。随后来来的都是一些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宗教色彩就逐渐淡薄了。到最后几年派来的教员，是一般普通大学毕业生，只能教英文，其中有学过军事的，也有做情报工作的。如安里德(Eliot)。所以在抗战后期，美军由东南亚到了云南时，雅礼的不少美国人辞职前去参加美军。雅礼会最初来华的德士敦(Thurston)，庚子以后就来了。在北京，牯岭等地住了一个时期之后，选定了长沙为他们开展工作的据点。不久，德因肺病回国。继来者为席比义(Seabury)，他与我国教育界人士接近，曾在明德学校教授英文，不久在牯岭淹死了。随后派来盖葆赖(Gage)与胡美(Hume)两人。一九〇六年在西牌楼开办雅礼大学预科，同时，胡美又在西牌楼民房内开办雅礼医院。医生只有胡美一人，并无护士。这两项工作规模虽小，但他们日后在湘开展办学办医等文化活动奠定了基础。

雅礼大学预科办了二十年，先后毕业有两百多人。大学本科于一九一四年开办，先后毕业有七十多人。这个大学的学科内容十分简单，设有文科、理科及医预科，教授不满十人。在大革命时期，湖南一些有远见人士为了收回教育主权，曾向美国雅礼当局提出种种改进校务的建议。他们非但不接受，反而宣布学校停办，以示抵制。在马日事变之后，美国雅礼会又派人来湘，于一九二八年恢复雅礼中学，而将大学部移往武昌，与华中大学合办。

雅礼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辛亥以后，雅礼会来华负责人与湖南的统治阶层商谈联合设立湘雅医学院及湘雅医院。商定由湘省担负二十万元的开办费，每年五万元的经常费。当时湖南政界学界许多人士群起反对。谭延闿是主张成立湘雅最力之人。适谭去湘，袁世凯派汤芗铭来继其任。这些人士分向京湘两处申诉，汤未置可否。而袁是时适用颜惠庆为外交总长，湘雅医院院长颜福庆即其亲弟，由于这种关系，湘雅成立一案，在北京方面通过了。但北京政府提出了一条即：“各省地方政府不能私自与外国人订立条约。”为了应付这条规定，由湖南教育界一些名流如胡子靖、陈凤荒等，组织一个育群学会，由育群学会出面与雅礼会订立合约，其一切条款仍然照旧。关于中国方面担任之经费，还是由湘省财政厅按时照付。后以两国学会名义，再次申报，终获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

解放后，湘雅医学院改为湖南医学院，而湘雅医院就改为他的附属医院。

二、湖南的教会中学概况

湖南的教会中学究竟有多少处，我不知详情，有的从前办了一个时期，后来停办了。如湘潭的益智中学，常德的正德中学，郴州的兴华中学均系美国长老会举办。长沙雅各中学为美国圣公会举办，益阳的信义女子师范为挪威国信义会举办，这些学校存在时间不长，早已停办。解放前夕，湖南的教会中学存在的计有十校，分述如下：

1. 雅礼中学。

雅礼中学于一九一〇年在长沙成立，大革命时期一度停办，马日事变之后复校，直至长沙解放。雅礼中学不是由雅礼会单独主办的，而是邀请长老会（美），遵道会（美），循道会（英）及复初会（美）四个教会与雅礼会合办的。学校设高

中部和初中部，先后毕业五十多班，详细人数无法记忆。抗战时期，这个学校迁往沅陵，高中部设西关遵道会福音堂，初中部设西郊白田头，抗战胜利后迁回长沙。一九五一年，学校更名为解放中学。一九五二年由人民政府接收，改为第五中学，并迁到南门外候家塘新建的校址。（按：一九八四年八月，又恢复雅礼中学旧名。）

2. 福湘女子中学。

这个学校原为美国长老会所设立，主要负责人为美国人凌支尼（Lingle）。大革命后，改为几个教会合办，原设中学及幼稚师范，后来只留中学，分高、初两级。抗战时，迁往沅陵，胜利后仍回长沙北门外长春巷原址。解放后，福湘改为第十中学。

3. 益阳信义中学。

这个学校是挪威信义会办的，创于一九〇七年，地点：益阳桃花篱。校内主要负责人是挪威人赫咨伯（Hertzbery）。抗战时期信义中学迁往东坪，抗日胜利回益阳。解放后改为县立中学。挪威虽是一个小国，但他的国民当时在中国也是享有领事裁判权。他们在安化天竹山倚恃特权，强占大批民田，诉讼十多年不能解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国被希特勒所占领，他们在华的信义会经费来源断绝，后来由美国教会给予资助。

4. 岳阳湖滨中学。

这个学校设在岳阳黄沙湾，是由美国复初会办的。原为大学，在大革命以后，大学都移往武昌，与华中大学合办，而岳阳方面只留下中学。在余桂甫任校长时，曾将中学改为农业学校，后因学校的设备与经费都未能达到农校的要求，仍旧改为普通中学，分高、初两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改为县立中学。

5. 岳阳贞信女中。

这个学校也是美国复初会办的，只有初中，邓文珊任校长。

9. 沅陵朝阳中学。

美国复初会在湘的文化工作共有两个重心，一在岳阳，一在沅陵。这两处人员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在岳阳办有医院，在沅陵也办了一个医院。在岳阳办有湖滨中学，在沅陵也办了一个朝阳中学。这朝阳中学，原本有高、初两部。自从复初会参加雅礼合办之后，朝阳就只有初中了，专收男生。在解放前夕，又增设高中部。解放后并入县立中学。

7. 沅陵贞德女中。

这个学校也是美国复初会办的，只设有初中及小学，与岳阳的贞信为姊妹学校。沅陵的朝阳及贞德这两个中学，校长都是中国人，但其间实际操权者，是邨来德牧师 (Rev. Suyder)。此人在湘西多年，对当地情形至为熟悉，操纵把持教会所办一切事务，交结当地军阀，有时甚至干涉地方行政。

8. 醴陵遵道中学。

这个中学校是美国遵道会 (Tevongelical mission) 办的。原为小学，后来改为中学，分高、初两部。大革命以后，高中部并入了雅礼，而在醴陵只留初中部。

9. 衡阳广德中学。

这个学校是美国长老会办的，只有初中。

10. 长沙艺芳女中。

这个学校是曾国藩的后人曾宝荪、曾约农创办的。其办学思想偏重保守，办学办法大都摹仿英国制度。校内有英国教员，接受英国教会津贴，而且参加各教会学校的集体活动，所以我将它列为一个教会学校。这个学校原先有大学预科，大革命以后只留中学，解放以后改为第十四中学。

三、基督教教育会

欧美各国教会为了操纵我国教育事业，在我国各处设立了

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设总机关，名叫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全国协会，其经费主要由美国供给。

湖南省的基督教教育会，最初是由美人盖葆赖领导的。他是当时雅礼学校的校长，他发起制定全省教会高小统一毕业会考制度。全省的教会高小毕业班都由这个基督教教育会命题考试，统一阅卷评分。凡及格者可以免试升入本省任何教会初中。考试时并不将各地学生集中于长沙，而是将试题邮寄各校去考，其效能相当于教会初中的入学考试，又可免去旅途跋涉之苦，因此，全省的教会高小都参加了，而且以有少数非教会高小学校也要参加，以取得毕业升学的便利。当时正值民国初年，我省教育尚未十分发达，各学校的设备相当简陋，而教会学校建了几栋新式房屋，颇引起当时社会不少人士的注意，而且教会中学多数与省外的教会大学有联系，可取得升学上的种种便利，因此，不少的高小毕业生争取升入教会中学。盖葆赖又拟定了中学各年级英文教学进度标准，并编配了教材，全省的教会中学都采用了这种教材。

湖南中等学校英文教员，毕业于教会学校者为数甚多。这些人大多相信盖葆赖的英文教学进度标准和教材，因此，盖葆赖的影响也达到了教会以外的许多学校。大革命前夕，盖葆赖因与美人胡美争权，辞职回国。大革命时期教会学校停办，因此湖南的基督教教育会也停了。马日事变以后，教会学校大多恢复开办，并进行了种种改组，如缩减校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便在当时的地方官厅进行立案，使教会学校取得合法地位。湖南省的基督教教育会此时又复出现，并成立了华中区基督教教育会，由武昌华中大学校长韦作民及教育学院院长黄溥领导。他们领导的学校地域范围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省教会中学及教会小学。当时，因“基督教教育会”这个名词颇引起社会人士的指责，乃改为“基督教教育讨论会”。在华中区的具体工作，就是集合三省教会中学的校长教职员分

批讨论有关教学及训育一类问题。表面看来似乎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以此推销美国的办学思想和教学思想。

湖南省的基督教教育讨论会寒暑假在长沙开会，参加的就是十个中学的校长，轮推主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属于教会教学的一些特殊问题。如“宗教课程问题”，按照立案的条例，

“宗教课程不得做必修科”，但是在各校依然以“选修科”名义保留这门课。关于宗教课程的教材教法及教师的人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其次是“校产问题”，各国教会势力认为教会学校的土地房屋是教会的财产，而不是学校的财产，这个问题使教会学校的立案工作几乎搁浅。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自动修改立案条例，使教会学校的立案得顺利完成。因此，外国教会对于学校当局使用校舍校地，每每横加干涉，双方造成对立形势。学校既经立案，成了合法团体，他们就借用学校名义收购土地，并取得合法产权，引起了校内校外人士的不满，这个问题经常提出讨论，一直没有得到适当解决。

解放前夕，华中区基督教教育讨论会还在长沙举行了一次集会，仅江西学校的代表未到。会议的主持人除韦作民、黄溥外，还有艺芳女校的曾宝荪、曾约农等。最后一次会议讨论的就是如何“应变”的问题。各学校代表反映了各自校内的情况，议论两天多，没有作出任何结论而散会。

四、教会学校的课程内容

教会学校教学比较有成绩的就是英语教学。他们不主张背诵文法条例，而主张通过实用来学习文法。所用教本都是美国式英国出版的。有少数课本是英国专为殖民地的学生用的。这一类的书主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和物资文明。大革命以前，许多教会学校数、理、化方面以及世界历史、地理都用英文教本，学生虽可由此多学习一些英文生字，但所学外国资

料多，中国资料少。所授各科术语，只知其英文，不知其中文，故不能适合日后工作生活需要。低年级的史地课，虽用中文教本，但当时任校长的外国人中文水平有限，对于这一类的课程不能起辅导作用，对于国文教学则情况更糟。

教会学校对宗教课程则特别重视、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宗教课。小学阶段令儿童阅看宗教画片，听宗教故事，唱宗教诗歌。中学给学生读新约圣经，大学读旧约圣经及教会历史。同时，又令学生在各教会担任义务工作，与传教士多接近，以引起学生对于教会事业的兴趣。

学校立案以后，宗教课程虽已改为选修科，但实际学习的人不少。因为学校将公民课与圣经课并列，名义上是听凭学生自由选习一科，却将公民课及格标准弄得很难，而圣经课及格很容易，所以学生选圣经课的多。

教会学校一向有宗教集会，学生必须参加。但立案条例规定了“校内不得举行宗教仪式”，于是校方就设法使学生在星期日去参加各教会的大礼拜。在教会学校一般只有星期六下午为例假，学生可以出外，其家在本市者可以在家住宿，次早九时回校。住校学生星期日不能外出。如要参加各教会大礼拜，星期日可给假五小时，实际上礼拜的时间不过一个半小时，其余三个多小时可以自由活动，许多学生不信基督教的也要求去做礼拜。

教会学校还有其他种种方法，吸引青年进入基督教。一种办法是校内成立一个学生团体“基督教学生青年会”。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是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学生参加这个组织，只要交很少的会金，但可参加所组织的布道、游艺、交际等活动，其目的就是介绍非基督教学生参加基督教。其次，就是查经班，这个组织在有些学校是由学校当局领导的，但一般都是由学生青年会领导，其工作就是集合学生

研读圣经。主领人或为本校教职员，或为各教会的牧师、教师。再次，就是奖学金制度。教会学校的奖学金，有的是由教会负担，这种奖学金当然是给那个出身于教会的子弟。同时，学校本身也设立了几名奖学金，这种奖学金的取得者，虽然不一定是基督徒，但公然反对基督教的学生，虽申请也难获批准。教职员如有公然反对基督教者，也不予续聘。

五、教会学校改组的经过

清末以来，各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都是按照他自己国家的制度办学的。也有些国家传教士，按照他们在各处殖民地办学的方式在华办学的。也有不采取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各行其是的。因之教会学校的办学方式及内容复杂多样。各国来华传教士的本位主义观念很强，都想独行其是，保持他的教会的特点，彼此之间，很少协作。各教会学校之间学生转学的很少，要转学也极为困难。

大概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国际联盟一个“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他们回去的报告中说：“在华的教会学校校数太多，而每一校的设施过于简陋，似这种情形，将来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发达起来时，教会学校将没有立足的余地。”这个“考察团”建议各教会“将性质相同的学校合并，减少校数，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一批学校。当时，各地教会学校当局对于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反映非常冷淡，其原因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固有的地盘。

在大革命以后，中国当局颁布了“私立学校管理规程”，其中规定了私立学校的校地、校舍、资金、设备等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方许立案。”又“凡未经立案的学校，其毕业生在社会上不能享受一般学校毕业生的同等待遇。”换言之，教会学校若不立案，就不能办下去了。当时各教会大学、中学、小学的

财力、物力、人力都未能达到立案条例的要求，只得进行改组合并。在大学方面，湖南的雅礼和湖滨两校都将大学部移到湖北，与武昌的文华，汉口的博学，武昌的博文共五个单位合并为华中大学，经费由五个单位的设立人分别承担。以文华大学的原址为校址。内设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这样，华中大学成立以后，就成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教会教育的中心。三省的教会高中毕业生升学华中的为数不少，其在高中成绩优异者还可免试保送升入华中，又华中大学的毕业生往三省教会中学任教职员者也很多。这样，把三省的高级、中级教会学校串连起来，自成一个体系，影响比前扩大。

在湖南的教会中学方面，也采取了集中办法。男女中学以雅礼为中心。在大革命以后，在湘的长老会（美），遵道会（美），循道会（英），复初会（美），响应了雅礼会的邀请，一共五个单位合办一个高初两级中学，定名为湖南私立雅礼中学。经费由各单位分别承担，校董会也由各单位推派代表组成。这些教会原在各县所办中学，有些停办（如益智、正德、兴华等），或仅存初中（如朝阳、贞德、遵道等），或改办职业学校（如湖滨）。在女学方面，福湘女学原本是美国长老会办的，改由几个教会合办。为高初两级中学。湖滨中学自改农校后，也是邀请各教会团体派人合组董事会，其中有些教会团体也有不承担经费的。圣公会（美）原在长沙办了一个雅各中学，大革命时期停办以后，就没有恢复，也没有参加合办雅礼。因为美国圣公会的活动重心是湖北。至于永州圣公会，是英国的。挪威信义会于一九〇七年在益阳桃花仑办了一个男子中学，又于一九一二年在益阳五马场办了女子师范，瑞典信义会在益阳办过信义大学，芬兰信义会也在湖北办过中学，因为，信义会自己有了这些学校，所以信义会没有参加湖南各教会的联合办学活动。

创办修业学校的艰苦经历

何 积 煊 *

长沙市桂花井完全小学的前身是修业学校。我是该校创办人之一，并且在该校学习过相当长的时期，也可以说该校是我的母校。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修业学校艰苦创业经历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作以介绍，回忆过去，策励将来，甚有意义。由于年老善忘，忆述不够全面，或有错误，请知情者加以纠正补充。

办校的历史背景

一九〇六年，清朝廷下渝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一时全国各省创办学校，风起云涌，各地都选拔有科名的人士（如秀才、举人之流）送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便回国后办理学校。这时湖南官办的有高等学堂、师范馆、实业学校等等。胡元倓是派送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之一人。他回国后，立志以教育救国，联系湖南绅士龙璋、龙绂瑞、谭延闿等人创办私立明德学校，湖南私立学校，明德算首屈一指，这是一九〇三年三月的事情。这个时期在湖南办新学还是风气初开，入学的学生，大多数是有志研究科学和怀着革命思想的青年。教师在课余之暇，经常对学生谈论世界形势，灌输革命学说，而学生也经常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第一学期完毕，胡元倓先生往沪、杭一带，聘请教员。在这期间，学校中发生了严重的风潮。原来湖南的

*何积煊自一九一二起担任修业学校校董，是该校创始人之一。

绅士界有顽固的旧派和开明的新派。旧派，如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新派如龙璋、龙绂瑞、谭延闿等，旧派对学校非常仇视，由于朝廷明令兴学，表面上不敢公开反对，但暗中布置爪牙，兴风作浪，阴谋破坏。明德教职员中有一个刘佐缉是王先谦的门人，他和胡元侠为留日同学，也是明德发起人之一，并出资二百元。其实是王先谦要他打进明德，作为暗探，专门刺探师生的革命言行，随时密报王先谦、叶德辉等。还有刘的同党理化教员单启鹏之弟单启鸿也在明德肄业，表面上伪装积极，倾向革命，实际上单氏兄弟暗中和刘佐缉勾结，平时把教师对学生的讲话都一一记录在教科书的书棚上，交给其兄启鹏。适有地理教员周震鳞在单启鸿的历史课卷上批有奖励语，措辞激烈。于是单启鹏和刘佐缉拿了这本课卷报知王先谦，并向巡抚赵尔巽告密，就明德学校的师生倡言排满革命，实行谋反叛逆，要求审讯严办。一时学校岌岌可危。幸而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通达时务，同情新派而反对旧派，极力维护学校。赵尔巽为此案曾召集全省巨绅在巡抚衙门花厅内开会，教员周震鳞、陆鸿逵以及单氏兄弟都被召参加。开会时，开明士绅都袒护明德，就周、陆教师思想纯正，并就课卷批语是单生捏造、诬枉老师的。最后，赵抚台不作出结论，斥责启鹏教弟不严，当场开除了启鸿的学籍，交启鹏领归严加管教，就结束了这一案件。这场官司新派获得了胜利，风潮平息。胡元侠从沪杭归来，理应感激在校的教职员维护学校的功劳，高高兴兴地重行开学。不料出人意外，胡先生返校后，听到这次风潮的经过情况，被旧派势力所吓倒，唯恐旧派人们不甘心失败，再进行报复，要把学校中有进步思想和革命意志的教员尽行辞退，来取媚旧派，缓和矛盾。当日是否有外来压力，逼迫他这样做，则不得而知。当时首当其冲要被辞退的教员，无疑是历史、地理教员陆鸿逵和周震鳞（黄兴和张继两位老师第一

学期还没有开课，因此还没有成为目标）。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深感意外，大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一致强烈反对胡先生的做法。胡先生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乃召集全校学生讲话，诉出他的苦衷，突然辞职离校。一时校中群龙无首，形成无政府状态。于是学生集体到抚院请愿，要求赵抚台作主。维持明德。赵抚台随即调派俞蕃同先生（他和胡元倬为留日同学）接办。俞见学校正值风雨漂摇中，不敢就职。这个时候，不知何人主使戊戌变法失败的熊希龄先生一度来校，作为调解人，召集学生讲话，力劝学生做事不可走极端，并举戊戌变法，因过于激进，以致失败为例，主张仍旧以胡主持学校为要，同时学生中也起了分化。我们在校十二个志趣相投的同学，考虑到学校这种局面长期僵持下去，不仅会影响明德的发展前途，使私立学校方在萌芽时期遭致破坏，不免为亲者痛，仇者快。学校当局忌刻闹事的学生，也可能借故开除。我们面临着这种局势，当有所选择。于是十二个学生决计退出明德，另找出路，再图进步。经过商议，决定自己创办一个学校，这就是修业学校。修业的创办可以说是清末湖南教育界的新派和旧派、进步和落后势力斗争的形势下激发出来的。

艰苦兴学 七易校址

我们十二个学生反对胡先生的倒退行为，毅然决然地退出明德学校，另行创办学校，在那封建时代，是破天荒的事。第一道难关是要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以学生的名义向政府呈请开办学校，肯定没有批准的希望于是请求周震鳞、俞蕃同、许直三位先生出名具禀呈请政府当局办学，才得到批准。周震鳞号道腴，是原明德地理教员，革命激进派，同黄兴先生组织华兴会，辛亥革命湖南起义主要人物之一，民国成立，任参议院议员；俞蕃同号经贻，留日速成师范，回国后，主办师范馆，是

湖南第一女学创办人之一；许直号玉屏，是湖南革命先进人物，早在一九〇〇年就自费去日本留学，他提倡女学最力，是湖南第一女学创办人之一，又创办过许氏育才学校、东乡圭塘静善小学等。

第二步，就是校舍和经费问题。首先把各人准备的学费收集作为基金，由许直先生慷慨捐百元作为房租押金，租得高码头民房作为校舍，即正式成立学校，举行开学仪式，这是一九〇三年八月十八日的事情。没有多久，朱剑凡先生（周南女学创办人）介绍他的亲戚魏某，他同情我们的创举，自愿捐助了四百元，经费也渐次充裕，购置了一些图书仪器。

第三步就是教职人员和学校规章制度问题。我们这一创举，获得了当日教育界很多热心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当日有钱维骥、朱子淘、周震勋、刘台生、翁巩、郑日功、许奎元诸先生自愿来校担任教学。他们都不取薪金，只接受微薄的车马费，甚至有的连车马费也不接受，完全义务教学。至于校内的管理以及职员的各项事务，则由学生十二人分责分担。可是社会上也有个别人士对我们的行为发出嘲笑和侧目而视。他们说：学生办学校，最多可能维持三、五个月就会垮台。可是我们的艰苦奋斗，并没有白费心血，一个学期平安渡过，学校基础居然巩固，取得社会的信任。第二年（一九〇四年）就迁移到五堆子，扩大校舍，充实设备，大胆招收乙班学生，推举学生郭琮翰为监督，负责学校管理事务。

一九〇四年八月肇嘉坪的敬业小学校停办，该校主持人杨德吾先生捐房租四百八十元，并劝我校迁移肇嘉坪旧址，添设小学高级、普通各一班，添聘明德师范毕业生彭汉徽担任小学部主任，是为本校附设小学的起始。随后端方抚湘，锐意兴学，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我校甲班学生王桢干被选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为办理小学人材的准备。

一九〇五年春季迁移水风井胡家花园，仍租民房为校舍，添招中学丙班，学署给发补助费银月四百二十两。同年六月甲班学生郭琮翰、许椎、魏先根、彭鼎年、廖家塾、梅伟杰、周教敷、何积煊、黄昌濬九人奉派赴日留学。

一九〇六年春季，应岳阳及其他县人士商请，开办速成师范科两班于福星街，并添招中学预科一班。这时本校有中学、师范、小学等共计三百多人。同年十二月师范科及中学预科毕业，奉学署札停止补助费。

一九〇七年，中学乙班毕业，中学部因补助费停止，无法开办，仅将小学部迁移福星街黄祠南偏房屋为校舍，以明德师范毕业生彭国钧任校长，黄海润、徐特立、姜济寰、狄昂人诸先生任教员。校长以下概不支薪，这是学校最困难的时期。

一九〇八年春季迁移浏阳门正街聂氏民房为校舍，复办中学。同时学署复发补助费岁一千六百两，使本校走上复兴。

一九一〇年迁移马王街（即现在桂花井地址）。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本校成立校董会，以周震鳞、郭琮翰、王桢干、许椎、魏先根、梅伟杰、彭鼎年、周教敷、何积煊、黄昌濬、彭国钧、俞蕃馥、徐特立、黄海润、辜天祐、姜济寰、朱剑凡、狄昂人、王经武、李孝仪、王震东诸人为校董。同年八月奉湖南都督府批拨马王街及附近民房基地，悉数作为修业学校校址。本校从高码头开办起始，历年迁移五堆子、肇嘉坪、水风井、福星街、浏正街，最后马王街等处，九年间七次迁徙，才得到现在永久固定的校址。

一九一三年本校又添设土木、建筑两科，成立工业部，以许椎为部长。一九二〇年在本校废止中学，开办农业职业学校，购定南门外新开铺地址为农业部校舍，从此，新开铺专办农业，马王街专办小学。以上是本校历年兴办中学、小学、师范、工业专科，最后创办农业专科的经过。

崇实尚朴的校风

修业学校的协进堂悬挂：“习劳耐苦，崇实尚朴”八个字，标志着修业优良传统的精神，这些优良传统表现在办学和教学方面；也表现在校董、教员、学生的工作、生活作风方面，下面列举几个典型例子：

修业是贫穷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二个学生创办学校，当然很贫穷，一切设备因陋就简，学生一切活动和其他学校比较，不免相形见绌。可是贫穷并不能阻碍我们的办学和学生的求学，反而促进我们的勤俭节约，事事精打细算，不浪费一张纸，不费费一支笔，坚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弦歌不断。当时社会上有所谓“叫化修业，贵族明德”的议论，我们坚持勤俭办校，不以为意。

学生创办学校，是一个创举。我们为避免社会人士的指责，对自治、自立以及组织纪律，特别重视，不使稍有松懈。有一次学生王立洞犯了严重错误，大家议决：“不包庇，不循情”予以开除处分。本人承认错误，不愿以个人的关系毁坏全体名誉，乐意接受开除处分。后来王君自费去日本学习体育，回国后在各校任教，并回到修业任校董。

本校注重理论与实验结合。过去旧社会的教育，理论与实验脱节，导致学生能说不能行的通病。学农的或不辨菽麦，或不能执农业锹锄，本校创办农校，力矫此弊。贯彻教、学、做的三合一。教学科目、除在教室讲授研究外，注重农场实习，老师带领学生披蓑戴笠，沐雨栉风，从事挖土挑粪，除草犁田，插秧剪枝等等体力劳动。有次益阳县教育局长某来校参观，遇主任彭先生从田间出迎，短衣赤脚，与农夫无别，某问主任在那里？彭以实告，某大为诧异，深受感动。回县后，立即选派学生十名来本校学习。

本校对学生生活习惯强调农民化、劳动化、食则同餐，寝则同室，并组织食事会，决定每餐除粗粮外，仅蔬菜之事；苟非寒冷季节，学生一律草鞋赤脚、入教室听课也是一样。本校学生还经常自动担蔬菜到市场出卖，养成劳动习惯，这种崇实尚朴的作风，在旧社会中实不多见。

校董俞蕃同先生在一九〇八年政府补助费停止，学校行将停闭时，先生独立支持，多方借贷，济其急需，使学校得以维持下去。黄海润先生在明德师范毕业后，即来修业任小学校长，当辛亥革命时期，学校经费困难达于极点，先生独留小学，自任教课兼职员，夙夜从事，经年不支薪。辛亥光复后，许多教育界人士趋向军政方面，先生处之淡然，仍留修业，整饬学风，规划教务，视学生为家人骨肉，学生爱而敬之，学校特为他立了纪念碑。

校董兼教员徐特立先生一生勤俭朴实，以身作则，他在学校教课时，城乡来往七、八十里路程，回家总是步行，从没有坐过轿子。学生中有困难的，先生常与以金钱或物资接济，他的勤俭作风，当时为全校的表率。

在学校处于艰苦的时刻，全校教职员学生团结友爱，患难与共，当一九一二年租福星街黄家祠堂西偏做校舍时，经费异常拮据，房屋湫隘，无款维修，天雨则水深尺许，可是师生仍坚持上课，无一日停止。有时无隔宿粮食，赖师生典衣为炊。

农业学校开办初期，省府补助费积欠达二万余元，经费断绝，校中经常断炊，甚至掘薯藕以充饥，幸赖教职员和学生皆能同艰共苦，毫不阻丧，没有一日辍课，卒使学校得以冲破重重困难不断发展。

一九四九年湖南和平解放，在党的领导下，长沙市修业小学校名沿用至今，学校规模不断扩充。

陶龛学校和鞠重先生

曾 楚 樵*

童年学生生活琐忆

童年时代的许多经历，回忆起来往往是很有趣的，其中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在陶龛学校那段学生生活。论时间，不过一年又半（从初小三年二期到四年二期），而所见所闻之多，却不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在通常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读过大约两年的私塾之后，被送到离家八十余里的湘乡白鹭湾陶龛学校求学。那时不过八九岁，父亲领着我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住宿到离学校还有十多里的谷水镇。第二天继续赶路，翻过最后一座山，弯弯的涟水河就在山脚下。两河的对岸，有一块开阔地段，一大片湖南农村习见的瓦房便展现在眼前。一问，这里就是白鹭湾，而那一大片瓦房，就是陶龛学校。

乘船过了河，再沿河而上走过一段平坦的沙石路，就到了校门前。宽阔的门楼上横挂着“陶龛学校”四个字的大匾额。穿过门楼，是一个整洁的大院。步上台阶，进入正厅，右边厢房的门正开着，一眼望见厢房正中摆着一张黑漆的大写字台，一位老师正而对着门伏案工作。父亲轻轻地打了招呼，那

* 曾楚樵原系陶龛学校学生，现任长沙市民主同盟副主委。

老师立即含笑起身接待。他，大约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平头，面容白晰、清癯，两眼炯炯有神，与他那整洁的深兰布长衫、青毛呢马褂相映衬，表现出典型的旧时代的学者风度。当听父亲说明来意时，他总是不住的点头，又不住地插上“是的”，“是的”“是的”而最后的结论，便是：学校已经开学了，就让孩子读三年二期吧。于是，我的名字便列入了陶龛学校初小第二十六班的名册，后来才知道，这位学者风度的老师，就是学校的创办人辘重先生。

陶龛学校称呼老师是不兴呼姓，而习惯于呼名的。如我们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刘汉初先生，我们喊“汉初先生”，其他如“彦谋先生”，“光禄先生”等等。只有碰到单名时，才不得不连姓一起进去，如图画老师“黄朴先生”，这样反觉亲切些。因此，辘重先生虽然姓罗，而大家从不用“罗”字，这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至于是否辘重先生所首创，就无从查考了。

辘重先生创办陶龛学校，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不想，也不可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准确地叙述这件事。如前面提到的，只不过把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作此一鳞半爪的回忆，确切不确切，就在所不计了。

辘重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一位隐居的诗人，自号“陶龛先生”，曾在乡间聚徒讲学。我们见过辘重先生保存的他的木刻本的诗集，内容当然不懂。辘重先生创办陶龛学校，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作为诗人的祖父的。辘重先生的父亲是科举出身，后在云南做官，被人暗杀了。辘重先生为报父仇，历尽艰辛，终于如愿以偿。以后便去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为了避免父仇之事辗转相报，就决心归隐田园，以他祖父为榜样，致力于教育事业了。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尽管辘重先生实际主持着全部校务，而学校校长一职却是请他的本家彦谋先生担任

的，事实上，彦谋先生并不常在校。

辋重先生的家自然是相当富有的，所可贵的是他那毁家兴学的义举。学校的校舍，原就是他的祖居，除了在偏僻的后院留下几间作住宅外，其余的全用来办学。那后院究有多大，似乎谁也没进去看过，我们学生当然更无例外。

既是一座标准的住宅，用作校舍就未免不尽适当，所以，十几个班的教室，就不能不东一处，西一处，七零八落，有间过路屋也得权充教室用，所以上课时，难免有人非悄悄从教室后面出出进进不可。那条件，自然是比较艰苦的。只有高年级得天独厚，那大约是在我入学之前几年，在校舍右边的坡地上新修了一栋两层楼，上下共四间教室的“爱迪生院”，这就成了高年级的教室。“爱迪生院”的正中，还有上下两个小间。下间经常锁着，我一直搞不清它的用途；上间则挂了大幅的爱迪生画像，满头银发，神采奕奕，令人一望而生敬爱。辋重先生还花了很大气力，特意买来一部廉价的钢琴摆在里面，供音乐教师练琴之用，这在当时当然是稀有的珍品了。各班上音乐，却是用的风琴，上下课由学生抬来抬去。

为了这“爱迪生院”，辋重先生还特意编了《学习爱迪生》这首歌，歌调的最末一句是：“大家都学爱迪生”。我因为是开学以后才入校的，而这首歌早在我入校之前就教过了，这最末一句，是从同学口里听来的。

陶龛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除了少数附近的子弟以外，都得寄宿。教室既是东一处，西一处，寝室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大都是相当有格的。但不用上下连床，大约是从安全着想，辋重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每晚定要亲自下寝室查铺，坚持不懈。那时农村没有电灯，辋重先生就凭一支手电筒，从这个寝室到那个寝室，一个铺一个铺的查。发现被子踢开了，给你盖好，蚊帐踢开了，给你放好。个别尿床的，他也心中有底，喊起来小

假。至于第二天的晨操，他却准是第一个到达操场。

因陋就简，发挥效益，大概是辘重先生一条重要的办学方针。操坪是相当狭小的，只够一个篮球场，球场的一端幸好有块空地，还不够网球场的地位。于是兴出一种用木板做的乒乓球拍大，而比网球拍小的拍子，用小皮球打，采用与网球大致相似的打法，称为“板球”，这空地也就成了“板球”场了。

校舍后面有座小山，长着一些竹、树和许多野花野草，很有点象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是我们低年级学生爱去玩的地方。辘重先生注意了这一点，便正式雇工加以修葺，还在上面盖了一个简易的小亭，架上秋千等等玩具，竖上一块“小南园地”的横标。这顺乎民情的措施，很受小同学们的欢迎，这里一下竟成了我们的乐园。

陶龛学校的“校训”，叫做“血性”。初入学时，我不懂什么叫“校训”，更不懂什么叫“血性”。后来，偶然看到高年级同学的一本同学录，扉页上把“血性”二字作了种种解释，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其“……所以，血性就是诚实”。我这才朦胧意识到，所谓“校训”，原就是全校学生必须遵守的做人的道理。跟着又常从墙上看到诸如“陶龛学生是不扯谎的”之类的标语，这就更加深了我的判断。但是，有一条标语写道：“陶龛学生是喜欢打赤脚的”，我却有些不能理解，为什么把“打赤脚”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另一条标语：“陶龛学生是不打赤膊的”，这是关于礼貌的问题，当然一看就明白。说也奇怪，在陶龛学校一年半，竟没有听过一堂系统讲解校训的课。

辘重先生是很重视“乐教”的。一进校门，院内右手边的墙上就有大幅的用五线谱写的《儿童歌》，也是集会时常唱的。那歌词有两节，第一节为：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活泼的儿童，

国家的主人翁。

国家，主人翁，

大好中华要改造，

责任全在我儿童。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此外各种纪念日，都有自编的歌，在全校教唱，如《五四歌》：

热烈的五四运动，

打倒卖国贼！

工商学界齐奋斗，

罢课连罢市，

罢市连罢工。

……（记不全了）

北京学生好！

北京学生好！

又如《五九国耻纪念歌》：

五九，五九，

莫忘国仇。

条约二十一，

强迫我承受。

不平等，

失自由，

国权丧失真可羞。

同胞们，

起来奋斗！

教我们音乐的是周炼白先生。每上一堂音乐课，他总要把

歌词作一番详细的讲解，而真正教歌的时间往往不及二分之一。我们那时总觉得唱的时间太少了。

辅重先生自己也兼课，通常是教低年级。他的课是我们最爱听的，他教我们的“卫生”。他讲课既不用课本，也不限定内容，好象也不一定考试。有一次，他带来一支牙刷。我想，大约是讲牙刷的重要性了，不料他一进教室，同学们的问题可多了；有的问到底有不有鬼神，把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关于鬼神的故事一股脑儿提了出来；有的问为什么会做梦，梦到底有不有灵验等等。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辅重先生不但不制止，反而引导大家把问题提完，然后一一解答。就这样，一堂“卫生”课，变成了破除迷信课。

陶龛学校有相当好的师资条件，在师资问题上，辅重先生的一个主要方法是依靠校友。陶龛学校有一个校友会，由辅重先生亲自主持。凡是在陶龛读过书的，不论毕业与否，都千方百计取得联系。遇有校友返校，总是热情接待，使每个校友都把学校看成真正的“母校”，有女回娘家的亲切感。通过这个渠道，学校就获得了广泛的师资来源。在学校任教的，大部份都是陶龛学校以往的毕业生，受过母校的熏陶，尽管待遇菲薄，在辅重先生办学精神的感召之下，都能为学校尽力，使整个学校教学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例如那时连无声电影都还是新鲜事。偌大一个湘乡县城竟没有电影院。有一回，辅重先生打听到湘乡县城到了电影队，就立即派人去县城请来放映。但在电影队来到之前，先要在全校进行一次电影原理的教学。这个课高年级还好接受，低年级就是难题了，但是我们的级任老师汉初先生，终于通过简单的演示，使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获得了通俗的理解，在看电影时，不再有神秘的感觉。而汉初先生却是我们的国文教师。

在师资上，辅重先生依靠了校友，在办学经费上，辅重先

生也千方百计发挥校友的作用。我离校后，学校新建了一个“三十周年纪念堂”，据说，这个纪念堂就是由广大校友集资兴建的。

陶龛学校还有一些特殊的教学制度。如一般学校都用星期制，而陶龛学校用的是所谓“旬周制”，即每十天为一周，放一天半假。这是为了适应农村环境，便于师生回家的缘故。我们远道的年纪小的学生不能回家，就在学校过假日，管事务工作的老师是很细心的，到了假日，便为我们添点好菜，解除我们思家之苦。

食堂是师生共餐，只是老师桌上加一个菜，也不太特殊，一般是荷包鸡蛋之类。辋重先生一贯与师生一道在食堂吃饭，只有节假日例外。食堂都用圆桌，辋重先生给我们讲了吃饭的规矩，要把胸口贴近桌沿。圆桌当然更有利于这样做，至于这样吃法的好处，我却有些茫然。

陶龛学校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近乎山沟里的凤凰，国民党的教育部曾颁给特等奖。当时的部督学，儿童教育学家吴研因先生就专程来学校视察过，临走时写了一封给师生的热情的信，辋重先生把它贴在公告栏里。

白鹭湾是一个幽静的山村，单是这个名称就很有点令人神往。清澈的涟水到这里沿山拐了一个大湾，然后蜿蜒而去。朝下游眺望，只见点点白色的帆尖在山峦间缓缓移动，真有点山重水复的韵味。陶龛的校门距河岸不过二、三十米的距离，岸边就是一个简易的码头，过往船只通常要在这里做饭歇脚。岸上有一棵大苦练树，有几抱围粗，靠河的那一面的树干，满是纤索勒成的深深的伤痕，然而它总是枝繁叶茂。到了夏天，那树下便是一片荫凉。每逢课余，我们这些小同学喜欢在这里玩耍，看船工吃饭，喷香喷香的。河对岸是一片葱茏的山峦，小影倒映在河水中，显出特有的浓绿，别有一番情趣，河的下流，另有好几部古式的筒车，昼夜不停地转动，发出悠扬的有

节奏的响声，这声音就常常在夜深人静之后，送我们安然入梦。我那时总想有一天能自己坐在船上，领略一下这里的河光山色，然而没能实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就学于安化兰田。一个暑假，几位同学决定乘船下湘乡，我欣然赞同，这才有机会乘船打这儿经过。在我们的请求下，船主同意在这里稍事停留，我于是邀了我的同学重访了我的母校，得再次见到久别的辏重先生和其他的老师们。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访问母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辏重先生了。记得抗日的时期，陶龛学校出过一种石印的《陶龛旬报》，四开大小，内容宣传爱国抗日，报导学校动态为主。那编排之精美，内容之充实，字体之整洁（石印是要用毛笔书写的），使人一望而知，张张出自辏重先生的手笔。我作为校友，能按时得到这份旬报，得以随时了解母校的动态，自然是格外的高兴的。想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会留下这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岁月易逝，转瞬五十年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

湖南省童子军训练的经过

江 以 南*

“童子军”，即“儿童侦察”的英文译名，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由于童子军训练方式有助于儿童做事能力的发展，在解放前的学校，多采用为课余活动。远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谓欧风东渐，诸事维新，把西欧的童子军训练也模仿起来，作为办新学的一种风尚。当时厦门集美、武昌文华……所有外国教会的中小学校多有举办。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也曾一度有过童子军的组织，深入工农群众基层，为军队中政治部工作的一部分。

我曾经在湖南省童子军中工作过多年，就记忆所及，将湖南省童子军训练的经过分述如下：

一、仿效时期

一九二二年暑假，湖南省教育厅在长沙举办各学科讲习会，其中有童子军训练讲习。聘请江浙名流袁宗泽、张信高等任讲师。此为湖南省举办童子军训练的开端。以后湘潭成智，益阳信义及长沙益湘、楚怡等校相继举办。关于童子军组织，训练课程露背规划概依照童子军创办国——英国的办法，如法炮制，全无变更。甚至加入童子军时的三条誓词，也原封未动，仅作意义解释。一、尽忠于国家元首。二、服务公众。三、准备

* 江以南系建国前国民党省党部训练科童子军指导员。

自己为一个完善的国民。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计六年时间，政府既无一定法规章则可供举办，相互间也无一定组训方法可资推广。各自为是，仿外为荣。

二、组训时期

一九二七年革命军北伐成功，奠都南京。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革命果实，为巩固他的统治基业计，就把他的魔爪伸入到儿童教育方面来了。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夏颁布命令，在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科内，开设童子军教练人员训练班，通令各省派员受训。湖南省政府会同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及教育厅，选人员受训。当时有胡国春，吴敬诚，雷迅，张国钧和我共五人参加。在受训中有关组织专科课程，露营操作等项称之为技能课，仍然模仿英国。除此，增加有思想和信仰的灌输，以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一书为重要课本。确定童子军三条誓词：一，余遵奉总理遗教，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三，力求自己知识道德体格之健全。颁发童子军十二条守则：诚实，友爱，勤俭，快乐，礼节，勇敢，清洁，公德，余四条已记不清了。受训地点是南京中山陵郊区。受训时同连同露营将近五个月。受训人员来自各地约二百余。受训完毕仍派回原籍作为发展当地童子军训练的骨干。

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科继续颁布童子军组织法，各省及直辖市设中国童子军训练委员会，受南京中央党部训练科的直接管辖，并确定经费来源（各省、市行政费由领导机关开支，活动费由教育经费开支）。从此，湖南省政府会同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及省教育厅组织童子军训练委员会。会址在省党部训练科。由省党部主任委员领衔，承上接下发布文件。省党部训练科设童子军指导员一人。首任童子军指

导员为胡国春，不久由江以南担任，办理全省童子军训练一切事宜，如审核童子军团部，童子军教练员及童子军三项登记，拟定训练计划露营，举行检阅，办理文件等工作。一九三一年暑假，南京教育部举办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因为全国童子军训练一切事宜，在此以前概由中国国民党主办，现在移交由教育部接管，这主要为了符合西欧童子军的组织法规。教育部接管全国童子军训练之后，对组织章程均有修改，对专科学术有新的发表，制定会歌营火歌，颁发奖章，印刷书报。戴季陶、陈立夫、张忠仁、严家麟等亲自主持，并参加以英美为首的世界童子军会员国。使中国童子军训练走入了世界之林。湖南省参加教育部训练班受训的有三十余人，现在能记起的有胡国春、杨一南、阎家笃、刘正伟、何家声、蒋增澄、卢清泉、卢政清、石国模、江以南等。基层干部突然增加，湖南童子军训练迅速发展。估计当时学校童子军团部已达四十余个，童子军教练员约有二百余人，童子军约五万余人，较大规模的检阅约有十余次。童子军训练发展如此迅速，其主要原因是：公布有一定章程可供举办，又有一定训练方法可资参考。

三、活跃时期

一九三五年中国童子军组织章程重新规定，改训练委员会为理事会。南京中央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为蒋介石。各省、市成立中国童子军理事会，理事人选须通过会长核定。这种改组的原因是因为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反动派看出共产党的力量，气势磅礴有如旭日东升不可遏止。蒋介石也深知自己的统治的基石不稳。因此，训练的目的要求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了。以前着重童子军技能的训练，现在则着重于拥蒋思想的灌输。于是在全国青年及儿童方面定了一个新的训练方法，即高

中学生一律军事训练，初中学生一律童子军训练，加强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信念培养。南京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后的第一任常务理事鄧悌，第二任陈诚，第三任刘咏尧，他们都是蒋介石军系门生。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理事，除了几个是学校童子军教练员外，其余都是以湖南省青年军事训练处负责人兼任，如蒋肇周，何浩若、余克剑、蔡杞材、吴昶、仇硕夫等。理事会成立后常务理事第一任仇硕夫，第二任李一民，第三任贺醒汉。理事会工作负责人秘书吴昶，组织主任干事黄鼎，训练科主任干事陈志贞（后改周德定）。以上各人都是复兴社分子。当时中国童子军训练，完全是为蒋介石企图长期统治中国人民服务的。随着新的改组，且看下面连续几年来的事实：

（一）一九三五年七月，选童子军教练员赴南京参加总会所办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受训。

训练班设南京中央军校，蒋介石为校长，张治中任主任。实际负责人为刘咏尧，全班实行军事训练。设有童子军专科技能学习，以蒋介石言行录及贺衷寒所编《一得集》为主要课本。每次精神讲话中，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认清蒋介石是中国复兴的所谓唯一领袖。在训练中曾举行一次点名典礼，由校长亲自点名，这意味着被点名者即是蒋家天子门生。结业时暗地里举行励进社登记（励进社即复兴社外围组织）。这次受训人多来自各省童子军教练员计四百余人。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派往受训的有四十人（现在能记忆出的有胡国春，胡仲荪，王克让，王应琪，欧阳超，曾远兰，谭德雄，吴蔡、江以南等）。回湘后增加一支强大的拥蒋力量。

（二）一九三六年十月派送童子军赴南京参加全国童子军大检阅及大露营。

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选送参加全国童子军大检阅及大露营

的有三个中队，连同教练员计二百人。这次大检阅是检阅各地区童子军训练经过及改组后的新面貌。

(三)一九三七年六月，派送童子军及童子军服务员赴欧洲参加爬山运动及联合大露营。这时意大利执政墨索里尼举行爬山运动，德意志国社党领袖希特勒举办儿童夏令营，英美法联合举行童子军大露营，他们都在勾心斗角，表现自己对青年训练的成就。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接受中国童子军总会意旨，选送童子军（谢燕生）及选派童子军服务员江以南为湖南代表。在南京集合组成出国代表团，前往欧洲分别参加爬山比赛及联合露营。选派参加的目的是采用法西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教育方式来加强中国童子军的训练。

(四)一九三八年五月组织童子军战时服务团。

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中日战争，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在这种形势下，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接受总会指示，发动全省童子军以战时服务为主要工作，成立战时服务团。内容包括：慰劳，遣散，宣传，募集，侦察等项。所谓“侦察”是侦察汉奸的行动和进步思想的混入。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的发展，应配备新的人事，于是在来阳湖南省干部训练团附设童子军教练人员训练班，前后计有三期，人数共有一百二十人，训练期满即举行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团登记，任受训人自己选择。这种训练班的举办主要是为战时服务团培训工作人员，而最主要的是扩充国民党方面的力量。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直辖战时服务团一个，其余学校凡成立童子军的都设有团部。全省计四十余团，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胜利才停止。

(五)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合并。

一九四六年七月由于童子军新组织法的颁布，各省市童子军理事会，由教育部门移交当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接管。因为，抗

日战争时期，三青团已经形成一股力量，又是蒋介石少壮派所依托的集团。为使机构简化，力量集中，是有理由合并的。此后，湖南省童子军理事会常务理事由李树森兼任。当时理事会的工作首先是取得面的推广，其次是质的发展，于是大量发展各县市理事会。一九四七年以后的三年中，湖南省各县市理事会已达九处，童子军团部童子军教练员和童子军三项登记人数更有增加。到一九四九年随着蒋政权的垮台而中国童子军训练即告结束。

